

【季刊】2025年第4期(总第90期)

本刊编委会

主任：齐成喜

副主任：石刚 韩少波 关章军 贾维萍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洋洋 石晶辉 刘国强 李雯

李彦博 杨善娟 吴星辰 张津凤

贾亭 曹林

主编：韩少波

执行主编：曹林

主管单位：天津市社会主义学院

主办单位：天津市社会主义学院

出版单位：《天津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

出版日期：2025年12月20日

发行单位：本刊编辑部

发行范围：国内外发行

印刷单位：天津午阳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国际标准刊号：ISSN 1672-4089

国内统一刊号：CN 12-1354 / D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鞍山西道340号

邮编：300193

电话：022-27412434

电子信箱：ssyxbbjb@tj.gov.cn

定价：15.00元

JOURNAL OF TIANJIN INSTITUTE OF SOCIALISM

天津市社会主义学院

学报

目 录

|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

面向“十五五”:数字技术赋能产业结构现代化的逻辑阐释、现实困境与

突破路径 张克成 刘 波 5

人类文明新形态视域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路径探析 李 强 胡 欢 10

|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

“两个结合”视域下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创新 谢一迪 何家旭 15

| 统战理论与实践 |

新兴青年统战工作的变化趋势及优化路径 李超民 章子怡 21

创伤与辉煌:抗战记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双重叙事与内在逻辑 苏玉波 李谕卓 27

党外知识分子群体精准统战的逻辑与路径研究 张立鼎 32

基于人才资源开发理论的高校党外代表人士全周期管理机制研究 陈 华 张录全 37
智能传播时代澳门青年文化认同培育的启示研究 张苏媛 贾倩文 李 颖 42
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 秦院院 46

丨 政党制度理论研究 丨

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三维探析 王海亮 唐雯静 50

丨 津派文化研究 丨

天津市名人故居活化利用与文旅融合发展路径研究 石晶辉 陈 泽 55
津派文化资源的统战价值挖掘与路径转化 李子吟 60

本刊声明

本刊已许可中国知网(CNKI)、万方、维普等数据库平台在其产品中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网络上传播本刊全文。本刊所支付的稿酬已包含上述著作权使用费。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即视为同意编辑部上述声明。

Main Contents

- 05 Facing the “the 15th Five-Year Plan”: Logical Explanation, Practical Predicaments and Breakthrough Paths of Digital Technology Empower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Zhang Kecheng Liu Bo
- 10 An Analysis of the Path for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Forms of Human Civilization Li Qiang Hu Huan
- 15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f Xi’s Thought on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wo Integration” Xie Yidi He Jiaxu
- 21 The Changing Trends and Optimization Paths of Emerging Youth United Front Work Li Chaomin Zhang Ziyi
- 27 Trauma and Glory: The Dual Narrative and Internal Logic of the Memory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Consolidating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Su Yubo li Xuzhuo
- 32 Research on the Logic and Path of Precise United Front Work among Non-Party Intellectuals Zhang Liding
- 37 Research on the Full-Cycle Management Mechanism of Non-Party Representative Figur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Talent Resource Development Chen Hua Zhang Luquan
- 42 Research on the Implications of Cultivating Cultural Identity of Macao Youth in the Era of Intelligent Communication Zhang Suyuan Jia Qianwen Li Ying
- 46 Research on Promoting the Sinicization of Religions and Enhancing the Cohes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Qin Yuanyuan
- 50 A Three-dimensional Analysis of Promoting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through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Wang Hailiang Tang Wenjing
- 55 Research on the Revitaliz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Famous People’s Former Residences and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Tourism in Tianjin Shi Jinghui
- 60 Exploration of the United Front Value and Path Transformation of Tianjin School Cultural Resources Li Ziyin

面向“十五五”：数字技术赋能产业结构现代化的逻辑阐释、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

张克成,刘 波

(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十五五”时期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数字技术对建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作用越发凸显,其通过技术智能性、技术高效性、技术引领性对产业结构现代化形成深度赋能,成为推动产业结构向高级化、智能化、协同化转型的核心动能。然而,实践过程中仍面临数字基础设施支撑不足与鸿沟凸显、高端人才队伍结构性短缺与培养模式脱节、长效机制保障滞后与政策激励不足等现实困境。为此,应系统化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多层次构建数字人才队伍、全方位完善政策保障体系,方可充分释放数字技术对产业结构现代化的驱动效能,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产业根基。

【关键词】“十五五”时期;数字技术;产业结构

中图分类号:F49;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089(2025)04-0005-05

2025年10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明确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1]摆在战略任务的第一条,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十五五”时期现代化体系建设的高度重视。建设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一体推进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更要不断促进产业结构迈向合理化以至现代化。在促进产业结构现代化的过程中,数字技术凭借其智能性、高效性和引领性,发挥着不可或缺的赋能作用。

依据《建议》的部署,“十五五”时期,将加快高水

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一方面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另一方面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届时,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将更加深刻地重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为驱动产业结构实现现代化提供更为关键、精准、强劲的赋能。事实上,从传统产业数字化升级到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化发展,数字技术的赋能效应已渗透到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各环节。然而,也应清楚认识到,在“十五五”这一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数字技术与产业深度融合仍面临诸多现实梗阻,制约着产业结构现代化进程。基于此,本文通过系统剖析数字技术赋能产业结构现代化的内在机理、现实

作者简介:张克成,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比较政治学理论与方法;刘波,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困境与突破路径,以期为“十五五”时期破解赋能难题、加速产业高质量转型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引。

一、数字技术赋能产业结构现代化的逻辑阐释

数字技术之所以要赋能产业结构现代化,是产业发展决策精准化、效率提升化与价值拓展化的内在需求。而数字技术之所以能赋能产业结构现代化,关键在于其所具备的智能性、高效性和引领性等突出特质。智能性因应决策精准化、高效性助推效率提升化、引领性驱动价值拓展化。这种高度契合、精准匹配的关系,恰是数字技术赋能产业结构现代化的逻辑所在。

(一)技术智能性:重构产业运行的精准决策体系

第一,数字技术助力传统产业革新生产模式,为生产过程的精准化与自适应提供工具保障。一方面,数字技术重塑工业生产逻辑。依托智能设备与工业互联网平台,企业可实时采集全流程数据,经AI算法深度分析实现故障诊断、趋势预测,让生产兼具高精度与强稳定性,加速制造业向智能制造转型。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助力传统农业降本增效、提质增产。比如,利用物联网与传感器技术进行“天地空”一体化检测与智能灌溉施肥;通过大数据与人工智能进行产量预测、病虫害智能诊断与预警,推动农业生产升级为“可感知、可控制、可预测”的数据驱动模式。

第二,数字技术辅助现代企业调优决策方式,为其科学决策和精准施策提供智力支持。一方面,打破信息孤岛,以数据驱动消解决策的主观偏差。传统决策模式依赖管理者的主观经验以及直觉判断,存在信息不对称以及认知偏差问题。^[2]而借助大数据分析 with AI 算法,企业可深度挖掘数据关联规律,大幅提升战略规划、产品研发等核心决策的精准度与前瞻性,规避主观臆断带来的决策失误。另一方面,强化动态响应能力,让决策适配市场迭代节奏。数字技术支持实时数据采集与动态监测,通过工业互联网、物联网设备等实现全流程数据实时反馈,依托模拟推演技术,对不同决策方案进行场景化仿真,预判实施效果与潜在风险。例如,面对消费需求波动,企业可快速调整生产计划与库存布局,借助模拟工具优化营销方案,让决策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预判。

第三,数字技术促使现代产业创新供给形式,为其从标准化生产向个性化定制转型提供关键支撑。一方面,数字技术能够对个性化需求进行精准捕捉。传

统模式下,对个性化需求的识别主要依赖市场调研和销售反馈。而数字技术能够分析用户在特定场景下的行为和偏好,可以帮助企业为用户量身定制符合其需求的产品服务。^[3]比如,通过VR看房、AR试妆、3D产品渲染,产品的使用场景生动地展现在用户面前,极大地激发了用户的购买欲望。另一方面,数字技术能够对个性化订单进行高效响应。通过云平台,品牌商可以与众多供应商共享部分订单数据,供应商得以预知个性化物料的需求,提前做好准备。借助AI算法,能够高效推演所有个性化订单的工序、物料、设备等因素,计算出生产顺序和资源调配的最优解。

(二)技术高效性:优化产业资源配置与协同效率

第一,破除信息壁垒,实现资源无缝对接。数字技术使传统产业链中“信息孤岛”的问题得到解决。一方面,构建泛在、即时的信息网络,消解了“信息孤岛”的存在基础。通过对产业链上下游的海量数据进行实时采集与智能分析,生产要素的分布、流动方向和闲置状态高度透明,资源得以精准配置到效益最高的环节。另一方面,重塑业务流程与协同模式,提升了产业整体协作效率。产业大脑、工业互联网、区块链等技术的应用,促使设计、生产、物流、服务等各个环节不再是孤立的节点,而成为一个可以并行作业的有机整体。

第二,降低交易与协作成本,放宽产业准入门槛。基础设施层面,云计算使企业无需自建数据中心,且不用承担冗余成本,转而可以按需从云端租用计算、存储和网络资源。运营协同层面,视频会议与协同办公软件直接削减了高频次的差旅费用,大幅压缩了各类成本。信任与交易层面,区块链技术通过分布式账本、智能合约等创新机制,构建了一种不依赖于传统中介的可信环境,降低了信任成本。

第三,构建柔性供应链,提升产业体系韧性。一方面,通过供需精准匹配,实现供应链动态适配。依托物联网、大数据实时采集终端消费需求、生产进度、库存水平等多源数据,借助AI算法精准预判需求趋势,同时通过工业互联网平台打通上下游企业信息壁垒,推动生产、采购、物流环节协同联动。另一方面,通过全链风险管控,强化供应链抗冲击韧性。面对原材料短缺、物流中断等外部冲击,传统供应链易出现“断链”风险。而数字技术通过智能调度系统优化物流路线,结合多源供应渠道布局,构建“去中心化”供应网络。

(三)技术引领性:开辟产业价值创造新赛道与新空间

第一,数字技术促进颠覆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创生。一方面是催生新兴产业。数字技术作为新兴技术,其应用必然带来新兴产业的勃发。如人工智能技术孕育了AI芯片、算法模型服务商;VR/AR技术正在培育元宇宙产业,涵盖虚拟社交、数字藏品等新业态。另一方面是孵化未来产业。未来产业关系国家未来竞争优势,需要具有突破性和颠覆性的前沿技术予以支撑和驱动。^[4]而数字技术不仅是颠覆性前沿技术产生的基础和土壤,而且其自身还拥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因而能够加速未来产业从概念构想走向现实落地。如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需依托数字孪生、大数据等技术手段。

第二,数字技术深化产业跨界融合、重塑产业边界。一方面,数字技术促进农业与工业、服务业融合。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推动了“第六产业”,即以第一产业为基础,以第一产业从业者为主体,通过促进一二三产业一体化发展来提高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效益、增加农民收入的一种综合性发展策略和模式^[5]的兴起,例如,一个农场不仅生产农产品,还通过智能生产线将农产品加工成食品,并借助电商直播进行营销和体验服务。另一方面,数字技术深化工业与服务业融合。工业与服务业的融合是产业融合最为活跃的领域,二者的融合产生了面向工业的生产性服务业,即工业服务业。^[6]依托数字技术,制造业企业得以从单一产品供给者转变为“产品+服务”一体化解决方案的提供者,价值链重心由制造环节向服务环节不断延伸。

第三,数字技术日益成为把握产业主导权的核心所在。操作系统、超级App等数字载体,通过汇聚各类主体,构建起强大的网络效应和用户锁定效应,不仅增强了平台粘性与市场竞争力,更在产业层面形成了显著的先发优势。可以说,数字时代的竞争已升维到以平台为核心的生态系统之间的整体较量。在此背景下,占据生态位上游的企业,就实质上掌控了行业标准、数据资源和价值分配的主导权——既能定义技术接口与标准,又主导着关键数据要素的流转与增值过程,进而在全球产业链中主导利润分配格局,引领产业变革的方向与节奏。

二、数字技术赋能产业结构现代化的现实困境

数字技术赋能产业结构现代化,既是“十五五”时期产业发展的必然方向,却也面临着来自物质基础、人才队伍、规则制度的立体化挑战。

(一)数字基础设施支撑不足与鸿沟凸显

第一,关键基础设施仍存短板,高端芯片供给不足。一方面,我国在光源层面的EUV光刻及浸没式光刻,元器件层面的物镜和光栅系统、材料层面的光刻胶及涂胶显影等领域相对于国外主要机构存在明显技术差距。^[7]这使得先进芯片的量产困难重重。另一方面,高端芯片设计所必需的EDA工具、底层架构以及与之绑定的软件开发环境,仍严重依赖国外生态。来自美国的新思科技、楷登电子、Ansys和德国的西门子EDA,几乎垄断了全球的EDA市场。^[8]

第二,基础设施覆盖存在不均,数字鸿沟阻碍全域赋能。一方面,东西部与城乡差距明显。东部地区设施完善、人力资本密集,而中西部受经济和人口制约,网络覆盖与质量相对滞后;城市5G与云计算设施集中,农村5G、千兆光纤等仍待补强。另一方面,企业分化严重。优势区位企业在效率、成本和资源获取上更具竞争力,而处于“数字洼地”的企业则因基础设施薄弱面临市场边缘化的风险。

第三,数据要素价值释放受阻,信息孤岛普遍存在。一方面,由于权属不清、标准缺失、交易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大量数据沉淀在不同主体内部,无法有效进入市场参与配置,限制了智能决策和模式创新。另一方面,政府部门、行业及企业间数据壁垒森严。这种割裂状态使得技术、市场、供应链等信息无法在产业生态内顺畅流动,阻碍了基于数据驱动的跨领域、跨行业技术融合与商业模式创新。

(二)高端人才队伍结构性短缺与培养模式脱节

第一,“数字尖兵”与“产业专家”融合的复合型人才极度稀缺。一方面,技术供给与产业需求脱节。纯技术背景人才虽擅长算法、平台与模型开发,却缺乏对各类产业场景的深度理解,导致数字技术难以融入价值创造核心。另一方面,跨领域协同不足,缺乏能够贯通技术与产业的“总架构师”。产业结构升级需要既懂技术又懂产业逻辑的复合型人才来搭建桥梁、设计系统方案。此类人才的缺失,使得技术与产业团队难以达成共识,数字化改造往往只能停留在单点优化层面。

第二,人才培养体系滞后于技术迭代与产业发展需求。一方面,培养内容与模式错位。高校课程更新缓慢,难以跟上 AI、工业互联网等技术迭代节奏;产教融合流于形式,学生缺乏真实产业场景的锻炼。另一方面,长效迭代与持续学习机制缺失。课程、师资与产业需求之间缺乏动态衔接,而在职人员的数字技能培训又呈现碎片化、同质化,难以支撑人才持续升级,导致整体队伍跟不上技术变革的步伐。

第三,数字化人才在产业间分布失衡且流失严重。一方面,人才高度集中于互联网等领域,而制造业、农业等实体产业则面临突出的人才缺口,导致数字技术资源配置错位。另一方面,实体产业受薪酬、发展空间等因素影响,数字化人才持续流向高薪行业或地区,造成企业数字化项目中断、经验难以传承,不仅推高了用人成本,也削弱了企业持续投入的信心,致使实体产业难以形成稳定的数字化生态。

(三)长效机制保障滞后与政策激励不足

第一,法律法规与治理体系滞后于技术发展。一方面,监管层面存在制度不健全与能力不充分的困境。面对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诸多新挑战,时常出现无法可依或责任主体不明的情况。此外,监管机构在专业认知与技术手段上也面临能力空白的现实困境。另一方面,传统监管规则难以适应现实治理需求。比如,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虽然出台了《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对算法歧视、“大数据杀熟”等行为作出了针对性的规制,但仍局限于规制工具主义范畴,没有涉及监管部门应依赖的技术监管原则与技术监管方式。^[9]

第二,标准体系与互通互认机制不健全。一方面,标准体系碎片化且更新滞后,引发技术应用混乱。当前相关标准缺乏顶层统筹,不同行业、区域各自制定规范,导致数据格式、接口协议等标准不一,形成“各自为战”的碎片化格局。另一方面,跨域互通互认机制缺失,阻断产业链协同链路。目前缺乏全国统一的标准互认平台,跨行业、跨区域的标准兼容性差,如制造业的生产数据标准与服务业的服务数据标准无法互通,区域间认证结果互不认可。

第三,创新激励与风险共担机制仍不完善。一方面,政策支持精准性与落地性不足。申报门槛高、流程繁琐,导致企业对接成本高、获得感弱,政策激励效

果大打折扣。另一方面,“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缺乏有效的利益分配与风险共担机制。关键数字技术攻关具有投入大、周期长、不确定性高的特点,而当前各方权责模糊、利益共享不均、风险分担失衡,难以形成可持续的协同合力。

三、数字技术赋能产业结构现代化的突破路径

“十五五”时期,以数字技术赋能产业结构现代化必须系统化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多层次构建数字人才队伍、全方位完善政策保障体系。

(一)筑牢底座:系统化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第一,攻坚关键核心,打造自主可控的“硬支撑”。其一,靶向突破“卡脖子”技术。聚焦核心梗阻,依托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进行集中攻关,为智能产线、数字孪生等场景规模化落地扫清障碍。其二,构建协同创新攻关体系。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打破产学研用壁垒,整合高校基础研究资源、科研院所技术攻坚能力与企业工程化经验,通过联合实验室等形式,提升创新转化质效。其三,筑牢自主数字生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与标准引领,推动自主技术与行业应用深度适配。

第二,推动普惠接入,构建广泛覆盖的“高速路”。其一,优化算力资源配置。深化“东数西算”工程,构建“全国一盘棋”算力网络体系,既释放西部算力资源潜力,又满足东部产业数字化对高密度算力的需求,为跨区域产业协同提供保障。其二,强化数字基建深度覆盖与成本优化。加速 5G、千兆光网向工业园区、县乡村延伸,并通过补贴和普惠套餐降低中小企业用网成本。其三,搭建公共服务平台。培育跨行业、跨区域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整合轻量化数字工具,助力中小企业便捷接入数字化生态。

第三,促进数据融通,激活要素价值的“新引擎”。具体而言,要以“一体两翼”的格局推进数据要素市场高质量发展。一方面,从“一体”来看。要按照“1+N+X”(“1”是指 1 个顶层的国家级交易场所,“N”是 N 个区域级交易场所,“X”是由政府或平台型企业搭建的若干个行业级交易场所或交易平台)的总体布局,着力建设全国一体化数据交易场所。^[10]另一方面,从“两翼”来看。一要探索建立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和安全治理等基础制度,为数据要素化保驾护航;二要建设高速互联、高效调度、开放普惠、安全可靠的国家数据基础设施为重点,打通数据流通动脉、畅

通数据资源循环、推进数据应用开发。^[11]

(二)铸就核心:多层次构建数字人才队伍

首先,要深化产教融合,培育“数字+产业”的复合型人才。一方面,持续生成新的人才增量。大力推动高校与龙头企业深度合作,通过联合共建现代产业学院、共同开发数字化课程、合作编写实战型教材,将企业的真实项目和前沿技术引入课堂,帮助学生及时掌握产业发展现状。另一方面,积极盘活现有人才存量。聚焦在职人员的数字能力提升,通过开设数字夜校等方式,针对性地开展前沿数字技能实训,提升现有产业大军的数字化素养。

其次,要实施精准引育,汇聚高水平的数字创新人才。一方面,精准引进紧缺高端人才。聚焦数字技术赋能核心环节,靶向引进掌握高端芯片、工业软件、数字孪生等关键技术的领军人才,快速补齐高端人才缺口。另一方面,系统培育本土复合型人才。完善人才评价机制,突出数字技术转化成效与产业赋能贡献,激发本土人才创新积极性,构建“本土培育+外部引进”的人才供给体系。

最后,要优化评价激励,营造人才干事创业的发展环境。其一,深化人才评价体系改革。坚决破除“唯论文、唯职称”等传统倾向,建立以能力、实绩和成果为导向的多元评价机制。其二,鼓励和支持企业构建更加灵活、多元的中长期激励机制。积极推广股权激励、期权计划、项目分红、岗位分红等现代激励手段,强化利益共享与风险共担。其三,大力营造鼓励探索、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通过政策引导与宣传示范,让勇于创新、专注攻关成为社会共识,使人才能够安心研究、潜心攻坚。

(三)优化环境:全方位完善政策保障体系

第一,创新包容审慎监管,构筑敏捷治理的安全屏障。一方面,推行包容的“沙盒监管”机制。针对人工智能等新业态,建立划定边界、可控可退的试错空间,在明确安全底线的前提下,允许市场主体开展创新探索。另一方面,构建科技赋能的智能监管体系。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为支撑,搭建具有“数字化、全链条、一站式、智慧化”为特征的政府监管数字化应用平台^[12],实现对产业数字化全流程的实时监测、精准预警与高效处置,从而提升监管效能与响应速度。

第二,统一标准与接口,打造互联互通平台。一方

面,制定适配产业需求的国家标准体系。由政府主导,加快出台工业互联网平台架构、跨领域数据接口、安全认证规范等强制性或推荐性国家标准,让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企业的数字化系统有统一遵循。另一方面,推动全链条互联互通互操作。聚焦产业链核心环节,打通各类数字化工具的兼容壁垒,支持跨行业、跨区域的技术适配与标准互认,提升产业协同效率。

第三,强化精准政策激励,为转型升级提供有力支撑。一方面,推出普惠精准的转型扶持政策。聚焦中小企业核心困境,设立数字化转型专项基金,同时优化专项贷款贴息等金融支持,切实减轻中小微企业资金压力。另一方面,加大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激励力度。对高端芯片、工业软件等重点领域攻关项目给予定向补贴与资金扶持。同时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机制,鼓励科研人员与企业共享创新收益,充分激发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的协同创新动能。

参考文献:

- [1]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三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N].人民日报,2025-10-29(01).
- [2]赵加军.大数据助力企业管理决策智能化与精细化[J].数字经济,2025,(04).
- [3]李鑫,许峰,马良栋,等.数字技术驱动服务型制造的机理及典型案例研究——以浙江省嘉兴市为例[J].数字化转型,2025,2(09).
- [4]李晓华,王怡帆.未来产业的演化机制与产业政策选择[J].改革,2021,(02).
- [5]路征.第六产业:日本实践及其借鉴意义[J].现代日本经济,2016,(04).
- [6]赵海峰,冯验晶,Khalik Noshawan.面向工业的生产性服务业:工业服务业[J].管理,2024,(02).
- [7]张慧婧,胡思思,盖爽,等.集成电路制造装备发展态势及关键技术分析[J].机械设计与制造,2025,(10).
- [8]须江,张薇.数字经济的基石:芯片技术的“危”与“机”[J].中国科学院院刊,2024,39(09).
- [9]孙晋.数字技术规范法律化与数字平台善治[J].中外法学,2025,37(05).
- [10]窦悦,郭明军,张琳颖,等.全国一体化数据交易场所体系的总体布局及推进路径研究[J].电子政务,2024,(02).
- [11]加快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N]经济日报,2025-10-9(10).
- [12]王岭.数字经济时代中国政府监管转型研究[J].管理世界,2024,40(03).

责任编辑:刘国强

人类文明新形态视域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文化传承发展的路径探析

李强,胡欢

(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摘要】 从时间维度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迫切期待蓬勃新生,而初具规模的人类文明新形态面对挑战,正朝向来路找寻血脉基因;从理念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内蕴相契合,二者相互涵养具备可行性前提;从实践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转型追寻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成熟的合理探索也正相互交汇,并行前进。基于三重耦合关系,两者间的转化应用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主体构架、价值导向、前景目标三个核心要素层面得以实现。未来,需进一步把握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契机,以推动“两个结合”实现文明现代转化,以巩固文化主体性筑牢文化传承根基,以传承升华民族文化引领价值理念跃升,以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增强文明包容互促。

【关键词】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人类文明新形态;耦合转化;传承发展;路径探析

中图分类号: D61;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089(2025)04-0010-05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1][2]}当前,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仍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场域下,不仅仅承载着民族与国家的复兴梦想,还正奋力实现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化的世界转向^[2]。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不应拘囿于一国一族的特殊性文化,而是要兼具民族

特性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世界文明,连接传统、现代与未来的新的文化生命体^[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实现传承发展就需要应对时代之变,将文化与文明的转向深度考量,做出相应的路径选择,在保持文化的主体性与加强民族文化认同的同时,彰显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作为古老基因赓续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人类文明新形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历史、理念与实践三个层面上天然存在着深层次的耦合关系,两者间耦合转化的初步实现为探索

作者简介:李强,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转化与应用;胡欢,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当代治理理论与实践研究。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实践路径提供了新的视角。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耦合关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深层耦合,是文明基因的历史性延续与现代性重构的基本前提。从血脉的连贯到内核的稳定,再到实践的共同追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历史之“厚”、理念之“新”、实践之“活”与人类文明新形态连接融通,奋力书写人类文明形态更迭的中国叙事。

(一)历史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新生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化血脉

中华文明作为唯一绵延至今且未曾中断的原生文明,积淀了“天人合一”“和合共生”“天下大同”等思想精华,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根基。在马克思主义文明观视域下,这种连续性不仅赋予中华文明独特的历史纵深,也为文明形态的演进提供了内在的稳定性支撑。近代以来,中国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浪潮中遭遇“文明蒙尘”^[4],其本质是传统农耕文明与近代工业文明之间生产力代差的结构性矛盾。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虽然在上升阶段释放出巨大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5],但其内在的逻辑必然引发文明的异化。资本对劳动的支配使“自由平等”沦为形式化口号,实质是“物的依赖性”掩盖了“人的独立性”。这种文明形态已显现出深刻的衰颓征兆,标志着其已抵达历史暂时性的边界,亟需被更高级文明形态扬弃。^[6]当前,人类文明正处于从量变积累迈向质变飞跃的关键临界点,呼吁着新的文明形态的诞生。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立,正处于这样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要与旧的资本主义文明形态有效抗衡,使其赢得世界人民的广泛认同,并牢固植根于时代发展的潮流之中,就必须深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思想养分,确立自身的历史根基与文化血脉,塑造兼具中国特色和世界意义的文明新形态。

(二)理念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内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在当代仍具有重要价值,正是因为其内在机理与精神内核深刻回应了人类对“和平”“安定”“幸福”的永恒追求,展现出跨越时空的伟大价值,即使时过境迁、沧海桑田,它仍可作为中

国人民的精神灯塔与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现实作用。^[7]诸如“天人合一”“以民为贵”“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等思想体现了古人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深刻思考,也映射出人类对良好生存秩序、社会和谐与文明进步的普遍愿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下,这些理念不仅构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更与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8]和“人与自然真正和解”^[9]等核心主张形成深层次价值共鸣,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焕发新的生机。相较于当前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中所暴露的生态危机、劳动异化与安全威胁三重结构性矛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倡导的整体思维、天下情怀与和谐观念,更加契合“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也为构建可持续、可共享的现代文明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一种旨在回应时代挑战、引领未来走向的新型文明范式,内在具有对“和谐”品质的追求,更贴近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共同期待,也更符合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一崇高理想。人类文明新形态所承载的价值内蕴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高度契合,共同指向一条超越资本逻辑、实现人的真正解放与全面发展的文明新路。

(三)实践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转型追寻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合理探索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指引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历经近代文明蒙尘的艰难阶段,却在新时代被赋予了辩证扬弃与创新发展的历史使命。对待传统文化,既不能陷入文化保守主义的全盘接受,也不能走向历史虚无主义的全盘否定,而应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保留具有跨越时代意义的哲学智慧、人文精神与道德理念,剔除其中受制于历史阶段局限的陈旧观念与落后成分,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其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与先进文化相适应。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真理之光激活传统文化基因,通过“第二个结合”推动其实现生命更新与现代转型,逐渐构建起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与文化自强的良性循环机制,不断重塑具有当代意义和世界价值的中华文化主体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类文明新形态”,本质上是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实践载体、以“两个结合”为生成逻辑的文明综合创新。^[10]其建构法则需从文明根基、文明结构、

文明价值等层面进行多维度考量。在文明根基上,坚守马克思主义“魂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的辩证统一;在文明结构上,实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协调演进;在文明价值上,超越资本逻辑下的异化文明,致力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面向未来,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纵深发展仍需深化双重实践互动。一方面,通过“两创”机制推动传统文化资源向现代性文明要素转化,使其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淬炼文明新形态的理论自觉与制度形态,使传统文化的转型追寻与新文明形态的建构探索在历史辩证法的指引中实现更高层次的统一。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耦合转化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厚的积淀与滋养下,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实现了传统价值与现代文明的有机融合。这一耦合转化可具象化为三个维度的升华:从“天人合一”“以和为贵”到以“和谐”为核心的主体构架;从“民贵君轻”“民为邦本”到“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从“天下大同”“天下为公”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愿景。三个维度共同塑造出一种既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传统,又积极面向全人类共同未来的新型文明形态,不仅为世界提供了超越零和博弈、迈向共生共荣的文明新方案,也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古老基因与厚重生命力得以焕发新生、赓续传承。

(一)从“天人合一”“以和为贵”到以“和谐”为核心的主体构架

春秋战国时期,道家提出“天人合一”思想,以“天道”为自然之本,倡导“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宇宙共生理念;儒家则主张“礼之用,和为贵”,从伦理实践出发,以礼制规范协调人际关系、构建社会秩序。二者共同形成中华文明处理主客体关系的辩证统一观,体现出以“和”为核心的价值追求。这一思想谱系经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凝练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和谐”价值内核,并具象化为“五位一体”的系统性文明结构:物质文明奠定发展基础,政治文明提供制度保障,精神文明引领价值导向,社会文明协调群体关系,生态文明确立存在前提,五大子系统通过动

态平衡机制实现协同演进,其本质特征体现为结构要素的互嵌性、发展进程的协调性。^[11]反观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体系,其内在矛盾表现为三重异化:劳动逻辑屈从资本逻辑引发剥削性积累,导致阶级对立与生态危机;文明单线论陷阱以“普世价值”掩盖文化霸权,加剧文明冲突;权利不均衡性使政治文明沦为资产阶级统治工具,社会文明呈现中心-边缘等级结构^[12]。这种对抗性机理与“和谐”理念根本背离,其所引发的生态崩溃、文明冲突与社会撕裂等全球性危机,正促使国际社会对现代化路径进行深刻反思,也为新文明形态的诞生提供了历史契机。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载体,在超越西方现代化刻板模式的同时,彰显出全人类共同价值,使璀璨的中华文明在人类走向现代化的大道中熠熠生辉。

(二)从“民贵君轻”“民为邦本”到“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

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理念经由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主张以及荀子“君舟民水”的认识得以不断深化。这一思想不仅构成历代治世的合法性根基,更在历史实践中印证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政治规律。尽管君主专制制度已终结,但“民本”思想作为中华政治文明的核心基因并未消弭,反而在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融合中实现创造性转化。中国共产党基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唯物史观立场,将传统民本精神升华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并通过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一系列重大实践,彰显了人民主体地位的充分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超越了传统民本思想的阶级局限性,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核心基石。其一,它明确将“人”视为文明形态的逻辑起点,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发展的根本目标,从而规避资本主义文明中因“物本位”而导致的异化危机;其二,它强调人民是文明的创造主体,通过激发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与构建发展成果共享的机制,推动人的全面发展。这不仅是对“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传统理想的现代回应,更以其鲜明的人民性内核为人类文明演进提供了新范式。

(三)从“天下大同”“天下为公”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景目标

“天下大同”与“天下为公”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

价值,体现了中华民族对理想社会的终极关怀,其内涵兼具地理空间与文化心理的统一性^[13]。“大同”出自《礼记》,蕴含着没有差异、没有战争、社会和谐、人民安居乐业的理念,虽诞生自古代中国,却超越了时代与地域的限制,承载着人类对美好社会的共同想象。从春秋末年至秦汉,农家“并耕而食”、儒家“大同”设想是其主要类型;自西汉中叶至鸦片战争前,封建社会形态的中国将农家和儒家的思想传承延续,但新的模式并未出现;近代以来,中国遭受侵略,丧权辱国,面对社会激变,“天下大同”的模式出现了新变,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大同理想都受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影响并对其产生了依赖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百年实践,推动中国实现“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飞跃,为文明理念注入现代活力,“天下大同”已逐步演进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构建与实践探索。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气候治理,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面对贸易保护主义与逆全球化思潮抬头,中国倡导主要经济体强化共同体意识与系统观念,加强国际合作,助力世界经济稳定复苏。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将全人类的长远福祉置于重要位置,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积极推动各国共同进步。这一实践不仅深化了对人类社会整体的科学认知,更使传统理念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架构下焕发新伟力。从“天下”到“人类”,从“大同”到“命运”,其精神内核一脉相承,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跨越民族界限,与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未来的向往相连接,展现出中华文明在全球舞台上的独特魅力与价值优势。

三、人类文明新形态视域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传承发展的路径启发

在全球化与现代化交织的时代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同时也面临诸多现实挑战。其当代转型与传承发展,是以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依托的一场深刻的文化重构。未来需进一步把握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契机,通过耦合转化的纵深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延续中华文脉,重塑人类文明发展的坐标,彰显“古老的文明”与“未来的形态”的历史辩证。

(一)推动“两个结合”,实现文明现代转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之间的耦

合转化关系,并非表层的形式嫁接,而是深植于历史逻辑与实践理性中的辩证统一过程。这一过程以“两个结合”为核心动力机制,通过双重维度的互化与重构,实现文明基因的现代性跃迁。在认识论层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其真理力量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推动其从历史资源转化为现代文明的内生动力。这是一种双向互构而非单向灌输,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因融入中华文化的民族特质而更具本土适应性和实践活力,中华传统文化则通过吸收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与时代性,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创造性转化。二者在契合点上发生深刻的“化学反应”,超越简单的理论叠加,形成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在实践论层面则体现为传统文化基因的现代转译与功能转化。例如,“和而不同”的观念融入文明交流互鉴,消解了西方文明的二元对立逻辑;“格物致知”的观念融入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成为生产力跃迁的文化支撑。这一耦合转化过程,既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最终在文明形态层面凝结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与社会文化有机融合的人类文明新形态。通过系统性的逐步跃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真正完成了现代转化与生命再生。

(二)巩固文化主体性,筑牢文化传承根基

中华文化主体性作为民族文化系统在历史演进中形成的自主意识与创造能力的集中体现,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建构的核心支撑。^[1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15]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被置于全球文明的复杂场域时,其生存发展的关键在于精神内核的稳定性。这一过程本质上就是一条文化主体性不断强化、同时又在全球视野下不断创新的进路。在价值维度上,要坚守“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等核心价值理念,批判超越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中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彰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社会主义文明先进性;在历史维度上,要保持对中华文明五千年连续性的自觉认知,依托“从历史深处走来”的厚重底蕴,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厘清文化发展脉络;在实践维度上,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根本方法,培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我更新与自我调适的能力,构建兼具古典性与

现代性的文化生命体,实现“崇古而不泥古、创新而不忘古”的辩证发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赓续传承中与时俱进,要在日新万变中始终保持血脉绵延的主体性根基,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奠定既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又蕴含世界意义的文化基础。

(三)传承升华民族文化,引领价值理念跃升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植于中华民族五千余年的历史实践,其民族性特质体现为独特的价值体系、文化基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须承担起双重使命,对内持续推进中华文明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对外积极贡献于人类整体的文明进步。当今世界存在民族、宗教、制度等多重矛盾,诸如生态治理、发展失衡等全球性危机也愈发凸显出人类命运紧密相连。中华文明需以“和合共生”“包容互鉴”等理念为价值内核,通过文明对话消解西方中心主义的叙事霸权,进而引领多元文明共同发展的新秩序。这既彰显中华文明守正创新的现代生命力,也通过提供中国方案重构人类文明演进逻辑。人类文明新形态因其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追求、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践行,成为一种既扎根民族传统又胸怀人类命运的文明样态,标注了中华民族从文化自觉迈向文明自信的历史新坐标。与此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参与这一新形态的构建,在世界性转向中实现本体性升华,其民族性基因转化为解决人类共性问题的智慧资源,最终实现从“民族自述”到“世界性价值供给”的跃升。

(四)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增强文明包容互促

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使历史进入世界历史阶段,各民族文化在这一进程中不可避免地相互碰撞、交织与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耦合转化这一过程揭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必须依托文明交流互鉴。这一实践路径主要聚焦于三个维度。首先是文化根脉与时代创新的辩证统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根脉”,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深厚的历史底色与精神底蕴;马克思主义的“魂脉”赋予传统文化现代性批判与重构能力,形成守正创新的文化生命体。这种转化并非简单复刻传统,而是通过文明互鉴筛选、调适与升华传统基因,使其适配全球现代性挑战。其次是主体性与开放性的辩证统一。

中华文化主体性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根基,但主体性绝非排他性,中华文明自古以兼收并蓄为特质,其文化生命力正源于对异质文明的包容吸纳。人类文明新形态通过积极参与全球文明交流合作网络,将中华文明置于多元文明的交流激荡之中,以差异性丰富普遍性,从而避免走向文明固化与僵化。最后是本土实践与世界意义的辩证统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需超越“古今中西之争”,在宏大视野中实现文明交融,在具体实践中重构价值普遍性。概言之,传统文化若封闭自守、仅限于自我叙述,终将丧失现实相关性;只有主动参与全球文明对话,才能充分激活其应对现代性问题的潜力,在文明多样共生的全球图景中,彰显中华文明的当代价值与深远意义。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在文化遗产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2]许纪霖.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438-440.
- [3]吴宏政.“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内涵与特征——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视角[J].中国社会科学,2024,(12):4-22+199.
- [4]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1-07-02(002).
-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79.
- [6]朱文婷,孙绍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基础、价值取向与发展进路[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52(03):9-17.
- [7]张芳娟.文化主体性视角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研究[J].理论视野,2025,(04):53-59.
-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83.
-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61.
- [10]刘建武.“两个结合”与新的文化生命体的造就[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5,(03):21-29+150.
- [11]邱吉,贾蕾.“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科学内涵[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2,8(04):90-97.
- [12]王广.从文明的“他述”到“自述”——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历史意义[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4,(12):36-46+148.
- [13]李宪堂.大一统的迷境——中国传统天下观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7-8.
- [14]杨生平,潘玥斐.人类文明新形态理论视野下的中华文化主体性研究[J].求是学刊,2024,51(06):18-27+2.

责任编辑:常馨月

“两个结合”视域下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创新

谢一迪,何家旭

(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

【摘要】“两个结合”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理论成果,贯穿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整体构建与理论创新全过程。从生成逻辑上看,“两个结合”所蕴含的理论要素,奠定了其理论底色,塑造了其思想特色,并为其发展注入了持续动力。从根本遵循上看,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第一个结合”中拓宽实践向度,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与时代之问;在“第二个结合”中纵深思想维度,高扬文化主体性,筑牢文化自信根基。基于此,坚持“两个结合”,要在坚定文化自信中提升文化的引领力凝聚力感召力影响力、在守正创新中不断激活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在开放包容中凝聚全人类共同价值。

【关键词】“两个结合”;习近平文化思想;理论创新

中图分类号:A81;D61;G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089(2025)04-0015-06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两个结合”这一重大理论命题,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创新发展的内在路径与实践方向。随后,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阐释了“两个结合”在开创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历史性意义,明确指出“两个结合”是推进党

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必由之路”、“最大法宝”^[2]。“两个结合”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程的深刻总结,也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建构中的自觉性和创造性,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向。基于此,在“两个结合”思想视域下系统分析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成逻辑、根本遵循和使命追求,有助于深刻认识“两个结合”与习近平文化思想创新之间的内在联系与理论脉络。

基金项目:2024年度黑龙江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重点项目“思政课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力量根基的教学资源建设研究”(SJGSZ2024009)

作者简介:谢一迪,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习近平文化思想;何家旭,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习近平文化思想。

一、“两个结合”下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成逻辑

“两个结合”中蕴含着三个理论要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三个要素相互交织，贯穿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整体建构和理论创新全过程，深刻体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历史和实践生成逻辑。

(一)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底色

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历史发展规律的同时，也认识到文化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特殊作用，并形成了关于人类文化发展的思想和观点。随着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发展，逐渐造就了其实践性、人民性、批判性、开放性的理论品格，为习近平文化思想奠定理论底色。

其一，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实践性指导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与时俱进的文化发展。“面向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重要品质，强调关注现实世界并诉诸社会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深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宏观上关注人民文化现实需求、民族文化发展现实和世界文明进步等问题，微观上在网络文化发展、新闻传媒发展、哲学科学工作、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亦提出一系列文化建设理论。其二，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人民性奠定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人民至上的文化本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价值归旨就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指出以科学知识、价值观念、制度文化为基本内容的精神文化为人类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并引导人民逐渐摆脱思想桎梏，迈向自由。习近平文化思想继承并发展了人民性，指出人民不仅是文化的创造者和实践者，要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还是文化成果的享有者和评判者，要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其三，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批判性奠定了习近平文化思想意识形态安全。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创造过程中就与批判性紧密联系：宗教批判、政治批判、法的批判，特别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正是批判性思维，指引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习近平文化思想继承批判性重要理论品格，强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抵御西方意识形态入侵和各种错误思潮影响。其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开放性奠定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中文明交流互鉴的文化交往思想。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随着世界市

场的开拓，“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3]，揭示了文化的世界性发展趋势。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包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文明交流互鉴包容”等重要内容，不仅是开放性的彰显，也为人类文明共同进步提供中国方案。

(二)历史逻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思想特色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数千年，在五千年历史长河中磨砺与创造，形成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即连续性、创造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习近平文化思想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扬文化主体性，坚定文化自信，展示了独特的思想特性。

其一，继承中华文明连续性，彰显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习近平指出：“我们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4]在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众多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等，创造出丰富的文化典籍、哲理思想等。这充分彰显了中华文明在历史长河中不断汲取文化养分以厚积薄发的历史主动精神和文化主体性。其二，继承中华文明创新性，彰显辉光日新的文化自信。文化的创新发展必须“把握时代脉搏，承担时代使命，聆听时代声音，勇于回答时代课题”^[5]。近代以来，在抵御列强侵略的斗争中凝结出革命文化，在新中国建设中创造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创造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并在新时代继续铸就文化新辉煌。其三，继承中华文明统一性，彰显团结统一的文化凝聚力。中华文明长期以来塑造了大一统的文化传统，形成了多元一体的团结统一文化格局。团结统一是文化凝聚力的前提，亦是文化凝聚力的重要彰显，“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6]。其四，继承中华文化包容性，彰显兼收并蓄的文化交往交流交融。中华文明的发展自古就与各民族文明和谐相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新时代文化建设传承开放包容的文化禀赋，既尊重多民族文化的各自特色，又凝结各民族文化的共同特征；既巩固本民族文化的文化主体性，又在交流互鉴中吸收人类优秀思想文化资源。其五，继承中华文化和平性，彰显和平和睦和谐的价值理念。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提出“四个共同倡导”的世界文明倡议，提出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逐渐破除各文明之间的隔阂和冲突、化解意识形态冲突,在反对西方文化霸权的过程中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三)实践逻辑:文化建设实践探索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发展动力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文化建设的实践为文化理论的发展提供不竭动力。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探索过程中,始终强调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在不同历史时期,赋予了文化不同的时代使命,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创新的实践性和时代性。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革命实践中创造了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等一系列红色革命精神,唤醒民族觉醒的意识,增进民族精神的独立,不断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英勇奋斗。这一时期也在实践中形成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强调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7],为文化的建设与发展提供方向和指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强调文化建设独立自主的原则。在对待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问题上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化思想;在促进文化繁荣发展、推进科学研究的问题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抵御西方意识形态入侵上提出“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8]。思想的进步激励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重新定位文化建设目标,提出“一定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9]。伴随经济发展提出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开展一系列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在吸取苏联解体教训中提出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建设什么样的文化指明方向。进入新时代,面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建设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在文化建设实践中提出“文化自信”“开放包容”“人类文明新形态”等一系列标识性概念,创造出“两个结合”“六个必须坚持”“七个着力”等丰富的思想理论,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创新发展。

二、“两个结合”下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根本遵循

“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推动理论创新的经验总结,不断拓宽理论创新的实践向度,纵深思想

体系的理论深度。因此在推动文化繁荣发展、建设文化强国的过程中,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本质方向,在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巩固文化主体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中促进文化繁荣。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把准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性质,坚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10]。在当今时代,多元思潮涌动,互联网的发展更是助长各种文化观念的传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文化造成影响和冲击。这就更需要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认识文化建设规律,指导文化建设和发展。

一方面,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性质。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依然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发挥着指明时代发展方向的真理作用,其内在伟力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内容的理论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首先是社会主义文化,区别于资产阶级文化以及其他文化的本质,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致力于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蕴含着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特有的精神追求、价值取向,彰显了社会主义文化的中国特色、民族特色。

另一方面,坚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11]。文化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集中体现,意识形态是文化软实力的核心要素。在全球化语境下,面对西方文化霸权和意识形态渗透,我国文化建设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方向,构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在国内各思潮涌动语境下,要不断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自身建树以坚定主流意识形态,同时在尊重差异中扩大思想共识、在多元激荡中保持思想定力、在包容多样中增进价值认同。因此文化建设过程中要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引领力和凝聚力,涵养和培育文化自信。

(二)坚持“第一个结合”:拓宽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向度,回答好文化建设的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中国具体实际”不仅包含着纵向维度上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特性,还包含着横向维度上中国各个历史

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发展阶段和特征。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下,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回答了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不仅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化内涵,而且拓宽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向度。

首先,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中回答中国之问。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一系列文化理论问题和文化实践问题^[12]。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化中国辩证发展中,逐渐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社会主义性质,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同时赋予中国特色,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民族特色的先进文化,推动文化建设繁荣发展。其次,在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过程中回答世界之问。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13]。面对全球发展、安全、文明冲突等问题时,习近平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以四个“共同倡导”作为核心理念,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绘制人类文明进步美好图景。再次,在坚持人民至上的原则中回答人民之问。人民至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立场和价值取向。在文化建设实践中要始终聆听人民群众心声,扎根人民现实生活,创造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最后,在把握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变化中回答时代之问。在文化建设过程中掌握历史主动需要通过文化发展回应时代课题、解决时代矛盾、引领时代发展。面对国内国际局势变化,既要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中保持自身文化主体性,又要在世界文明交流中创造有机统一的文化生命体,推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三)坚持“第二个结合”:纵深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思想维度,高扬文化主体性,坚定文化自信

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发展过程中,充分认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关系,拓宽了思想体系的理论维度。

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有力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14]。对于中华

文明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数千年文明发展精髓,其丰富精华和精神品质构成了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重要内容。对于中华民族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是中华儿女薪火相传的治世智慧,是子孙后代心灵寄托的精神港湾。对于世界文化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世界文化大花园中璀璨的明珠,是文化交流中保持自身文化特色的底气,是文化激荡中突显文化主体性的根本支撑。“文化根脉”“根与魂”“智慧结晶”“根基”等论述总结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的价值内涵,是继续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力量的重要支撑。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为坚定文化自信提供理论根基和文化根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强大的文化力量,成就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文化意义上的自我,而文化主体性构成了文化自信的根本依托,为凝魂聚力提供深厚的精神依托、为国家认同提供坚定的文化基础、为文化交流提供鲜明文化特性、为时代课题的解答提供文化思路。同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不仅为推动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注入真理力量,同时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植根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力量的结合拓宽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思想维度,并构成了文化自信的本源,为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书写文化建设新篇章奠定基础。

三、“两个结合”下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使命追求

在“两个结合”思想的指引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扎根实践“土壤”、坚守理论“魂脉”、赓续文化“根脉”,在坚定文化自信中提升文化的引领力凝聚力感召力影响力、在守正创新中不断激活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在开放包容中凝聚全人类共同价值,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再到文化主动的境界提升和使命担当,指引着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新的文化使命上形成新气象、作出新作为、创造新业绩。

(一)坚持“两个结合”:在坚定文化自信中提升文化引领力凝聚力感召力影响力

文化自信展现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自身价值

的深刻肯定和对自身文化的坚定信念。在党的“十五五”规划中强调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15]。因此,坚定文化自信,从而以文载道、以文聚力、以文育人、以文传声,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动文化强国建设。

第一,以文载道,高举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提升文化的思想引领力。在文化强国建设过程中,要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伟大的真理力量和道义力量,发展具有独特时代价值和自主思想意识的文化,在真理的指导下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想引领力。第二,以文聚力,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提升文化的精神凝聚力。充分发挥文化凝魂聚力的作用,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共同的思想基础,在多元文化激荡中畅享主旋律,汇聚同心同德、同向同行、同频共振的精神力量。只有共同的价值追求,才能充分调动全党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投身于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第三,以文育人,立德树人,提升文化的价值感召力。以文育人就要充分运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用先进优秀的文化资源来补足精神之钙、筑强信仰之基,弘扬正能量,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第四,以文传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在文化交流互鉴中提升文化的国际影响力。面对“文明威胁论”“文明冲突论”等舆论,要努力突破西方话语体系藩篱,向世界阐释中国智慧、中国精神,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和传播力。因此,要坚定文化自信,以独立的民族精神创造与现代文明相适应、与时代发展相契合的新文化;以宽广的文化创新空间创造中国式现代化的崭新文化形态;以坚定的文化软实力在世界舞台上彰显民族文化魅力,丰富人类文化发展的时代内容。

(二)坚持“两个结合”:在守正创新中不断激活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守正创新是“两个结合”这一方法论原则的根本特征,守正是创新的前提和基础,是进行创新性实践的原则遵守;创新是守正的目标和动力,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在创新中推动实践并开创未来。坚持“两个结合”就要将守正和创新二者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不断激活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

活力。

“守正”是坚持马克思主义“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是推动文化繁荣的根本遵循。只有守住“魂脉”,才能在文化发展中坚持正确的原则、方向,坚守真理和正道,以避免颠覆性错误。因此,守住“魂脉”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成果指导文化建设实践;要坚持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全面领导,为文化建设工作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守住“根脉”才能在文化建设过程中守住中华民族文明血脉、守住中华文化优秀传承、守住文化主体性。守住“根脉”要了解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在历史中激发文化自觉意识、坚定文化主体性;要积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丰富的文化给养中找寻治世启发;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立足当代中国实践、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中焕发优秀传统文化新的生机和活力。

“创新”是推动新时代文化建设的理论创造和实践发展的活力源泉,立足新时代文化建设实践推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创新,并在理论创新的基础上推动新时代文化建设实践的发展。习近平文化思想正是“两个结合”在文化建设领域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亦展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变创新性发展,赋予思想鲜明的民族特色。同时,“两个结合”促进了文化各领域建设开花结果: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新闻舆论工作、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国际宣传工作等,依托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方向,开创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创造出丰富的文化精品,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

(三)坚持“两个结合”:在开放包容中凝聚全人类共同价值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指出:“开放包容始终是文明发展的活力来源,也是文化自信的显著标志”^[16]。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生动诠释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同时在汲取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成果和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破除“普世价值”话语陷阱,凝聚全人类共同价值。

一方面,在开放包容中破除文明隔阂论、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生动诠释了中华民族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西方国家在文明发展方面设置一系列话语陷阱,生成“历史的终结”“文明隔阂”“文明冲突”“文明优越”等论调,借机排斥、阻拦其他文明形式发展的可能性,本质上是对西方文化霸权的维护。而中华文明蕴含着“和而不同”“天下大同”的文明观,彰显了中华民族对待各民族文化的的基本态度和价值取向。正是在这样文化传统的浸润下,中华文明在保持文化自主性和积极传播本民族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发挥历史主动精神积极推动各民族文明交流,在平等中逐渐突破文明优越、在互鉴中挖掘共同价值追求、在对话中逐渐消除文明隔阂、在包容中尊重文化多样性,促进世界文化多样化发展和人类文明繁荣进步。

另一方面,在开放包容中汲取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凝聚全人类共同价值。在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的过程中,文明对话和交流发挥着重要价值,推动各个民族价值理念在对话中消除隔阂、凝聚共识。在文化交流中一方面让世界了解中华民族几千年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和智慧,了解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品质,了解中国人民的精神内涵和价值观念,为全世界展现一个全面、立体的中国形象;另一方面积极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凝聚共同价值认同,在聚焦全人类共同福祉,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和人类文明延续

的实践中推动各个国家和民族的统一行动。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13.
- [2]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N].人民日报,2023-06-03(01).
-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5.
- [4]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90.
- [5]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537.
- [6]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5:286.
- [7]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706.
- [8]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83.
- [9]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献选编(1938-1989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52.
- [10]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483.
- [11]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34.
- [12]余双好,张晓红.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体系及理论创新探析[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23(5):28-34.
- [1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45.
- [14]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236.
- [15]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5:26.
- [16]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10.

责任编辑:石晶辉

新兴青年统战工作的变化 趋势及优化路径

李超民¹, 章子怡²

(1. 湖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 湖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 随着我国社会转型加快, 社会结构日益复杂, 以网络文化青年、独立文艺青年、生活新业态青年为代表的新兴青年群体, 其职业形态、活动场域、价值取向与组织方式日益多元, 对统战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面对此深刻变化, 需切实做好新兴青年统战工作, 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完善政治参与机制、优化精准服务与支持体系、构建高效风险防范机制, 实现统战工作从传统组织化领域向新兴领域深化拓展, 进而更有效地将新兴青年群体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

【关键词】 新兴青年; 统战工作; 优化路径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089(2025)04-0021-06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主要包括: 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等”^[1]。新兴青年群体指上述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的青年群体, 他们是伴随改革开放推进和社会结构转型分化而产生的新生力量, 已成为统战工作的重要对象, 并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 “统一战线是党克敌制胜、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2]。“在北上广等超大城市, 新兴青年群体已经成

为新的社会阶层中最有活力、最具创新意识、代表未来价值取向的构成部分”^[3]。面对此新生力量, 如何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制度优势, 最大限度整合新兴青年的力量, 引导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贡献智慧和力量, 是新时期党的统一战线工作面临并亟需深入研究的时代命题。

一、围绕新兴青年开展统战工作的重要意义

“青年兴则国家兴, 青年强则国家强”^[4]。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这一历史阶段为新兴青

基金项目: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高端智库委托课题“加强新时代统战宣传工作方法创新研究”(ZK01202401015); 湖南省委统战理论研究课题重点课题“论统战工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功能作用与路径优化”(TZJT2024001)

作者简介: 李超民, 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党外代表人士统战工作理论湖南研究基地研究员, 湖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统一战线理论。章子怡, 湖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统一战线理论。

年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机遇,迫切需要其作为生力军和突击队发挥重要作用。

(一)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的实践创新

“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也是党的未来和希望;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5]。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党的青年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新时代培养什么样的青年、怎样培养青年等方向性、全局性、战略性重大问题,把党对青年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新兴青年是青年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展新兴青年统战工作,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的实践要求。

(二)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的必然要求

“有了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就有了胜利。我们的势力越大,胜利的把握就越大,这是很硬的道理”^[6]。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建设与改革历程中,统一战线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中,增设了第八章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一战线工作的章节,扩展了统一战线的工作对象范围并明确了具体内容。此变化深刻体现了我们党与时俱进,根据形势任务发展变化不断完善统一战线理论、拓展统一战线实践的政治智慧和战略主动。特别是新兴青年规模不断壮大,身影遍布社会生活的各领域,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社会发展进步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生力军。因此,将新兴青年纳入统战工作范畴,为爱国统一战线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发展空间,也客观上要求统战工作不断创新工作思路、方法和机制。

(三)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应有之义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强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要求激活14亿多人的全面发展动力,特别是4亿青年群体的发展动能。新兴青年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生产力革新者和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参与者,对其开展统战工作,本质上是将这部分蕴含巨大创新活力与发展潜能的新兴群体,更有效地团结凝聚起来,积极适应数字经济等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需要,不断完善治理体系和优化政策环境,彰显“全体人民共同参与的现代化”的本质属性。统战工作既关注并着力解决新兴青年在成长发展中

遇到的实际困难和合理诉求,又引导其将个体价值实现融入国家发展进程,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创新红利”的有效转化,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二、新兴青年统战工作的转变机理与机制重构

新兴青年作为统战对象从初步联系覆盖向精准引导服务、深度团结凝聚的转变,同时反映了统战工作理念和方法的创新与升级。从新兴青年群体的成长发展历程,结合社会结构变化、现实生活需要、网络技术迭代升级等因素,深入分析新兴青年统战工作转变的动力、内容与方法,是研究此群体发展态势和制定统战对策的重要基础和前提。

(一)新兴青年统战工作转变动力

新兴青年统战工作的转变动力源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因素的动态互构。理解这一有机整体与内在逻辑,是推动新时代统战工作创新发展,在网络化流动社会中画出“最大同心圆”的关键。

从宏观视角来看,新兴青年统战工作转变的动力源于当代社会结构性变迁。一方面,以信息化、智能化为核心的数字化转型改变了青年的社会存在形态,使青年的社会生活呈现高度“在线化”与“数据化”的特征。此变革对统战工作如何在网络空间有效凝聚共识、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提出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导向与制度设计,为统战工作转变提供了制度牵引力。这也意味着统战工作要着眼“大团结大联合”的本质要求,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广泛团结凝聚新兴青年。

从中观视角来看,新兴青年统战工作转变的动力源于组织形态与治理技术的适应性调整。新兴青年离散化、网络化的生存形态,弱化了传统单位制的组织触达功能。同时,青年思想观念多样、亚文化圈层化,使得单向“政治宣传”话语面临沟通失灵与共鸣失焦的挑战。这倒逼统战工作体系进行适应性调整:在组织上,需突破传统行政路径,探索触达松散社会结构的新方式;在策略上,需推动从“政治宣传”到“文化浸润”的转换,将思想引领融入青年文化载体;在方法上,需将有效的弹性工作法进行制度化提炼,推动工作走向科学化、规范化。

从微观视角来看,新兴青年统战工作转变的动力源于个体诉求与认同机制的重构。平台化与算法驱动

的弹性用工,催生了高度流动的职业群体,其职业轨迹在物理与行政层面均溢出传统工作网格,带来组织覆盖的新课题。更重要的是,新兴青年在追求个人发展的同时,社会价值实现与公共参与需求增强,价值取向日益多样。技术赋权激活了其主体性,基于趣缘联结的社群成为影响其观念形成的重要场域。这要求统战工作必须深入此类新型交往场域,以符合青年特点的方式,引导其增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

(二) 新兴青年群体转型中统战工作的融合点

具有鲜明特征属性的新兴青年,其深刻、多维度的发展转型过程既是成长的必经之路,同时也带来了思想波动、生活重压、组织疏离、诉求多样化等复杂挑战。“在工作中注意抓住特点,发挥优势,就能使工作有的放矢”^[7]。在尊重青年发展规律和主体性的前提下,找准工作融合点,精准识别、有效嵌入、柔性引导,将处于“流动”与“生成”状态的这股充满潜力的新兴力量更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是新兴青年统战工作的重中之重。

1. 职业身份:从“身份模糊”到“身份确认”

“求职、找工作或选择职业,是青年与工作和职业之间建立联系的第一步,也是青年进入社会结构中的劳动力市场的开端”^[8]。职业身份的正规化是新兴青年获得尊严、实现个人价值的基础,也是社会接纳多样性劳动形式的重要标志。新兴青年的职业身份往往具有非传统性、灵活性和创新性,因社会认知不足、评价偏低或被误解的情况,往往遭遇“身份模糊”“价值存疑”的困境,认为其职业不够稳定、缺乏社会价值或专业性,甚至会面临来自家庭、社群乃至主流媒体的刻板标签,如“不靠谱”“吃青春饭”等。同时也应该注意到,部分青年长期处于一种“半正规化”或“被接纳但不被充分尊重”的中间状态,其身份认同依然脆弱。如何有效弥合制度认可、社会认可与自我认同之间的“缝隙”,加速从职业“模糊化”到“正规化”的跃迁,不仅是新兴青年个体发展的内在需求,更是实现更具包容性的社会发展、凝聚新兴力量的重要途径。这为统战工作精准切入、赋能引导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明确的方向。

2. 劳动权益:从“保障脆弱”到“韧性防护”

完善劳动权益保障是维护社会公平的关键措施,

也是促进新兴青年长期发展的重要方法。当前,新兴青年的就业模式高度灵活且多元,常常游离在传统劳动保障体系的覆盖范围之外。他们活跃于平台经济、创意产业、自由职业、微型创业等非传统领域,普遍面临基本劳动权益缺乏稳定保障的现实困境。“构建更加精准高效的社会安全网,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安全性,尤其是加强对灵活就业者的社会保障力度,提高失业保险的覆盖面和精准性,为这类高风险暴露度群体提供有效的风险分担,这对于在人工智能时代改善收入分配、实现共同富裕具有积极意义”^[9]。近年来,在相关政策引导下,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社会保障正在推进,例如部分平台企业已开始探索为符合条件的全职骑手等提供社会保障。构建劳动权益“防护网”,需要在坚持和完善既有劳动法律体系的基础上,超越传统的单一雇佣关系框架,不断进行制度创新,推动政策协同,实现以“新”促“新”。统一战线以其独特的政治和社会网络打通梗阻、链接资源、促成共识、赋能个体,加速“防护网”实现从理念到现实的转化。

3. 社会关系:从“原子状态”到“组织融入”

社会关系的“再嵌入”能有效缓解个体的孤独感,促进社会资本积累,增强群体凝聚力。新兴青年在职业和生活方式上的非传统性,展现出原子化生存的特点,社会联结相对不足、与社会主流群体相对疏离,进一步反映出新兴青年融入主流社会网络的渠道有待拓宽、归属感和认同感有待增强。在此背景下,通过社会组织和社群活动的支持,帮助新兴青年拓展社会支持网络、增强组织归属感,拓宽社会融入渠道,显得尤为重要。作为党联系各界人士的桥梁纽带,统一战线凭借其广泛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扮演着关键角色,发挥重要功能。如开展主题座谈等活动,邀请党政领导、专家、业界领袖与新兴青年“面对面”,解读政策、倾听诉求、凝聚共识,回应青年关切,推动其深化社会联系、增强归属感的进程。

4. 政治参与:从“被动响应”到“积极发声”

“网络社会的崛起不仅推动了社交场域的‘虚实转换’,同时也带来政治参与的转变”^[10]。扩大青年的政治参与,不仅能将多元诉求转化为更具包容性与回应性的公共政策,也是筑牢政治认同、强化社会归属感的关键路径。然而,在初期阶段,新兴青年在政治参与上既有客观上的经验能力不足,也有主观效能感低

下,导致其难以有效运用现有或潜在的渠道进行实质性参与,影响其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伴随着新兴青年群体经济地位的提升,他们政治参与的需求与意识也日益高涨。统一战线“组织化吸纳”有效弥合了其就业形态灵活多样、组织化程度相对不高的特点,赋予其归属感和集体行动能力,将个体化、线上化的表达需求合理引导至有序的政治参与轨道,是深化组织联系和社会融入的重要途径。

(三)新兴青年统战工作的五重嵌入机制

“过去、现在、将来青年工作都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战略性工作”^[11]。新兴青年是不可忽视的、引风气之先的社会力量,是统一战线中新涌现的群体、对象。新兴青年作为统战工作的新对象,在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推动下,面临着世情、国情、党情新变化所带来的新挑战,催生出新方法。

1. 价值嵌入:坚持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

新兴青年面对社会转型关键期、社会思潮多元化、网络信息技术空前发达的现状,受文化水平、经济条件、社会地位、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等多重因素影响,其价值取向呈现出显著的广泛性和差异性。不容忽视的是,少数新兴青年受崇尚自由与独立个性的影响,在个人理想与国家需求之间寻求平衡,某些方面表现出迷茫和偏差。“政治意识和价值观教育不足,存在偏离主流意识形态风险”^[12]。这种不足导致他们容易受到错误思潮和西方文化渗透的负面影响。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要直面这一现实,在尊重新兴青年价值多样化的基础上,坚持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以契合青年特点的“价值嵌入”策略强化思想引领,让主流价值观念在新兴青年中“入眼入耳、入脑入心”。

2. 组织嵌入:加强党对新兴青年统战工作的全面领导

随着数字经济与文化创意产业的爆发式增长,我国新兴青年群体规模正呈现前所未有的扩张态势。这一庞大群体高度集中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等经济发达地区,并逐步下沉渗透至二、三线城市。然而,与规模增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组织关系落地和管理服务面临的新挑战,其直接关系到新兴领域治理效能的提升与代际价值共识的可持续传承。如部分青年党员(或团员)的组织关系因就业流动性高、所在单

位尚未建立党组织(团组织)等原因,暂时保留在户籍地,存在“人户分离”带来的服务管理半径问题。为应对这一挑战,需要加强党对新兴青年统战工作的全面领导,灵活创新组织建设,以组织活动深度覆盖和有效融入提升组织嵌入与引导能力,将新兴青年分散的活力转化为有序的合力。

3. 制度嵌入:健全新兴青年制度弹性调适机制

完善新兴青年的统战工作制度,是增强工作实效性的核心所在。当前,在此领域的投入力度尚显不足,导致新兴青年统战工作在制度供给方面呈现碎片化与滞后性,其主要表现为在政策设计和统战工作实施过程中缺乏系统性、整体性,如政策分散、协调不足、执行不力等问题,导致资源分散,难以形成合力,影响统战工作的整体效果。此外,现有的制度设计和政策供给未能及时跟上新兴青年的发展变化,表现为政策反应慢、适应性不足等问题,无法及时有效应对新情况,使得统战工作陷入被动状态。因此,亟需优化制度设计的适应性与包容性,以制度的“柔韧性”承载青春的“流动性”,以政策的“精准性”激活创新的“无限性”,确保青年发展的动态活力与制度稳定的持久保障形成有机统一。

4. 工作嵌入:创新新兴青年统战工作方式方法

2025年7月,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第七批新职业,包括17个新职业和42个新工种。青年作为新职业的就业主力军,就业途径不断拓宽,兼职、跳槽亦成为青年就业的常态。他们所选择的职业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群体内部差异显著,生存环境和发展需求状况皆不相同。就统战工作而言,忽视群体内部差异,不仅会导致统战工作资源错配、效率低下,更可能使部分青年感到被忽视甚至排斥,难以建立起真正的政治认同感。面对新兴青年个体的工作需求与工作性质差异显著的现实,统战工作需要与群体特征和具体需求有效对接,力戒“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硬办法不能用,软办法不顶用”的“本领恐慌”,以“分众化”传播提升统战宣传实效,以“精准化”施策提升服务保障实效。

5. 技术嵌入:完善新兴青年统战工作现代化的支撑体系

数智时代,青年社交、学习、娱乐、消费乃至职业发展高度依赖网络平台,依托互联网衍生的新兴职业

与灵活多样的线上组织共同构成了一张深度融入新兴青年工作生活的社会网络,如社交媒体成为情感联结的纽带;线上社群构成兴趣聚合的基地;云协作平台支撑着职业发展的舞台。这些组织形态以其低门槛、高灵活性与强聚合性,成为青年群体表达诉求、寻求认同、组织行动的重要空间和精神载体。“新兴技术深刻改变着自我与他人、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方式,青年心灵塑造、精神建构与意义生成机制正在经历范式革命”^[13]。统战工作需要积极拥抱数字化变革,构建实现“技术嵌入”的现代化、智能化的统战工作支撑体系,统战工作者要具备数字素养、用户思维、平台运营能力,将技术手段与传统工作优势(如组织动员、情感联络)深度融合,将网络空间蕴含的巨大能量转化为新时代统一战线的坚强阵地和新的增长点,团结凝聚在“云端”活跃的海量新兴青年。

三、提升新兴青年统战工作效能的有效路径

新兴青年是新的社会阶层中的青年力量,是新业态党外代表人士的蓄水池。做好新兴青年统战工作是关乎党和国家事业接续发展的重要任务,需要大力提升新兴青年统战工作效能,形成“以统战促治理、以治理聚青年”的良好局面。

(一)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增强思想引领力

一是深化教育浸润,构建系统性、浸润式的引导机制。通过系统的理论供给与场景化叙事重构,将党的主张和时代要求有效转化为新兴青年的认知图式,在宏大家国叙事与个体生命历程中,将政治认同升华为新兴青年自觉的精神归属与价值归属,实现集体理想信念对个体的积极引领。“创新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叙事方式,增强内容表达对青年的吸引力与感染力”^[14]。通过生活叙事、榜样叙事、历史叙事等策略,生动阐释个体命运与国家发展的紧密相连,增强内容表达对青年的吸引力与感染力,激发青年的情感共鸣和价值认同。二是强化技术赋能,构建智慧化、协同式的引领生态。统战工作要通过算法治理优化信息分发结构,以数字化平台再造组织联结方式,在解决“最后一公里”触达难题的同时,创造出虚实交融的意义生产空间。技术装置与人文关怀的深度融合,使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突破时空界限,实现从“到达率”向“渗透率”的质效跃升。当新兴青年在政治社会化过程

中完成主体性建构,其行动逻辑便从被动接收转为主动诠释,从情感共鸣升华为价值认同,在奋斗中实现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二)引导促进新兴青年有序政治参与,提升组织凝聚力

一是完善制度化参与体系,构建多层次、规范化的政治参与通道。嵌入政策制定流程,在各级人大、政协设立渠道,吸纳网络人士、自由职业人员等成为代表或委员,围绕住房、就业等青年议题提交提案、参与审议,使其诉求直达决策核心。建立常态化协商平台,依托青年组织设立“新兴青年议事会”,针对网约车权益、直播规范等热点,组织代表与相关部门对话,系统转化青年建议为治理方案。二是强化枢纽型组织建设,增强对新兴青年的凝聚力。推进“柔性”组织覆盖,在互联网企业、文创园区等新兴青年聚集区建立“青春联络站”,配备专职社工或由党组织选派优秀青年党员担任联络员,通过茶话会、主题沙龙等非正式活动,建立信任关系。积极运用网络工具创新基层团组织活动方式,利用钉钉、飞书等工具开展线上组织生活,在坚持组织生活基本要求的基础上,适应自由职业人员等工作特点,提供更为灵活便利的参与途径。三是创新新兴青年自组织引导机制,构建“引领——服务——赋能”支持网络。支持新兴青年在法律政策框架内自主成立社会组织,如统战部门可协同提供项目孵化资金、成长导师指导等支持,助力打造特色品牌,形成“党建引领、政府支持、青年主体”的良性互动模式,积极引导其在服务社会、推动发展中发挥作用。

(三)构建精准化服务供给体系,凝聚发展驱动力

一是压实党委主体责任,进一步健全统战工作协调机制。各级党委要切实将新兴青年统战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和整体工作布局。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统战工作领导小组的统筹协调作用,强化部门间横向协同联动。同时,充分发挥“新联会”(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中的平台载体作用,深入实施团中央的新兴青年群体“筑梦计划”。二是建立需求响应中枢,动态匹配青年发展诉求与政策供给。联合互联网平台、行业协会等主体,建立新兴青年需求数据库,通过问卷调查、舆情分析、职业轨迹追踪,对以上青年诉求按紧迫性、影响范围进行划分,动态掌握新兴青

年在就业、住房、社保等领域的实时痛点与梗点,以精准的数据为支撑,确保政策资源优先投入关键领域。三是强化政策供给与环境营造协同发力,着力构建包容公平、活力充盈的新兴青年发展生态。加强环境营造的“软性生态建设”,可以将个体能量转化为社会治理创新、产业升级、文化繁荣的驱动力,推动形成“城”“青”互促共荣的良性循环,实现“服务一个人、带动一群人、激活一片域、发展一座城”的幂指数效应。

(四)筑牢新兴领域政治安全防线,提升风险防范力

一是构建“实时感知、分层穿透”动态监测体系。针对不同职业、地域、教育背景的新兴青年开展分层分类调研。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对其兴趣偏好、行为特征、舆情脉动进行深度挖掘与源头感知,形成常态化跟踪研究机制,形成“数据——场景——行为”多为一体的新兴青年发展动态图谱。“统一战线领域风险呈现隐患多维叠加的复杂态势”^[15]。国家要定期发布新兴青年群体发展报告,前瞻研判未来趋势,把青年发展的潜在需求点转化为政策创新点,为统战工作政策供给提供扎实的数据参考。二是构建新兴领域风险预警响应机制。聚焦新兴青年群体在就业保障、思想动态、心理健康、网络行为等关键领域的潜在风险,建立以统战部门为重要枢纽的跨部门信息共享与资源整合机制,拓宽风险感知的基层触角。运用系统性、科学化的分析研判方法,根据风险类型和级别,分类制定并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全面提升全链条的风险识别、预警响应与化解处置能力。同时注重发挥统战性社会组织以及青年代表人士在风险沟通、情绪疏导、矛盾化解中的桥梁纽带和正向引领作用,筑牢新兴青

年群体领域的“同心圆”安全防线。

参考文献:

- [1]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21.
- [2]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学习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8.
- [3]李春玲,刘保中,李闯.新兴青年群体:新的社会阶层中的新力量[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5):63.
- [4]习近平.论党的青年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146.
- [5]习近平.论党的青年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152.
-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26.
- [7]李超民.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方法论研究[J].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4):8-9.
- [8]风笑天.从青年社会学的视角认识青年与研究青年[J].广东青年研究,2022(1):40.
- [9]王永钦,董雯.中国劳动力市场结构变迁——基于任务偏向型技术进步视角[J].中国社会科学,2023(11):64.
- [10]杨江华,杨思宇.青年网络社交圈群特征与政治参与[J].青年研究,2023(5):45.
- [1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277.
- [12]郭元凯.新形势下我国新兴青年群体的特征变化、风险挑战及对策思考[J].中国青年研究,2022(1):57.
- [13]廉思.新时代中国青年价值观的主要特征与引导路径[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5(8):138.
- [14]付安玲,张书铭.泛娱乐化视域下青年主流文化价值观认同的隐忧与引导[J].思想教育研究,2025(5):75.
- [15]林华山,龚静阳.大安全与大统战:国家治理中统一战线领域风险防范与化解[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1(4):88.

责任编辑:李雯

创伤与辉煌：抗战记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双重叙事与内在逻辑

苏玉波,李谔卓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9)

【摘要】 抗战记忆是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创伤”和“辉煌”双重叙事结构,并通过二者之间的辩证统一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深刻的精神源泉与认同逻辑。创伤记忆通过苦难遭遇、伦理自觉与仪式化传承,奠定情感与道德基础;辉煌记忆依托全民抗战图景、英雄叙事与胜利话语,实现价值引领。二者之间相互定义、辩证统一,推动形成“命运与共”的认同逻辑,构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精神资源。

【关键词】 抗战记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辉煌叙事

中图分类号: D642;D6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089(2025)04-0027-05

共同的历史记忆催生历史共识,并作用于共同体成员,塑造其价值取向与精神特质。抗战记忆作为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重要内容既记录了民族的苦难与抗争,也成为新时代凝聚民族情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动力,构成中华民族情感世界中最为深沉和坚韧的部分。其由创伤记忆与辉煌记忆共同构成:前者涵盖苦难与牺牲,后者关乎英雄与胜利。这一“共历苦难—共克时艰—共获胜利”的叙事逻辑,揭示出中华民族共同承受、捍卫、赢得和奋斗的历史轨迹。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讲述抗战历史、弘扬抗战英雄叙事,强调“要讲好抗战故事,把伟大抗战精神一代代传下去”^[1]。因此,将“创伤”与“辉煌”作为一种辩证统一

的叙事整体,通过剖析创伤记忆与辉煌记忆相互转化、共同作用的内在逻辑,不仅能深化对历史记忆政治功能的认识,也为深入理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辩证的动态分析框架和有益视角。

一、创伤记忆:共同体意识的情感形成与苦难动员

创伤记忆是抗战叙事的基石,“始终内在于共同体建构的历史性进程之中。”^[2]它通过共同受难经历的叙事建构与制度化的传承,将个体的、分散的伤痛体验整合,触发最广泛的情感共鸣,从而奠定中华民族聚合内生的情感与伦理基础。

(一)个体苦难与集体受难的共情性联结

战争带来的苦难与创伤最初是分散的个体遭遇,

基金项目: 教育部高校思政课教师研究专项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建设教育强国视域下高校思政课改革创新研究”(23JD-SZKZ02)

作者简介: 苏玉波,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李谔卓,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随着国土不断沦陷,人们意识到侵略者的暴行不是局部的、偶然的事件,而是针对整个中华民族的毁灭。这些原本分散在中国各地的个体遭遇,迅速被纳入到一个宏大的、全国性的苦难叙事之中,产生了深刻的情感同构性。1937年,日军在南京实施长达六周的大规模屠杀,30万以上平民与战俘遇难,使“南京”成为全民族的深刻伤痕。同样,“重庆大轰炸”通过新闻镜头和亲历者口述,将其长达数年的恐怖体验传递给大后方乃至全国民众,使“跑警报”成为一代中国人共同的战时记忆。不同地域、不同背景的人们在逃难路上、在后方城镇相遇,彼此倾诉苦难,彼此互帮互助,个体的创伤记忆在交流中相互印证、叠加,共同编织出一张覆盖全民族的苦难认知网络,使“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的认知从抽象理念变为真切的情感现实。

通过对共同创伤历史的感知,个体的悲愤与恐惧跨越地域、阶层与民族,在中华民族这一层面汇聚,实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情性联结”。这种互通共享的情感体验不仅削弱了各民族之间的阶级差异,而且强化了对“中华民族是一体”的认知,从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奠定了情感基础。

(二)创伤记忆的伦理奠基与认同建构

创伤叙事不仅激发情感,更奠定了一种深厚的伦理正当性。创伤记忆促发了共同体的伦理自觉,并确立了清晰的道德边界。面对南京大屠杀等极端暴行,局部的苦难体验突破了个体情感的界限,转化为整个中华民族必须共同承担的责任。在抗战记忆的建构中,遇难同胞的“面孔”发出强烈的道德冲击感,要求生者承担起铭记历史、捍卫正义的伦理使命。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摧毁生命,更试图抹杀中国人的尊严与价值,其暴行在客观上划定了善与恶、是与非的伦理界限。在这一道德图式中,中华民族是受害者,抵抗侵略、捍卫尊严、保卫国家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不容置疑的道德目标。这种道德区隔的目的不在于沉湎于苦难,延续仇恨,而是通过历史悲剧的警示,铸牢共同体存在的价值底线。这种基于创伤记忆的伦理共识,则使中华民族形成了一种内在的道德凝聚力与价值认同,形成了对生命尊严、民族独立与历史正义的共同坚守,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超越了单纯的地域认同抑或政治认同,附加了一层强烈的道德情感。战后日本右翼势力对历史的歪曲和否认,使中国人民更加清

醒地认识到,捍卫历史真相不仅是对过去的尊重,更是对未来的责任。

创伤记忆通过伦理自觉的唤醒、道德边界的确立,回答了“我们为何悲伤”,进而指明了“我们为何团结”、“我们为何坚守”的责任,这一建立在历史事实上的伦理认同,为共同体意识赋予了深刻的伦理内涵,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提供了情感保障。

(三)创伤记忆的仪式化与制度化传承

创伤记忆的传承仅靠自然而然的人际间传递,是无法形成社会性、长久性的记忆叙事与情感功能的。需要通过一定的仪式活动与制度保障,确保历史经验的延续性与创伤记忆的代际传承,并持续强化共同体意识。

仪式化实践构成了记忆传递的活动维度。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将十二月十三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每年十二月十三日国家举行公祭活动”^[3]的决定。每年的国家公祭仪式通过固定的时间、空间和程式化、标准化的流程,创造了一个全民参与的记忆场域。另外,每年九月十八日全国多地同步鸣响防空警报,也已成为九一八事变纪念日标志性的仪式化实践。这些声音符号与身体化的参与行为,强化了记忆的感官植入与情感内化。无论是地方性仪式还是国家性的仪式实践,都通过年复一年的标准化程序、重复性操演,将历史创伤深植于中华民族的情感中,将个体的哀思凝聚为集体共同的历史意识,从而在时间维度上延续了记忆的生命力,在空间维度上拓展了认同的边界。

二、辉煌记忆: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升华与正向引领

中华民族所经历的深重苦难,其内部始终跃动着一种雄浑而坚韧的辉煌叙事。这种辉煌并非仅指战争胜利后的辉煌,它更深刻蕴含于全民族在存亡绝续的危机中所迸发出的惊人勇气、所凝聚起的空前团结和所建立起的伟大精神中。这种内生于苦难、并最终超越苦难的磅礴力量,将民族的牺牲与集体的抗争淬炼成民族复兴的精神火种,使抗战记忆没有停留在历史的悲情,而是进一步升华为指向未来、催人奋进的集体意志和价值认同。

(一)全民抗战图景与共同体意识的呈现

抗日战争时期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这一严峻的社会现实催生了空前的民族总动员,使“中

华民族”的观念首次在四万万人中真正萌发。而全民族共同抗战所催生的共同体意识,主要体现在政治、军事和社会三个维度。

在政治整合层面,以中国共产党为主要力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抗战胜利的政治认同基础。“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号召各族群众奋勇反抗,指出“只有广大群众的革命铁拳才能制止帝国主义的暴行,驱逐帝国主义滚出中国!”^[4],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随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1937年9月,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表示“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而当使全国国民彻底更始,力谋团结,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5]。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郑重提出:“取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6]。这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全民抗战的政治基础不仅表现为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更表现为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全国各族人民在抗日旗帜下的广泛团结。毛泽东在《论持久战》等著作中深刻阐述了全民抗战的战略思想,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统一战线。”^[7]我民盟主要创建人之沈钧儒先生在淞沪抗战爆发后,积极领导抗日救亡运动,“带领民众掀起了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8]

在军事活动层面,形成了全民参与、相互配合的战争形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创建了遍及华北、华中的抗日根据地,形成了“兵民一体”的社会状况;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组织淞沪会战、长沙会战等重大战役,彻底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痴心妄想。这种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相配合的战争模式,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共同体意识也在人民战争中得到进一步凝聚。

在社会动员层面,形成了全民支援抗战的生动局面。工人阶级冒险修复交通线路,农民群众积极承担军事劳役,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投身宣传动员与参军热潮。同时,各地捐款捐物活动日益高涨,新疆“各族民众团结一心,慷慨解囊,募捐飞机144架”^[9],远超原定目标。社会各界的共同行动,不仅为抗战提供了

物质保障与精神鼓励,更在深层次上塑造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国民意识,宣告着只要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就能克服千难万险,共渡难关。

(二)英雄叙事与共同体意识的升华

辉煌记忆的核心是英雄叙事。英雄叙事塑造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形象,同时也通过系统、真情的叙事策略进行文化建构,将个体经验转化为集体记忆,将个体事迹转化为集体精神。

抗日战争中所涌现出了一批爱国英雄,通过典型化塑造构建了一个立体丰富的英雄谱系。杨靖宇将军率东北抗联在极端恶劣环境下艰苦斗争,牺牲时胃里“只有一点尚未消化的树皮、草根和棉絮”^[10];张自忠作为抗战时期牺牲的最高级别将领,其“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11]的铮铮誓言,至今仍在激励着后人。马本斋领导的回民支队、乌兰夫组织的蒙汉抗日游击队等少数民族抗日武装的英雄事迹也成为英雄叙事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这些英雄人物的叙事又通过多种载体得以广泛传播。新中国第一部抗日题材影片《中华儿女》,以抗战时期广为传颂的“八女投江”的故事为原型,成功塑造了银幕中的抗战新形象。^[12]

英雄叙事的功能主要在于崇高化。它将个体或集体的英勇行为提升为民族精神的象征。英雄们所展现出的不畏强暴、血战到底、视死如归的气概,被提炼成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为核心的抗战精神,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内核。

(三)胜利叙事与民族自信的凝聚

辉煌记忆的另一个关键维度是胜利叙事。它强调中国战场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巨大贡献和战略价值,突出中国共产党在战争中起到中流砥柱的领导作用,并最终指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13]这一历史性结论。

胜利叙事至关重要,因为它直接建构了历史自信。在军事胜利层面,系列关键战役的胜利通过报纸、广播等形式告知于各族群众,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战士气。在外交层面,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增强了民族自尊心。1942年1月,“由中、美、英、苏四国领

衔 26 国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宣言》”^[14],中国正式成为反法西斯同盟四大国之一,中国人民的艰苦卓绝斗争也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敬佩。纪念抗战胜利阅兵式则展示了现代化国防力量和先进军事装备,这一国家性仪式活动不仅充分彰显了国家实力,也表达了对抗战历史的纪念和对历史功臣的崇高敬意,极大地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对于一个曾历经辉煌,却在近代百年中饱受屈辱的民族而言,抗战的全面胜利是一次历史性的心理转折。它证明了中华民族并非“一盘散沙”,而是一个有勇气、有力量去战胜一切凶恶敌人的伟大民族。这份来自历史的胜利自信,是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面向未来、迈向复兴的宝贵精神财富。

三、内在统一:双重叙事结构的逻辑统一与认同赋能

辉煌记忆与创伤记忆是国家记忆中至关重要的两种性质。但是“创伤”与“辉煌”并非割裂的两种叙事,而是相互依存、相互定义、相互强化的辩证统一体。正是二者的有机互动,共同构建起了一个立足于历史现实又面向未来发展的意义系统,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精神支撑。

(一)创伤记忆与辉煌记忆的相互定义

没有创伤,辉煌便失去了重量和意义。正是由于苦难如此深重,才愈发衬托出胜利的来之不易和英勇抗争的可贵可敬。同样,没有辉煌,创伤则可能沦为纯粹的悲情宣泄甚至导致历史虚无。正是最终的胜利和过程中人的主体性彰显,才使这段创伤历史没有被解读为纯粹的、无意义的牺牲,而是被赋予了“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崇高叙事意义。

在记忆结构中两种记忆构成了文化记忆中相互依存的两面。“文化记忆往往呈现为一种象征意义体系,而呈现自身即为反思日常生活,它是文化记忆理论和实践中的重要机制之一。”^[15]具体的历史事件被选择,成为文化记忆的象征符号,并促使人们对历史事件进行不断地回顾与反思。在这一框架下,创伤记忆作为“负向奠基记忆”,定义了“中华民族必须捍卫什么”;辉煌记忆作为“正向奠基记忆”,定义了“中华民族必须争取什么”。

在历史维度上两种记忆呈现出深刻的互文性特征。没有一帆风顺的胜利辉煌,也没有一无是处的苦

难悲痛。南京大屠杀的创伤记忆通过 30 余万遇难同胞的数字,确立了民族苦难的历史刻度;而台儿庄大捷的辉煌叙事则以歼敌 1.2 万人的战果,标注了民族抗争的意志高度。两种叙事结构在历史的时间轴上相互映照,这种历史现场的“互文”关系使创伤记忆为辉煌叙事提供了情感纵深,而辉煌叙事则为创伤记忆赋予了价值指向。

二者之间的相互定义,构成了历史记忆的理解框架。在这一框架下,历史不仅被保存,更被持续地诠释,使中华民族共同体在面对新的现实挑战时,能从自身经验中汲取教训与智慧。

(二)创伤记忆与辉煌记忆的叙事张力

抗战记忆中的创伤记忆与辉煌记忆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而是通过内在的辩证关系形成了富有张力的叙事结构。这种张力既源于历史事实的现实历程,也来自于记忆建构过程中的价值选择,最终作用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在情感结构层面,两种记忆叙事形成了互补的情感结构。重庆大轰炸期间形成的“愈炸愈强”^[16]的抗争精神,与“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中表达的悲痛与悲愤之情相呼应。创伤情感向积极维度转化的同时又为辉煌记忆注入了必要的沉重感。这种情感辩证使得集体记忆既避免了沉溺创伤导致的悲情困局,又防止了过分强调辉煌可能引发的历史缥缈。

在符号学视角下,两种记忆叙事实现了意义整合。譬如“黄河”这一意象,在《黄河大合唱》中既承载着“怒吼”的悲怆记忆,又象征着“保卫”的抗争精神;“长城”这一符号,作为实体曾见证了中国军队在这里的创伤与失利,作为文化符号,则升华为中华民族精神防线的象征,昭示着民族精神的坚不可摧。这种符号意义的转换,正是通过将具体的历史创伤转化为精神性的文化象征而实现的。

二者之间存在的这种叙事张力,构成了记忆的强大吸引力。它避免了单一叙事的极端化。纯粹的创伤叙事可能导致民族心理的压抑和悲情化,而纯粹的辉煌叙事则可能流于浮夸和空洞。这种双重叙事张力的平衡使得记忆既有历史的沉重感,又有精神的超越性,形成了一个完整立体的意义体系,能够满足不同层面、不同群体的情感与价值需求。

(三) 创伤记忆与辉煌记忆的认同驱动

“历史记忆的目的绝非单纯的对过去的呈现,同时还有对包含其中的集体情感和价值观念的阐发和渗透。”^[17]“创伤”与“辉煌”的结合,最终导向于对“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创伤记忆回答了“我们从怎样的深渊中走来”,定义了共同体共同过去;辉煌记忆回答了“我们凭借何种力量走出深渊”,定义了共同体共同的精神特质。两者结合有力地回答了“我们将走向何方”,指出新时代新征程需要“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彼岸奋勇前进。”^[18]

这一叙事结构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塑造是在其价值相连中完成的。首要的是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对平民伤亡、家园破坏等创伤记忆的悲鸣,彰显生命至上的人文关怀;全民抗战的图景与战斗胜利的辉煌记忆,凸显了人民创造历史的主体地位。其次是确立了“共同体的精神认同”的道德基础。创伤记忆确立了“铭记历史、珍爱和平”的价值底线,辉煌叙事则建构了“自强不息、开创未来”的价值导向。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19]抗战记忆对于共同意识的作用,正在于其辩证统一的特性。创伤记忆与辉煌记忆之间的相互定义与叙事转化,既避免了单纯强调创伤可能导致的悲情困局,也防止了过度突出辉煌可能引发的历史虚化。这种内在张力,构成了我们面对历史时的清醒与力量,既夯实了民族认同的情感根基,也淬炼出走向未来的精神指南。

四、结语

“伟大抗战精神的记忆叙事不仅是对历史的铭记,更是全体中国人民增强国家认同、彰显民族精神、推动国家发展与人类文明进步的强大动力。”^[20]作为中华民族成员不仅要铭记历史的苦难与辉煌,更要从中汲取智慧。新时代新征程,中华民族成员对抗战记忆的传承与诠释,需要超越单纯的历史回顾,着眼于其当代价值的创造性转化。一方面,要深入挖掘抗战精神中蕴含的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团结奋斗等精神内容,使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融合,为增强“四个自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精神动力。另一方面,要通过创新性的叙事方式和传播手段,让抗战记忆在青年一代中焕发新的生命力,做到传承好

抗战记忆、弘扬好抗战精神,并将其不断作用于引领新时代青年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而接续奋斗。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山西考察时强调努力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J].共产党员,2025,(14):2.
- [2] 何卫华.创伤叙事的可能、建构性和功用[J].文艺理论研究,2019,39(02):170-178.
-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814.
-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八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548.
-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十四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555.
-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十四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370.
- [7]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65.
- [8] 邓一帆.爱国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沈钧儒与“一·二八”淞沪抗战[J].群言,2025,(04):48-51.
- [9] 闫存庭.略论抗战时期新疆的一县一机运动[J].西域研究,2024,(01):38-47.
- [10] 军事科学院解放军党史军史研究中心编写组.杨靖宇[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9:163.
- [11] 《民族脊梁》编写组.民族脊梁—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94.
- [12] 乔羽,沈鲁.历史记忆与影像重构:国产抗战电影的叙事维度及价值传递[J].电影文学,2025,(13):121-125.
- [13] 胡锦涛.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9.
- [14]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下卷[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30.
- [15] 刘亚秋.记忆研究的“社会—文化”范式对“哈布瓦赫—阿斯曼”研究传统的解读[J].社会,2018,38(01):104-133.
- [16] 侯晋雄.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群众路线实践及其当代价值[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14.
- [17] 吴玉军.顾豪迈.国家认同建构中的历史记忆问题[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8,(03):69-76+2.
- [18] 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14.
- [19] 习近平.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七十七周年仪式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7-08(002).
- [20] 张引,范铁权.伟大抗战精神的记忆叙事及其国家认同功能[J/OL].学术探索,1-8[2025-09-27].

责任编辑:刘国强

党外知识分子群体精准统战的逻辑与路径研究

张立鼎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天津 300191)

【摘要】 新时代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须以“精准思维”“分类施策”。针对该群体规模扩大、思想多元等新变化,精准统战是凝聚人才、构建广泛爱国统一战线、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应坚持政治引领与创新方法,增强工作针对性、实效性,实现大团结大联合。

【关键词】 党外知识分子;精准统战;逻辑与路径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089(2025)04-0032-05

党外知识分子是国家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特需资源和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力量。长期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战略和全局高度审视和推进党外知识分子工作,将其视为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兴衰成败的关键一环。习近平总书记以深邃的战略眼光,就党外知识分子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为其领航定向,深刻回答了党外知识分子工作,为什么要做、主要做什么、应该怎么做等根本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党外知识分子队伍构成更加多样,需要针对不同特点分类施策。”^[1]在新的历史方位下,党外知识分子工作内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这就要求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要与时俱进地根据新时代党外知识分子新的

特征和新的趋向,不断丰富和拓展“分类施策”的重大方法论,实现统战工作方式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从“模糊统战”到“精准统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坚实力量,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人才支持。

一、新时代党外知识分子的主要特点

党外知识分子始终是统一战线工作对象,党外知识分子工作历来是中国共产党持续探索的重大课题。在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一以贯之把党外知识分子工作作为统一战线的基础性、战略性工作,积淀和形成了丰富的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经验,彰显了与时俱进的创新品格。在政策上,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吸收争取”,到新中国成立后“团结教育改造”,改革开放后“四个尊重”,再到新时代“聚天

基金项目:2024年度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智库项目(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专项)“党外知识分子群体精准统战的逻辑与路径研究”(TJIZ24-09)

作者简介:张立鼎,中共天津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党史党建。

下英才而用之”；在政治内涵上，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按其社会地位确立为小资产阶级属性范畴，新中国成立初期确立为资产阶级属性范畴，改革开放之后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作用上，从“依靠力量”“基本力量”“根本力量”到“承担重任”，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保持了生机和活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做好新时代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需要及时把握“党外知识分子构成”的主要特点。

一是群体规模不断扩大。进入新时代，随着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和归国留学人员的增长，知识分子群体规模进一步扩大，党外知识分子及其高层次群体还在增加，规模整体上呈现扩张趋势，群体呈现大众化特征。

二是分布构成多元复杂。从分布领域上来看，有党政机关人员，有企事业单位人员，有大中小学教师，有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有新媒体从业人员，有留学人员等等；从工作属性来看，有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从知识分类来看，有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之分，以及不同年龄、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党外知识分子等。同时，随着国际交流的增加，党外知识分子接受西方国家教育的越来越多，使其党外知识分子分布范围更加广泛，成员身份构成日趋复杂，外延不断扩大。

三是骨干作用更为突出。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人才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支撑，人才引领创新驱动。”^[2]党外知识分子人才荟萃、智力密集，不少是科研骨干、学术大家、教育专家、文化名家，是我国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将在智能网联、新能源、人工智能、芯片、传感器、电控、工业软件等“卡脖子”领域技术的突破、创新发展上发挥骨干作用，优势特征越来越突出。

四是思想价值取向多元。随着社会分层不断细化和新业态的不断出现，党外知识分子群体主流价值观念健康向上，功利性与责任感并存，独立性明显，观念由一元转向多元，价值观由集体向个人本位倾斜，思想的差异性、自主性、选择性呈现多元复杂化状态。

五是交游国际化程度加深。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尤其世贸组织之后，留学人员已经发展成为我国一个特殊的群体。目前的两院院士，约六成以上都有海外留学或访学经历，“海归”群体比重进一步增

大，同时留学人员群体也是构建对外交流畅通渠道的重要一环，是开展民间外交的生力军。在留学人员群体增大的同时，随着国际化程度的加深，党外知识分子“游学世界”、“连线海外”成为常态。

六是社交全天候网络化。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自由、交互、开放、多样网络环境的发展，微信、微博、抖音等新媒体的生活化，“微渠道”传递“微元素”“微生活”。各种似是而非的错误思想和物质化价值观通过互联网的传播，给统战工作带来一些挑战。同时，新媒体从业人员和“网络意见领袖”，往往能左右互联网的议题。

二、新时代推进党外知识分子群体精准统战工作的必要性

当前，党外知识分子群体规模不断发展壮大，社会影响、政治诉求、独立意识不断增强，与此同时，新时代党外知识分子构成日益复杂、分布更加广泛，思想更趋多元、内部各成员差异化突出，以“精准思维”“分类施策”推进新时代党外知识分子精准统战工作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和价值，有着极强的必要性。

一是“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必然要求。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关键在于用得好、留得住，真正把各方面的知识分子凝聚起来，把他们的作用发挥出来。改革开放后，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从传统的“党外”扩展到“三外”，即党外、体制外、海外，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和留学人员纳入统战工作范围。党外知识分子群体基数大，来源构成不同，思想状况不同，利益诉求也不尽相同，尤其这一统战领域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群体划分上互有交叉，因而只有“因材施教”“分类施策”，才能将其牢牢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充分发挥他们作为生产力的发展者、文化的传播者的智慧和才能。

二是完善党外知识分子政治引领机制的必然要求。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党外知识分子工作内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探索精准统战等新模式，可以更加准确把握不同领域党外知识分子思想引导的着力点，进一步把握规律、创新载体，精准强化政治引领，分众对重点对象思想动态进行长期跟踪、分析和研判，不断完善党外知识分子政治引领机制。

三是构建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的必然要求。随着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国际交流“双向奔赴”成为常

态,留学人员或出国交流的党外知识分子具备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流能力,在国际舞台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推进党外知识分子精准统战,引领留学人员心系“国家事”、肩扛“国家责”,并影响其所联系的社会阶层群体,为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添口加丁”。

四是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主要战场,围绕科技制高点的竞争空前激烈。”^[3]而决定这场博弈胜负的因素很多,但在众多因素中,人才是关键。推进党外知识分子精准统战工作,坚持分类施策,结合不同群体的情况和特点精准施策,抓好重点人群、突破一点、带动一片,通过平台搭建、事业引领,让党外知识分子引领、带动和辐射身边人,能激发各条战线掌握和运用先进生产力建设祖国的动力。

五是实现大团结、大联合的必然要求。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共识是奋进的动力。推进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的精准化,必须在坚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基础上,进一步凸显尊重劳动、尊重创造的导向。深刻理解和牢固树立“精准”理念,并将其贯穿于工作的各个环节,对于实现大团结、大联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三、新时代推进党外知识分子群体精准统战工作的原则与方法

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是关系到统一战线工作基础的巩固与壮大、关系到统一战线主要任务的完成,关系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兴衰成败。新时代推进党外知识分子群体精准统战工作就是要将知识分子工作的正确理论、方针、政策与正确的原则、科学的方法结合起来,提高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的科学性、艺术性,收到良好效果。

一要坚持政治引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工作,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强化共同奋斗的政治引领。”^[2]精准统战工作,要始终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引导党外知识分子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帮助党外知识分子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站稳立场,把思想统一到党中

央决策部署上来。

二要坚持守正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正创新是我们党在新时代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方法。”^[4]精准统战工作要坚持守正创新,在理论上,重塑党外知识分子的角色定位,实现党外知识分子政治属性与文化属性的有机结合;实际工作中,大胆使用和培养党外知识分子,真正落实“识才、爱才、用才、容才、聚才”五位一体的新时代知识分子政策。

三要坚持精准施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强化精准思维,做到谋划时统揽大局、操作中细致精当,以绣花功夫把工作做扎实、做到位。”^[5]精准统战工作,必须针对不同类型、不同领域的党外知识分子的特征,以“精准思维”树立分类施策的工作理念,分类施教、因材施教,采取不同的方法,做到工作方法、工作载体、工作路径创新。

四要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统一战线是一致性和多样性的统一体,只有一致性、没有多样性,或者只有多样性、没有一致性,都不能建立和发展统一战线。”^[6]精准统战工作,不能脱离实践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不能脱离实践的具体特点,要坚持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原则,善于在异中求同,对于“异”既要宽容、尊重,也要加强沟通。

五要坚持“说理和陈情相结合”的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统一战线是做人的工作,要运用更为高超艺术和更为精妙方法。精准统战工作,要与时俱进地明晰工作对象的思想特征和行为指向,思考并实践“说什么”“在哪说”“怎么说”,力求做到有的放矢,力戒“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不能用,软办法不顶用”的“本领恐慌”,实现效能“润物细无声”。

六要善于运用新技术新媒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改革创新本领,保持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善于结合实际创造性推动工作,善于运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开展工作。”^[7]精准统战工作,要积极用好新媒体,做到关键时刻不失语,重大问题不缺位,做到对症下药、释惑解疑,“把理说透、把话讲到,把疑解开”。

四、新时代推进党外知识分子群体精准统战工作的实践进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外知识分子工作是统一战线重要工作。做好党外知识分子工作,充分尊重是

前提,加强引导是关键,发挥作用是目的。”^[8]党外知识分子工作是党的一项特殊的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和持久的人心工程。在新时代,只有聚焦新时代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的特点,坚持整体把握与精准施策的辩证统一,才能统筹做好党内外、体制内外和海内外知识分子和人才工作,才能不断提升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持续推动党外知识分子精准统战工作见行见效。

(一)全面把握新时代党外知识分子特点,增强党外知识分子精准统战工作的时代性

要应对党外知识分子新的特点和独特特征的变化,就必须找准新时代党外知识分子群体新变化的切入点,与时俱进地开展工作。一要研究把握新时代党外知识分子概念和重点工作对象范围。党外知识分子工作与统一战线各个领域工作紧密交织、深度融合,在一定程度上党外知识分子群体的构成是动态发展的。当前,无党派人士、党外知识分子、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归国留学人员等六个群体归口党外知识分子。这六类对象人员交叉、概念模糊、身份界定不清,没有统一的分类标准,需要从理论上阐释清楚具备民主党派成员身份的党外知识分子、无党派人士和党外知识分子的关系,明确“做谁的工作”的问题。二要深化对新时代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规律的认识。面对国际意识形态斗争更加激烈,信息社会人们思想更加多元的时代课题。必须遵循知识分子成长规律和党的知识分子工作规律,体现尊重知识分子价值和尊重人的价值的科学性、人文性、价值性,科学制定和切实落实党对知识分子的宏观政策和微观政策。三要构建科学合理的党外知识分子队伍规模数量。我国党外知识分子数量庞大、影响广泛,呈现出大众化、多层次、流动性强等特点,尤其目前仍以20世纪90年代的大专以上的受教育程度为标准,这样容易稀释党外知识分子的代表性。

(二)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增强党外知识分子精准统战工作的针对性

建构科学合理的党外知识分子政治引领机制,要充分发挥党外知识分子的特殊重要作用,引导党外知识分子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一要以先进的思想教育人,政治引领更加有力。要针对国家机关和

国有企事业单位党外知识分子十分密集的特点,不断丰富教育管理和政治引领模式。针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丰富创新思想引领的内容形式,探索新的引导方法。针对留学归国人员,帮助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和了解党情、国情、社情知识,用喜闻乐见的话语体系,用通俗易懂的话语,讲接地气的话、讲真心话。二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人,价值观引领更加坚实。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滋养人心,引导党外知识分子传承家国情怀,带头明德修身、砥砺品行,发挥坚守正道、弘扬正气的表率作用。三要以共同的事业团结人,事业引领更加有效。要鼓励支持党外知识分子立足岗位建功立业,把个人目标追求融入同心共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事业,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积极推进党外知识分子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助力高质量发展,引导工作落在产业、力量聚在产业、温度传递到产业。

(三)着力改进工作方法,增强党外知识分子精准统战工作的实效性

在新时代背景下,党外知识分子工作需要系统性思维创新统战方法,构建“分层化、场景化、协同化、差异化、靶向化”的工作体系。一是构建“领域+场景”双导向模式。以分领域定制工作抓手,在高校与科研机构领域,建立“学科+统战”联动机制和“学术共同体”机制。在新业态领域打造“云端统战之家”,建立“柔性管理”制度。对技术型人才组织“大国重器参访行”,直观感受国家发展成就。二是聚焦三类重点群体靶向突破。“海归派”知识分子,建立“归国服务驿站”,提供政策解读、职业对接“一站式”服务。“体制外”技术骨干,创建“技能大师工作室”。“Z世代”青年知识分子,用动漫、短视频传播核心价值观。三是构建网络统战,强化数字化工具应用。利用新媒体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推送政策解读与国情教育内容。开发统战工作APP,设置“网络议政厅”“云上社情民意站”等板块,实现信息共享、项目对接和意见反馈的“一站式”服务,培育“红色大V”。

(四)丰富工作平台和载体,增强党外知识分子精准统战工作的精准性

增强对党外知识分子精准统战的精准性,必须要在统战工作载体上下功夫。一是完善制度化参与平台。通过单位的知联会或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建立定

期与党外知识分子沟通制度,搭建“建言直通车”机制,将党外知识分子纳入政策咨询、民主监督等环节。完善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工作制度,鼓励党外知识分子发展壮大或成立更多的自治性组织。同时,还可以依托社区开展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对党外知识分子进行广泛联系。二是构建“全链条”的发展平台。在全社会营造创新氛围,为党外知识分子发挥聪明才智营造适应环境。比如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碳中和等国家战略领域,成立“党外专家行业联盟”,推动跨学科合作;为高校党外教师提供科研项目申报绿色通道,为民营企业技术骨干对接行业培训资源。针对自由撰稿人、网络主播、独立设计师等新业态群体,建立“灵活就业者服务中心”,提供版权保护、税收咨询等服务;建立法律、医疗、教育服务基地,常态化开展惠民活动。三是创新激励机制,激发内生动力。完善培养机制,从源头抓起,在过程中跟踪,于全程处用心,制定多方面、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培养计划,强化专业能力培养制度体系。增强激励机制,依托市场机制探索股权、期权、分红等激励措施,设立“党外知识分子贡献奖”。

(五)厚植统战文化沃土,增强党外知识分子精准统战工作的纽带性

新时代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要突破传统的“政策执行”,从文化维度构建“价值共同体”,真正激活统一战线的“纽带效应”。一是以文化浸润为基础,强化统战文化引领。针对不同党外知识分子群体,设计推出“红色体验”“初心之旅”“红色主题”等统战文化共识教育及研学线路。鼓励知识分子在专业领域(如科技创新、社会治理)中融入国家战略,通过“科技报国论坛”“法治中国研讨会”等平台,促进学术研究与政治方向同频共振。通过学术研讨、艺术创作、社会实践等“隐性统战”方式,将统战文化融入知识分子的专业活动与日常生活。二是以价值共鸣为抓手,强化统战文化宣传。弘扬“家国情怀”与“专业精神”的融合,宣传钱学森、黄大年等“知识报国”典型,塑造“知识分子与国家共命运”的集体记忆,强化使命感。三是以多元共生为活力,打造“分众化”统战场景。发挥党外知识分子在文化传承等方面的独特作用,用心打造不同领域党外知识分子的文化特色、品牌,不断拓展统战文化的内涵和外延。

(六)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增强党外知识分子精准统战工作的协同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统战工作是全党的工作,必须全党高度重视,大家共同来做。”^[8]要自觉“调焦对表”,推动统战工作从“单兵作战”向“联合作战”升级。一是建立多部门的联动机制。建立“中央-省-市-县-基层”五级联动机制,推动统战部门与组织、宣传、科技、教育等部门建立“联席会议制度”,打破信息孤岛,形成“全域覆盖、多方联动”的生态体系。二是强化责任链,提升协同效能。定期认真讨论研究,着力解决党外知识分子工作面临的突出问题;制定和贯彻党外知识分子方针政策,推动与之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制定,督促检查相关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的落实情况;组织开展党外知识分子统战理论及政策的研究、宣传和教育。三是加强统战能力建设,提升统战干部素养。提升对新时代统战思想的理解与阐释能力,将政治语言转化为知识分子、新阶层群体易接受的“学术话语”“网络话语”。提升组织动员力,激活民主党派、工商联、知联会等组织的“毛细血管”功能,形成“党委领导+群团联动+社会参与”的动员格局。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 巩固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广泛力量支持[N].人民日报,2015-5-21(01).
- [2]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33,40.
- [3]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7.
- [4]习近平.必须坚持守正创新[J].求是,2024(23).
- [5]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筑牢理想信念根基 树立践行正确政绩观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留下无悔的奋斗足迹[N].人民日报,2022-03-02(01).
- [6]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学习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23.
- [7]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68.
- [8]习近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好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J].求是,2024(2).

责任编辑:王洋洋

基于人才资源开发理论的高校党外代表 人士全周期管理机制研究

陈 华,张录全

(天津工业大学,天津 300387)

【摘要】 本文基于人才资源开发理论,深入探讨了高校党外代表人士全周期管理机制的构建与实施。研究指出,当前高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面临系统性与协同性不足等挑战。研究构建了“全周期管理-协同发展-多维保障”三维体系,强调从发现、培育、使用、评估到监督管理的全过程系统管理,促进校内、校社及校企资源的整合与共享,并从组织领导、经费保障、宣传推广和动态反馈等多维度提供全面支持。通过实施需求导向型培养体系与动态评估机制,推动高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为新时代统战工作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

【关键词】 人才资源开发理论;高校党外代表人士;全周期管理机制

中图分类号: D613;G6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089(2025)04-0037-04

“党外代表人士是党和国家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地位。”^[1]¹⁶⁵要更好发挥党外人士作用,就必须“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健全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制度”^[2]。当前高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面临系统性不足、选育用管各环节衔接不畅、评估标准不能全面反映其能力与潜力、人才资源配置效率与适配性不足等挑战,制约了统战效能的发挥。基于

人才资源开发理论构建全周期管理机制,对摆脱传统困境、推动队伍建设、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具有重要意义。

一、理论基础与框架构建

在全球化与知识经济背景下,人才资源开发理论为组织人力资源管理提供新视角。立足该理论,剖析高校党外代表人士成长规律,构建“全周期管理-协同发展-多维保障”体系,可摆脱传统困境,支撑新时代

基金项目:2025年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智库项目(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专项)“基于人才资源开发理论的高校党外代表人士全周期管理机制研究”(TJYZ25-10);2024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高校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主体协同机制研究”(24YJA710065);中国高等教育学会2024年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规划课题“高校党外代表人士主体协同机制研究”(24TZ0401)

作者简介:陈华,天津工业大学党委统战部部长,高级政工师,研究方向为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张录全,天津工业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党委书记,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

人才建设。

(一) 人才资源开发理论的核心要义

人才资源开发理论将人才开发活动细化为四个层次,“即建立在‘自我开发’基础上的‘培养性开发’、‘使用性开发’和‘政策性开发’,从而体现了连续开发、深层开发、才能升值”^[3]。该理论的核心在于:其一,通过系统化、科学化方法,对人才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系统培育,以实现专业技能与综合素质的提升,包括知识结构完善、实践能力增强、创新思维及道德品质塑造。其二,强调人才资源的合理配置,通过精准安排至合适岗位,实现人才与岗位的最佳适配。其三,强调人才的有效利用,通过激励机制与工作环境优化,构建公平合理的薪酬体系,提供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等,激发人才的积极性与创造力,确保人才在组织中的充分认可与发展。

(二) 人才资源开发理论在高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中的应用价值

人才资源在国家人力资源中占据高层级,“在人口资源、人力资源、人才资源这个金字塔建构中,人才资源处于金字塔的顶端”^[3]。高校党外代表人士作为这一层级的代表,其队伍质量对学校发展和统一战线巩固意义重大。运用人才资源开发理论,能充分激发党外代表人士的潜在能量,为队伍建设提供系统规划和科学管理的指导。通过分析其成长规律和需求特点,设计科学合理的选拔、培养、使用和评估体系,确保人才资源最大化利用。同时,注重个体能力与组织环境的适配,推动个人与组织共同发展,持续优化队伍建设。

(三) 全周期管理体系的总体架构

构建“全周期管理-协同发展-多维保障”三维体系,是全面提升高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质量的机制保障。该体系以全周期管理为基础,注重从发现、培育、使用、评估到监督管理的全过程系统管理和持续优化,确保人才成长的连续性和系统性。协同发展作为动力,强调校内各部门、高校与企业及社会间的资源整合与共享,通过构建五方联席机制、产学研用协同平台等,促进多方资源高效利用,发挥协同效应。多维保障作为支撑,从组织领导、经费保障、宣传推广和动态反馈等多维度构建支持体系,通过成立领导小组和专家团队、建立多渠道筹资与预算精细管理机制等措施,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提供全面保障,确保

管理机制顺利实施和持续优化。

二、全周期管理体系的深度剖析

全周期管理是高校党外代表人士资源开发的核心,强调从选拔到评估的闭环优化。通过解构五大环节,结合需求导向培养与动态评估,揭示其成长逻辑,为提升统战效能提供可复制的实践范式。

(一) 发现机制的创新与实践

发现环节是全周期管理的起点。“发现和延揽党外优秀人才是做好高校党外代表人士培养、选拔和使用工作的第一道关口,也是做好高校党外代表人士整体工作的关键一步。”^[4]通过构建“四位一体”发现网络,即校内推荐、社会举荐、自我推荐和专家推荐,形成多渠道、多层次的选拔机制,确保优秀党外代表人士的精准识别。选拔机制基于多元化与系统性理念,落实“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开放式的党外人才发现推荐网络”^{[1][69]},保证选拔过程广泛、公正且高效。“四位一体”网络中,校内推荐依托学院动员,社会举荐拓宽视野,自我推荐增强透明度,专家推荐提升权威性。多元化选拔标准涵盖政治素质、业务能力和社会贡献,实施动态调整机制,以适应队伍建设的不断变化。

(二) 培育机制的优化与升级

培育环节是全周期管理的核心。“培养‘可行’的人,是高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核心,也是高校开展统战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5]。为此,需建构“需求导向-阶梯培养-产学研用”三级培育链,根据党外代表人士的多样化需求和背景,实施分层分类、实践导向的培养模式。该体系通过基础夯实、能力跃迁和实践淬炼三个阶段,系统提升其综合素质与实践能力。基础夯实阶段强化政治理论与业务知识学习;能力跃迁阶段通过案例分析、模拟演练提升实践能力与问题解决能力;实践淬炼阶段则通过挂职锻炼、项目参与促进理论与实践融合。同时,实施“学术+政治”双导师制,确保业务与思想同步提升。针对不同界别、专业的党外代表人士,采取差异化培养策略,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根据个人发展情况与实际需求灵活调整培养方案,确保培养工作的适应性与有效性。

(三) 使用机制的探索与突破

使用环节是全周期管理的重要目标。“对高校党外代表人士的任职使用就是最好的培养和历练。”^[4]为此,需建立“人岗适配-动态轮岗-效能闭环”的使用

机制。该机制强调人岗适配,通过科学分析确保党外代表人士与岗位的最佳匹配,最大化发挥其潜能。同时,实施动态轮岗制度,综合考虑专业背景、能力特长及政治参与意愿,为其安排合适岗位并定期调整,特别是增加政治活动等方面的轮岗机会,增强其综合能力和政治经验。此外,制定详细工作目标和考核标准,建立效能闭环机制,定期评估并反馈结果,形成闭环管理,并配合物质与精神激励,确保党外代表人士发挥最大作用。

(四)评估机制的科学性与公正

评估环节是全周期管理的总结与提升阶段,也是“是检验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成效的重要抓手”^[6]。通过构建“政治素质+业务能力+社会贡献”的三维动态评估模型,并实施差异化考核策略,确保评估既科学又公正。该模型涵盖政治定力、思想觉悟、专业技能等多方面内容,采用量化与质性评价结合,确保评估结果客观准确。差异化评估策略针对不同界别、专业的党外代表人士,制定差异化考核标准,避免“一刀切”,确保评估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为了有效加强党外代表人士的管理和考核,必须从各领域党外代表人士的特殊性出发,推进差别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建设”^[7]。同时,建立动态反馈机制,将评估结果及时反馈给个人和组织,为后续培育和使用提供依据,推动评估机制持续优化完善。

(五)监督管理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在全周期管理体系中,监督管理是确保党外代表人士健康成长和有效使用的重要保障。“党外代表人士作为党和国家干部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加强管理监督,是贯彻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原则,全面从严管理的必然要求”^[8]。监督管理内容涵盖思想动态、工作表现及廉洁自律等多个方面,通过定期谈心谈话、问卷调查等方式掌握其政治立场与思想觉悟,利用全面考核与日常监督确保工作态度与效率,并强化廉洁自律教育。监督管理结果作为选拔任用、评先评优的重要依据,对优秀者表彰奖励,对存在问题者帮扶指导,对违规违纪者严肃处理。此外,需持续改进优化监督管理机制,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提升监督效率与精准度。

三、协同发展机制的构建与实施

协同发展机制是突破人才资源开发碎片化的关

键。通过校内五方联席、校社资源共享、校企产学研用协同三维度切入,整合资源、协调行动,构建多方共赢生态。“同时,联合开展跨学科、跨领域的党外代表人士培养项目,激发党外代表人士的创新思维与实践能力,推动队伍建设工作不断创新发展”^[9]。

(一)校内协同机制:构建五位一体,强化联动效能

一是五方联席机制的理论基础与架构设计。五方联席机制作为校内协同的核心,其理论基础源于系统论与协同管理理论。系统论强调整体性与关联性,将高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视为复杂系统,需全局协调各部门工作以确保高效运作。协同管理理论则指出,跨部门信息共享、资源整合与行动协调可最大化系统效能,推动队伍建设持续优化。架构上,该机制由党委统战部、组织人事部、教务处、科研处、教师工作部五部门构成,形成“决策-执行-监督-反馈”的闭环管理体系。

二是信息共享与沟通协调机制的深化。信息共享是五方联席机制高效运行的基础。通过建立统一信息管理平台,实现教育、科研、人才等资源的数字化、网络化共享,提升工作效率。同时,制定信息共享规范与流程,确保信息安全性与有效性。沟通协调方面,除定期联席会议外,设立专项工作小组,针对特定问题联合攻关,形成解决问题的合力。此外,建立快速响应机制,确保工作连续性与稳定性。

三是资源共享平台的战略价值与全面实施。资源共享平台通过整合各部门资源,形成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为党外代表人士提供丰富成长资源与发展机会。平台建设遵循系统性、开放性与可持续性原则,先进行资源盘点与分类,再构建在线课程库等核心模块,实现资源数字化管理与智能化推荐。同时,建立科研合作与项目对接机制,设立人才交流与挂职锻炼基地,促进全面发展与能力提升。

(二)校社协同机制:深化社区融合,促进资源共享

一是校社协同机制的理论基础与构建原则。校社协同机制的理论基础主要源于社会资本理论和社区发展理论。社会资本理论强调通过建立广泛的社会网络和信任关系,促进资源、信息和知识的流动与共享,为高校党外代表人士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社区发展理论则注重社区内部成员的互动与合作,为高校与社区的深度融合提供理论支撑。构建校社协同机制需

遵循互利共赢、资源共享、责任共担的原则,确保协同机制的可持续性和有效性。

二是校社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的实践路径。主要包括:教育资源开放,高校向社区开放图书馆、实验室等资源,邀请社区专家进校园;科研合作深化,联合开展科研项目,促进成果转化;文化交流促进,共同举办文化活动;实践基地共建,高校在社区建立实践基地,提供社会实践机会,社区为高校提供实习和就业岗位,形成共赢局面。

三是校社协同机制的持续优化与动态调整。这是确保其长期有效性的关键。需建立定期评估与反馈机制,全面评估资源共享程度、合作项目进展等,及时调整策略。加强高校与社区间的沟通,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关注社区需求变化与高校发展动态,及时调整协同重点与方向,“将高校党外代表人士所在领域的理论专长具体运用到社会实践中去”^[10],为其提供持续发展支持。

(三)校企协同机制:深化产学研用,实现互利共赢

一是产学研用协同平台的理论创新与运行模式。产学研用协同平台将高校、企业与研究机构视为创新系统的三大主体,通过知识、技术、人才与资金的双向流动与深度融合,推动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该平台强调“产学研用”一体化,形成闭环创新体系,为党外代表人士提供全方位成长支持。高校、企业与研究机构通过项目合作、技术转移与人才培养等方式,建立长期稳定合作关系。

二是校企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的深度融合。校企资源共享的核心在于明确双方核心资源与优势领域,通过资源互补实现共赢。高校开放教育资源,为企业提供继续教育支持;企业提供实践基地、设备与资金,助力高校实践教学。同时,建立资源共享机制,包括科研设备、人才交流与信息资源共享,确保资源共享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加强校企人才交流,促进人才流动与知识共享。

三是校企协同的持续优化与动态调整机制。校企协同需建立定期评估与反馈机制,全面评估资源共享程度、合作项目进展等,及时调整合作策略。加强校企沟通,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增进理解与信任。关注外部环境变化与内部需求变动,及时调整校企协同重点与方向,确保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共同开发新课程、

新项目,培养符合市场需求的高素质人才。

四、多维保障体系的构建与完善

多维保障体系是人才资源开发理论落地的重要支撑,“关系到我国的政治建设、民主建设和制度优势在高校中的体现”^[11]。通过组织领导协同、经费精细管理、宣传矩阵及动态反馈机制,确保队伍建设持续优化,赋能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

(一)组织领导体系的强化与优化

领导小组与专家团队的协同运行机制。领导小组与专家团队的协同运行是高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顶层设计的核心。领导小组作为战略规划者,负责总体规划、政策制定及资源配置,确保建设方向的正确性与前瞻性。专家团队则提供智力支持,负责具体方案的设计、实施与评估。基于系统论与协同论,两者被视为一个整体系统,通过信息共享、资源整合与行动协调,实现整体效能最大化。要明确职责分工,领导小组负责战略规划与政策引导,专家团队负责方案设计与技术支撑;加强沟通协调,通过定期联席会议、专项工作小组等形式促进信息共享与问题共商;强化监督评估,建立机制对两者工作进行定期评估与反馈,确保目标实现与持续改进。

组织协调与督促检查机制的系统构建。组织协调与督促检查机制是确保任务落实与执行的重要保障。其构建遵循系统性、科学性与实效性原则,形成上下联动、部门协同的工作格局。基于控制论与目标管理理论,该机制强调对工作过程的动态监控与及时调整。需建立工作台账,细化分解任务,明确责任人与完成时限;加强督促检查,定期评估任务完成情况,对未完成任务进行督促与整改;建立问责机制,对工作不力的责任人进行问责与处罚;强化结果运用,将任务完成情况纳入绩效考核体系,作为干部选拔任用、评先评优的重要依据。

(二)经费保障体系的建立与管理

多渠道筹资与预算精细管理机制的构建。经费是高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重要物质基础。基于公共财政理论与资源优化配置理论,多渠道筹资强调通过政府拨款、社会捐赠、校企合作及科研成果转化等多种途径筹集资金,保障经费来源的多元化与稳定性。预算精细管理则注重预算编制、执行、监督与考核的全过程管理,确保预算合理性与科学性,提升资金

使用效益。具体措施包括:拓展筹资渠道,积极争取政府支持,加强与社会各界合作;推动科研成果转化,反哺队伍建设;实施预算精细化管理,建立科学化、民主化预算编制机制;加强预算执行监控与考核,确保资金合规高效利用。

经费使用效益与评估机制的完善。完善经费使用效益与评估机制是提高经费使用效益、确保合规性的关键。该机制遵循效益最大化与合规性原则,基于绩效评估理论与成本控制理论,通过量化指标与质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全面客观评估经费使用效益。具体措施包括:建立效益评估体系,制定科学合理的评估指标与方法;强化评估结果运用,将其纳入绩效考核体系,作为经费分配依据;对经费使用效益高的项目与个人给予表彰奖励,对效益低的进行督促整改;根据评估结果反馈,及时调整经费分配方案与使用计划,持续提升经费使用效益与资金使用效果。

(三)宣传推广体系的打造与提升

宣传矩阵的构建与传播策略的实施。宣传矩阵的构建是提升高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知名度的重要途径。需遵循多元化、针对性与互动性原则,整合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资源,如校报、校刊、校园网,社交媒体及短视频平台,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宣传格局。基于传播学与营销学理论,制定有针对性的传播策略,根据受众与渠道特点定制内容与方式。同时,加强互动交流,通过宣传矩阵与受众实时互动,及时了解需求与反馈,增强参与感与归属感,实现宣传效果最大化。

典型案例的挖掘与推广机制的建立。典型案例的挖掘与推广是推广高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经验的关键。需遵循真实性、典型性与可复制性原则,通过实地调研、访谈交流等方式收集第一手资料,确保案例真实可靠。总结提炼案例,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与做法。建立推广机制,通过经验交流会、案例集、专题文章等形式广泛宣传。利用宣传矩阵持续宣传,扩大影响力与覆盖面。强化示范引领作用,激发更多高校与党外代表人士的参与热情与创造力,推动队伍建设工作不断创新发展。

(四)动态反馈与持续优化机制的构建

反馈机制的建立与信息收集渠道的拓展。反馈机制的建立是了解高校党外代表人士需求、推动队伍建设持续优化的基础。需遵循全面性、准确性与及时性

原则,构建多渠道、多层次的信息收集与反馈体系。基于信息论与反馈控制理论,通过问卷调查、个别访谈、座谈会等传统方式,以及在线调查平台、社交媒体互动等新兴方式收集信息。确保信息全面准确,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同时,拓展信息收集渠道至校友网络、行业协会等校外资源,加强与党外代表人士的沟通,建立长期稳定的信息收集关系,为队伍建设持续优化提供依据。

持续优化策略的制定与实施效果评估。持续优化策略的制定与实施效果评估是推动队伍建设的关键。遵循科学性、针对性与实效性原则,形成持续改进与创新的工作格局。基于持续改进理论与创新管理理论,根据反馈信息与数据分析结果,制定针对性的优化策略,并付诸实施。持续改进理论要求优化工作策略与方法,提高工作质量与效率;创新管理理论强调引入新理念与方法,推动工作创新。定期评估优化策略的实施效果,确保其有效性,推动高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参考文献:

- [1]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学习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
- [2]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4:34.
- [3]王通讯.中国人才资源开发论纲(上)[J].中国人才,1994,(11):13-18.
- [4]李军刚,毛心怡,修嘉瑜.新时代高校党外代表人士培养、选拔和使用问题及对策研究[J].贵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4,(02):40-45.
- [5]祁雪春.高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的工作创新机制研究[J].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3,24(06):34-40.
- [6]郭江龙,迟明松,白宇.加强和改进高校党外代表人士综合评价体系的对策建议[J].山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4,(04):61-67.
- [7]夏再军.党外代表人士差异化管理研究[D].国防科技大学,2018:32.
- [8]本书编写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精神学习问答[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165.
- [9]张录全,沈浩鹏.基于协同学与系统学的高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主体协同机制研究[J].天津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5,(02):34-38.
- [10]周文华.新时代高校党外代表人士统战工作研究[D].南华大学,2019:90.
- [11]兰定松,桂楚,赵小钊,等.高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研究[J].安顺学院学报,2023,25(05):88-92.

责任编辑:王洋洋

智能传播时代澳门青年文化认同培育的启示研究

张苏媛¹, 贾倩文^{2,3}, 李颖¹

(1. 天津商业大学, 天津 300134 2. 天津天狮学院, 天津 301700

3. 澳门城市大学创新设计学院, 澳门 999078)

【摘要】 随着智能传播时代的到来与信息技术的发展, 文化再现与传播的方式日益多样化, 海量的信息无形中影响并塑造着每个人的价值观念。港澳地区作为祖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港澳青年的文化认同是国家认同的重要内容, 关乎“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在此背景下, 本研究从智能传播时代澳门青年文化认同现状出发, 探讨智能传播对澳门青年文化认同的影响, 比较智能传播时代澳门与香港青年文化认同培育共性与特性, 结合案例总结澳门青年文化认同的培育经验, 以期在香港在青年文化认同建设方面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 智能传播; 文化认同; 港澳青年; 培育启示

中图分类号: D676.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089(2025)04-0042-04

青年文化认同对于国家稳定与文化自信具有基础性作用。澳门与香港作为中国特别行政区, 在文化传承上扮演着独特角色, 尽管彼此关联密切, 但因其历史进程存在差异, 两地青年所处的文化环境与面临的挑战各不相同。调查显示, 近七成澳门青年主要通过互联网了解中华传统文化, 这表明智能传播已成为影响港澳青年文化认同建构的核心变量。以往传统的单向度、被动式文化灌输方式已难以满足智能传播时代青年追求互动、参与以及个性化体验的需求。^[1]在此背景下, 梳理智能传播时代澳门青年的文化认同培

育工作现状, 分析其关键影响因素, 比较港澳青年在文化认同方面的异同, 提出对香港有借鉴意义的路径, 最终促进两地文化交融与“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

一、智能传播时代澳门青年中华文化认同: 现状、实践与影响机制

(一) 现状: 基础稳固与挑战并存

相较于港台地区, 澳门青年的中华文化认同基础相对稳固, 这是历史、教育、政策、经济与地理等多重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教育上, 澳门与内地采用统一

基金项目: 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智库项目(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专项)“智能传播时代下澳门青年文化认同培育对香港启示研究”(TJYZ24-10)

作者简介: 张苏媛, 天津商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化认同研究; 贾倩文, 天津天狮学院讲师, 澳门城市大学创新设计学院在读博士, 研究方向为新媒体传播; 李颖, 天津商业大学艺术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为文化传播。

的人教版教材,为构建共同的文化认同奠定了基础。政策上,澳门特区政府长期致力于本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有效地增强了居民的文化归属感。经济上,澳门产业结构相对单一,与内地的紧密合作及经济依赖加强了彼此的联系。地理上,澳门地域较小,人口集中,有利于形成紧密的社会网络促进文化传承。

澳门青年的文化认同虽有较好的基础,但仍面临诸多挑战。主要问题在于:一方面,多元文化融合与冲突并存,由于澳门外来移民较多,多种文化在此碰撞,这对中华文化主体性构成挑战;另一方面,文化展示与传播方式单一,数智技术在文化内容更新与传播上的应用不足,人工智能驱动的文化创新往往娱乐性过重,缺乏深度且有效监督;此外,语言背景和民俗习惯的差异可能导致文化在传播过程中效力递减,从而限制了其影响力。

(二)实践:三位一体的协同培育模式

为应对上述挑战,澳门社会积极构建了以家庭、学校、社会为支柱的多主体协同育人体系,该体系运用智能传播技术赋能浸润式教育以探索文化认同培育的有效路径。

澳门从高校到社区机构均成为文化认同培育的关键实践场域,其举措呈现出线上与线下渠道融合、理论与实践并重的特点。一方面,通过举办传统文化讲座、历史展览及文化遗产研学等活动,为青年提供具身体验与感性认知中华文化的场域。另一方面,借助社交媒体平台,鼓励青年进行文化实践的自我表达与分享,构建数字空间中的互动式文化交流生态。此外,体系化的中华文化课程设置与主题性知识竞赛的开展则更好地致力于从理性认知层面深化青年对中华文化历史脉络、价值内核和精神意蕴的理解,从而系统性地提升其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2]

澳门各界从政府到社会组织都在积极推进青年认同并传承中华文化,文化部门开展“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有益于加深青年对国家以及中华文化的认识,助力港澳学子相互交流合作,同时也为澳门文化发展储备人才。政府承办诸多关于传统文化的节日活动和文化沙龙活动,提供丰富的文化体验,以此提升青年对中华文化的感知,社会团体和志愿者通过举办文化讲座、参与体验活动等方式传递中华文化精华,智能传播技术极大地扩充了此类活动的影响力,

营造出更好的文化传播环境。^[3]

(三)影响机制:智能传播的双重性与复杂性

智能传播通过重塑媒介技术、载体与使用方式,对澳门青年文化认同产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影响。

智能技术以其高效、互动、个性化的特点,打破了传统媒介的局限。算法推荐可以精准推送符合青年兴趣的文化内容,而视频、VR等富媒体形式则提供了更生动、直观的沉浸式体验。然而,这种变革也带来了风险,其主要表现在:一是“虚拟实践”虽便捷,但其娱乐化、资本化的本质易催生“快消式”的浅层社交,因此难以构建深度的情感体验与意义认同;二是部分媒介为追求流量,可能将文化内容过度商业化或娱乐化,导致青年认知产生偏差。

媒介使用对提升不同类型青年群体的文化认同存在差异性。媒介使用的影响并非整齐划一,而是存在显著的群体差异。热衷社交媒体的青年,虽然文化接触面广,但理解可能碎片化、表面化;偏好传统媒介的青年,认同可能更深刻,但视野或显局限;而钟情于动漫、音乐等特定文化产品的青年,可能形成强烈但狭隘的“趣缘认同”^[4]。智能时代不同青年群体因兴趣、教育、生活环境差异,使用媒介习惯各异致使文化认同特点不同。

因此,为有效提升港澳地区青年的文化认同,必须针对不同群体的媒介偏好,制定精准的传播策略。对社交媒体用户优化内容呈现,引导其深度思考;为传统媒介用户加强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开发;为特定文化爱好者拓宽其文化视野,促进对多元文化的理解与包容。

二、智能传播时代澳门与香港青年文化认同培育的比较研究

(一)澳门与香港青年文化认同培育的异同

香港与澳门两地都经历了长期的殖民统治时期,产生了东西方文化相互交融的城市特色。从文化根源上看,两地的青年都受到中华文化中的岭南文化滋养,并在新时代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面临共同的机遇与挑战。

尽管有共通之处,但两地在历史传承、教育体系、政治环境以及文化政策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导致青年文化认同培育路径和成果显著不同。澳门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普及相对成功,青年群体

展现出强烈的国家与民族认同感。相比之下,香港经历长达 156 年的英国殖民统治,教育理念深受西方影响,西方价值观渗透颇深。加之近年来复杂的外部政治因素,致使部分香港青年在国家及文化认同方面存在偏差与迷茫。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多元价值观冲击,更进一步增加了其文化认同构建的复杂性。

新时代,国家对于港澳两地青年的文化认同培育提出了更高要求。重点在于:其一,要加强国家意识及爱国主义教育;其二,在“一国两制”框架下探索契合自身区域特色的文化认同培育路径以服务于国家发展全局。两地虽然有着共同的文化根基和目标,但鉴于各自面临的问题不同,其解决方案绝不能一概而论,必须因地制宜采取差异化策略。^[5]

(二) 智能传播时代两地青年文化认同培育的策略比较

在具体策略上,澳门的实践取得了显著成效。其成功经验可归结如下:第一,营造了有利的社会环境,政府、学校和社区三方协同推进国家认同教育;第二,明确了教育核心,按照《宪法》和《基本法》,加深青年对“一国两制”及中央与特区关系的认识,并把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想构建中;第三,形成完善的保障机制,通过系统的教育纲要、政策扶持以及财政补贴体系,为青年认同的稳步提升提供了坚强后盾,使其形成了较强的价值观“免疫力”与自我调节能力。

反观香港的青年认同培育则面临严峻挑战,首要问题是教育体系未能完成“解殖”(De-colonization),由于长期沿用西方式的公民教育模式与评价标准,导致初期教育体系中国民教育缺失。其次,部分深受殖民时期及海外思潮影响的教师,未能客观引导,阻碍了青年对国情和民族文化的正确认识。最后,香港缺乏专门的法规与专业的国民教育保障部门。从《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受阻、国民教育科被搁置,到非法“占中”和“修例风波”等一系列事件,香港青年认同薄弱问题已暴露无遗。^[6]

(三) 两地青年文化认同培育的成效与问题

调查研究显示,澳门本地青年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认同高于香港本地青年。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问答中,答错的人群里香港本地青年占比较高。在价值观认同上,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广

东学习或者工作的港澳青年认同度最高。在身份认同上,尽管大多数港澳青年自认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但仍有极少数香港本地青年明确表示不认同。香港部分青年的认同程度较低,反映出香港青年在国家和文化归属感方面较弱。澳门的爱国主义教育取得显著成效,受到国家高度肯定。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与澳门培正中学校长高锦辉交流时,称赞“澳门教育做得不错”,并多次强调“爱国爱澳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这不仅是对澳门教育成果的认可,也为澳门未来继续巩固和深化青年文化认同指明了方向。^[7]

三、智能传播时代澳门经验的启示

(一) 传播策略启示:构建全媒体矩阵,实现精准文化触达

澳门经验的核心启示之一在于,必须从“传播什么”和“如何传播”两个维度进行系统性革新。

首先,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以拓宽文化体验渠道。调查显示,社交媒体已成为青年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香港可借鉴澳门做法,整合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资源,形成包含微信、TikTok、知乎、B站等多元平台的媒体矩阵。此矩阵既是信息发布的渠道,也是文化互动场所。传播内容不能仅限于政治宣讲,要全面覆盖历史人文、艺术表演、节庆活动以及国家发展成就等多元化且高质量内容,并借助短视频、在线展览、互动直播等青年喜闻乐见的形式,全方位展现中华文化的魅力以及香港在国家发展中的独特价值,从而激发青年的文化自豪感与国家归属感。

其次,要优化算法推荐机制以实现精准文化内容推送。智能传播的核心在于精准,香港需投入资源研发和优化面向本地青年的文化内容推荐算法。通过大数据分析青年的网上行为及文化偏好,并充分考量香港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文化适应性,从而进行个性化内容推送。在内容上,确保推送内容的权威性、高质量且丰富多样,避免过度娱乐化;在技术上,利用 AI 技术从“个性化推荐”向“预测性推送”升级,进一步提升匹配精度;在机制上,建立有效的用户反馈渠道,持续优化算法和服务,提高用户的参与感和满意度。

(二) 社群构建启示:深化网络文化互动,培育青年文化共同体

文化认同的深化离不开社群的归属感。澳门通过线上线下活动,切实促进了与内地青年的交流,营造

了良性的互动文化生态。

香港可以参考这种模式,利用社交网络深化文化互动,培育青年文化共同体。其一,搭建专属交流平台。创建集资讯、讨论以及在线展览等功能于一体的文化交流社区或APP,并由官方机构运营,定期发布权威信息并举办各类活动,从而使其成为两地青年交流的“大本营”。其二,开展线上品牌活动。规划在线文化节、艺术展、语言交换伙伴项目、名家讲座等,打破地域束缚,促进香港青年同内地各领域的青年深入地交流学习。其三,深化大湾区文化联动。搭建粤港澳大湾区青年文化交流平台,共享资源信息。通过组织文化研学之旅、创新创业大赛等,鼓励青年实地体验,再结合湾区特色开展文化内容创作,在共同创造中提升区域认同感与文化交融度。

(三)治理体系启示:强化法治与监管,构建健康文化生态

健康的文化生态是认同培育的根基。澳门在意识形态风险防控及网络环境治理方面取得的成果,为香港提供了宝贵的治理范例。

首先,加强网络环境监管与提升网络素养教育。香港可参照《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等举措,建立全面的网络内容监管体系,明确平台的主体责任,坚决处置违法不良内容。同时,要将网络素养教育融入中小学课程当中,培养青年独立思考、辨别信息真伪的能力,从源头上增强其对不良信息的“免疫力”。

其次,强化法治建设与技术应用,规范智能传播秩序。完善网络法律法规,对于网络谣言、数据滥用以及算法歧视等新问题,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维护网络空间的秩序与安全。加大人工智能法律监管力度,关注AI技术发展可

能引发的伦理与法律挑战,建立相应的监管框架,确保技术向善。做好数据管理与隐私保护工作,在进行个性化推送的同时,必须建立严格的用户数据管理与隐私保护体系,通过数据加密、匿名化处理等技术手段,确保用户信息安全,赢得青年群体的信任。

综上所述,澳门的经验不是简单的模式复制,而是一套以全媒体传播为手段、以社群互动为纽带、以法治监管为保障“三位一体”式协同推进的模式。香港在借鉴过程中,要结合自身独特的社会文化环境,把这些原则性的启示变成具体的、可行的政策与行动,进而培育和巩固香港青年的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

参考文献:

- [1]殷乐,高慧敏.智能传播时代主流价值观传播的具身性路径[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03):123-134.
- [2]王雪倩.传统文化在移动短视频应用中的传播分析[J].传媒论坛,2018(18):163.
- [3]刘佳静,张兵娟,李彦龙.当代青年的媒介使用与国家认同:群体差异与影响机制[J].当代传播,2023(04):90-95.
- [4]侯杰,马晓驰,李净昉,等.有效争取港澳台青年一代人心问题研究[J].天津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02):35-40.
- [5]《争取香港学生人心凝聚力量的调查与研究》课题组.争取香港学生人心凝聚力量的调查与研究[J].天津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04):23-28.
- [6]李洪梅.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背景下的港澳青年中华文化认同研究[J].广东教育(高校思想教育探索),2021(06).
- [7]冯庆想.香港本土意识与青年国家认同——基于内地与港澳学界的文献分析[J].青年学报,2020(01):93-101.

责任编辑:李雯

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

秦院院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400)

【摘要】历史上,我国宗教在促进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这是各宗教自觉实现中国化的结果。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推动宗教界在政治上认同、文化上融合、社会上适应,有助于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增强中华民族对宗教群体的吸引力、感召力,增强宗教群体对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增强包括宗教界群众在内的中华民族成员相互间的亲和力,遏制宗教领域的民族离散力因素,有力增强中华民族整体凝聚力。

【关键词】 宗教中国化;中华民族;凝聚力

中图分类号: D6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089(2025)04-0046-04

宗教界人士是统战工作的重要对象,是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我国宗教问题和宗教工作,提出“必须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1]的重大创新论断,为做好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根据马克思主义宗教社会学的观点,宗教对社会有着重要影响,这种影响有积极和消极的两重性特征。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对于充分发挥宗教作为一种信仰共同体的凝聚作用,紧密团结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意义十分重大。

一、我国宗教界人士是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

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我国各宗教随

着时代变化而不断进行自我调试,发挥了宗教界的积极作用,信教群众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作出了积极贡献。

(一)推动社会和谐稳定,维护民族团结,不断增强中华民族亲和力

中华民族亲和力是中华民族成员之间的和谐亲密相处力,它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体现,存在于社会群体(家庭、邻里、社区、政党、阶层、宗教组织等)之中。我国宗教历来有良好的传统,比如主张“和”、倡导“善”,强调团结,通过宗教典籍、教规教义教育引导信众“乐善”“立德”“仁慈”等,这有利于我国的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稳定,为促进中华民族的繁衍发展、增强中华民族亲和力发挥了积极作用。比如民国时期,我国穆斯林自觉为改善回汉之间的民族矛盾而进行了

作者简介:秦院院,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理论研究部助教,研究方向为党的宗教理论与方针政策、中华民族凝聚力等。

一系列努力,王宽阿訇倡导成立了中国回教俱进会,提出了“兴教育、固团体、回汉亲睦”的主张。这些主张对于养成淳良民风、促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和谐发挥了积极作用,极大地增进了民族成员之间的亲和力。

(二)推动社会变革图强,促进民族发展,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向心力

中华民族向心力是指中华民族大家庭内各民族及其成员对民族大家庭的认同、归属、依附、融入的力量,是中华民族成员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向往力,它与中华民族吸引力构成了凝聚力的双向力量结构。我国宗教界在不同历史时期参与发动或推动的许多社会变革图强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增强了民族成员对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宗教界人士不分彼此,共赴国难,一心为了中华民族图强救亡。宗教界人士在这些社会变革与发展的运动中不断得到锤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大义在中国宗教界中得以逐步形成,“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成为各宗教界人士心之向往,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充分得到彰显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得以增强。

(三)推进经济文化交流,促进民族融合,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吸引力

中华民族吸引力是指共同的地域生活和奋斗目标使得中华民族整体对民族成员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它是民族凝聚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我国宗教本土化中国化的过程,也是不断增强中华民族整体对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的吸引力的过程。自五代时期开始,伊斯兰教就在扬州、泉州、广州等地逐渐形成了一个商业阶层。宋代的伊斯兰教有了覆盖面更为广泛的发展,他们在中国主要从事商贸活动,有些甚至“富可敌国”。这些富有而友好的阿拉伯穆斯林,有的出钱助修广州、泉州城,有的被宋廷任为朝官或市舶使,其商业活动还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和经济交流,中国的四大发明通过他们逐步传至欧洲,阿拉伯人创造的高度文明成果如天文、历法、航海、地理、医药、香料、珍宝等也随之大量传入中国,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容。宗教界人士的这些活动,在经济文化的交融互动中促进了民族融合,充分显示了宗教界在不同领域发挥积极作用的强大能量,由此产生的文化繁荣与经

济发展,也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吸引力。

二、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对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现实意义

“宗教中国化”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要命题,有着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指向性。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团结引领宗教界人士为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文化繁荣、民族团结、祖国统一服务,坚定不移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者、维护者和捍卫者,是巩固和发展壮大最广泛的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内在要求,也是增强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途径。

(一)增进我国宗教在政治上认同,维护中华民族的领导核心,引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有强大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已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就是这个强大核心。中国共产党对宗教工作的探索,如废除封建宗教土地所有制的土地改革、对宗教领域开展的民主改革等,都是在加深宗教界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认同。宗教中国化要求宗教与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情相融合,自觉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制度,这也是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根本前提和政治基础。增进宗教界人士的这种政治上认同,有利于形成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核心对宗教界群体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从而更有力地把广大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紧密地吸引、团结、凝聚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周围,巩固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根基。

(二)促进我国宗教在文化上融合,凝聚中华民族精神,增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软实力的必然要求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核心支柱,它所具有的文化认同、价值引领、精神激励、行为导向等社会功能,对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产生、维持和发展具有根本性的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华民族精神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是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的思想指导和行为规范。宗教中国化要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有助于使宗教教规教义真正融入中华文化精髓要义,形成具有中华民族精神特色的宗教文化,使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价值取向、思维模式、行为规范等方面与全体中华民族成员同频共

振,从而团结凝聚宗教界群体融入中华民族发展大局,更好凝聚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形成强大的中华民族精神力量。

(三)引导我国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发展壮大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画好中华民族同心圆的必然要求

历史地看,任何宗教想要生存和发展,都必须同所在社会相适应,不断充实其时代内涵。宗教中国化要求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既是历史的经验总结,也是宗教健康传承的客观规律要求,更是增进宗教界人士对中华民族认同的要求。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要求宗教自觉进行自我调整,自觉融入国家和民族发展大局,积极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主流思想文化、社会风俗习惯、法律法规制度等,摒弃与社会主义社会不相适应的内容,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对宗教群体的吸引力,更好团结凝聚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使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成为构成统一战线同心圆的重要一环。

三、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助力中华民族凝聚力增强的路径

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信教群众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在我国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经济文化交流与发展等各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宗教根据时势主动自我调整,在政治上拥君忠国,文化上倡导“仁”“孝”“礼”“义”“信”等文化价值观,从各个方面寻求适应与融入,积极回馈、贡献社会,这实质上便是宗教的“中国化”。进入新时代,我国宗教更应承继“中国化”的优良传统,顺应时代发展趋势,充分发挥积极作用,助力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更好地服务于中华民族复兴伟业。

(一)以增进对伟大祖国认同为核心,维护祖国和平统一,增强中华民族的吸引力

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在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下,同宗教界结成统一战线,是我们党处理宗教问题的鲜明特色和政治优势。”^[2]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华民族团结奋进、凝心聚力的精神纽带。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要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引导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团结引领

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心向祖国,坚决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也只有国家统一、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中华民族对包括宗教群体在内的民族成员才能有更强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二)以增进对中华民族认同为重点,尊重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增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

纵观整个中国历史,凡是各民族团结一心、同心合力,便能抵御外辱、促进经济发展与文化繁荣,反之则导致中华民族内部的离心力增长、国家分裂、战火纷飞、民不聊生。在这样的发展规律支配下,最终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这也是中华民族发展壮大以及我们当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前提条件。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要引领宗教界群体,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观,秉承民族团结统一、共同繁荣发展的目标,尊重中华民族的整体性,以增强宗教群体对于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引领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紧紧围绕中华民族这个核心,愿意为了捍卫中华民族的独立、振兴与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积极力量。

(三)以增进对中华文化认同为灵魂,深入推进宗教文化融合发展,增强中华民族的感召力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一方面要发扬宗教固有之优良精神。我国各宗教在其教义教规中,大都有崇尚和平、追求和谐的思想理念,如佛教的“和合众缘”、“众生平等”思想,道教的“齐同慈爱,和光同尘”思想,伊斯兰教的“两世吉庆”思想,天主教倡导的“爱国爱教”“爱邻人”,基督教的“作盐作光,荣神益人”思想等,要大力弘扬宗教这些有益于和谐社会建设的思想观念,引领广大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积极向上向善。另一方面,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宗教界坚持中华文化共识底线,结合贵和尚中的和谐思想、崇德重义的伦理要求、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团结统一的价值取向、科学民主的现代精神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主动创新,对宗教教义进行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的创新性阐释,促进宗教信仰与中华文化的融合发展。在此基础上的文化融合,使宗教兼具中华民族真诚、善良、宽容、互助、和平等优良品格,这种共同的民族品格带来的文化认同,能够

大大增强中华文化的感召力和吸引力,是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途径。

(四)以增进对中国共产党认同为根本,维护中华民族领导核心,增强中华民族的领导力

领导权是统一战线的根本问题,决定了统一战线的性质、方向和前途命运。毛泽东同志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3]在中华民族凝聚力中,起主导和关键作用的也是领导核心对周围群体的吸引力与领导力,对领导核心的拥戴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凝聚力强弱的重要尺度。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中华民族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加强党对宗教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巩固和发展党同宗教界的统一战线的根本保证。增进宗教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是增强中国共产党对于宗教群体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引领广大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紧密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的重要思想基础。

(五)以增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同为必由之路,积极回馈社会,增强中华民族的亲和力

宗教界参与社会公益慈善事业有深刻的信仰基础,也有悠久的慈善传统。譬如清代近世民间宗教中的真空教,在鸦片传入中国之后,利用宗教信仰为人戒烟治病,此即回馈社会之义举。新中国成立后的“爱德基金会”,积极开展以教育、医疗卫生、社会救助和农村发展为主的各项社会服务,开展公益慈善活动,从1985年到2005年的20年间,共筹集捐献资金近8亿元,资助项目遍及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00多个县市,项目受益人群达数百万人^[4]。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宗教积极参与社会救助、社会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在扶贫、济困、救灾、助残、养老、支教、义诊等方面发挥有益作用,是宗教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的一个重要而有效的现实途径。宗教界这种心怀人民疾苦、奉献社会的义举,展现了宗教慈

悲利他的实践精神,契合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宗教对中华民族大家庭认同、归属、依附和融入的具体体现,其造福中华民族成员之举,亦能够大大增强宗教群体与中华民族其他成员之间的亲和力,进而增强中华民族的整体凝聚力。

(六)以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为保障,维护民族和国家利益,遏制宗教领域的民族离散力

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形成了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民族凝聚力,同时也时隐时现地存在着与民族凝聚力相悖逆的另一种力量,即民族离散力,它直接冲击着中华民族凝聚力,对中华民族的发展起着阻碍与破坏的消极作用。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与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挑拨分立政策,就削弱了民族整体对民族成员的吸引力、衰减民族成员对民族整体的向心力、瓦解民族成员之间的亲和力,从而使民族凝聚力涣散,破坏内部的紧密团结。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深入贯彻落实《宗教事务条例》等宗教政策法规,有利于维护民族和国家利益,构建积极健康的宗教关系,遏制宗教领域存在的中华民族离散力因素,强化中华民族凝聚力因素,促进宗教和顺、社会和谐、民族和睦,为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 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伟力[N].人民日报,2022-7-31.
- [2]习近平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强调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 全面提高新形势下宗教工作水平[N].人民日报,2016-4-24(1).
-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4]我国宗教界参与社会公益慈善事业的考察与分析[EB/OL].2013-11-16.陕西天主教.<http://www.ssxtzj.com/index.php/show/3944>.

责任编辑:杨宁

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三维探析

王海亮,唐雯静

(佳木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黑龙江 佳木斯 154007)

【摘要】 全过程人民民主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度融合,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与实践创新,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与发展活力。从内在逻辑来看,二者同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功能上相互补充,在发展进程中同步推进,构成了有机统一的整体;从价值意蕴来看,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破解了西方现代化困境,凝聚了全民参与合力,提升了现代化治理效能,丰富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从实践路径来看,通过完善民主制度体系、创新民主实践形式、强化民主能力建设、健全民主保障机制,能够推动民主实践切实转化为现代化建设实效,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强大动力。

【关键词】 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国式现代化;民主;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图分类号: D621;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089(2025)04-0050-05

党的二十大立足新时代新征程的历史方位,对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全面部署,为二者深度融合、协同推进提供了根本遵循。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二者的有机结合构成了新时代中国发展的鲜明主线,指引着国家建设的方向与路径。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阶段,面临着人口规模巨大带来的治理压力、共同富裕攻坚中的利益协调难题、生态保护与经

济发展的平衡挑战等一系列独特课题。这些问题的复杂性、系统性要求必须发挥制度优势,凝聚全社会共识与力量。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多元参与、民主协商、有效监督等机制,能够充分整合不同群体诉求,化解发展中的矛盾阻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稳定持久的动力支撑。全球治理体系正经历深刻变革,西方“民主与现代化”的单一叙事遭遇严峻实践困境。西式民主陷入“形式化”“极化对立”的泥潭,其主导的现代化模式往往伴随着贫富分化、社会撕裂、治理失效等问题。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时代大学生奋斗精神培育研究”(20BKS193);黑龙江省教育厅创新团队项目“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研究团队”(2024-KYYWF-0627)

作者简介: 王海亮,佳木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研究;唐雯静,佳木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与实践。

全过程人民民主与中国式现代化的融合发展,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民主=西式选举”的固有认知,创造了民主与现代化协同推进的新范式,为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一、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

深入理解全过程人民民主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首先需要把握二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内在逻辑。这种逻辑不是外在的拼接组合,而是源于本质属性、功能作用与发展进程的有机统一,构成了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实基础。

(一)本质属性的同源性

全过程人民民主与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共同的制度根基,均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土壤之中。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其核心要义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始终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根本立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核心实践,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遵循现代化的普遍规律,更立足中国具体国情,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二者共同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目标,秉持着相同的价值原点^[1]。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全过程人民民主有序发展的根本保证,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方向正确的关键所在。党的领导确保了民主实践始终围绕人民利益展开,确保了现代化建设始终朝着共同富裕、全面发展的目标推进。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选举、协商、决策、管理、监督各环节,也体现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等鲜明特征之中。这种同源性决定了全过程人民民主与中国式现代化不是相互割裂的两个领域,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制度属性、价值导向、根本目标上高度一致,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本质依据。

(二)功能作用的互补性

全过程人民民主与中国式现代化在功能上相互支撑、彼此成就,形成了“民主赋能现代化、现代化滋养民主”的良性互动关系。全过程人民民主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通过规范权力运行、凝聚社会共识、化解矛盾纠纷,确保现代化建设稳步推进。在民主

决策层面,通过民意征集、专家论证、风险评估等多元机制,让现代化规划充分反映国情民意,避免决策失误;在民主监督层面,通过人大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多种形式,规范权力行使,确保现代化政策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在民主协商层面,通过多元主体平等协商,协调不同群体利益关系,化解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利益冲突,减少发展阻力。中国式现代化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丰富的实践支撑,推动民主建设不断向纵深发展。现代化带来的物质财富增长,为民主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完善了基层民主设施,提升了公民参与能力,让更多人具备参与民主实践的条件;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涌现的治理需求,为民主实践拓展了广阔场景,从数字治理中的线上参与到共同富裕中的利益协调,从生态保护中的公众监督到科技创新中的民意汇聚,现代化的发展让民主实践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2]。这种互补性使得全过程人民民主与中国式现代化形成了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民主的发展为现代化注入活力,现代化的推进为民主提供舞台,二者共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

(三)发展进程的同步性

从历史发展维度看,中国的民主建设与现代化进程始终保持着同步推进的态势,二者在不同历史阶段相互呼应、同频共振。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主义民主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不断完善,为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制度保障。这一时期,基层民主开始萌芽发展,为广大群众参与地方治理、推动局部现代化进程提供了渠道。进入新时代,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完善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形成了更为紧密的“双向奔赴”关系。一方面,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深化破解了现代化进程中的诸多难题,针对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治理精细化不足等问题,通过扩大基层参与、强化民主监督、完善协商机制等方式,推动现代化向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的丰硕成果推动民主从“制度层面”向“生活层面”深度延伸,民主实践不再局限于政治领域,而是广泛融入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方面,成为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中可感可知的实践体验。这种同步性体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内在一致性,二

者在历史进程中相互适应、动态平衡,共同回应时代课题,满足人民需求,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不断取得新进展^[3]。

(四)目标追求的一致性

全过程人民民主与中国式现代化始终秉持同向而行的目标导向,在价值追求与实践指向中形成高度契合,共同锚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方位。全过程人民民主以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目标,通过构建覆盖各领域、各环节的民主实践体系,让人民群众在参与国家治理、社会建设中充分表达意愿、维护权益,不断提升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这一目标与中国式现代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核心指向一脉相承。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破解发展难题、增进人民福祉,在推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过程中,始终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而这正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归宿,民主的发展最终要服务于人民生活品质的提升。从实践目标来看,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凝聚最广泛的社会共识、汇集最深厚的人民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的动力源泉,其目标在于确保现代化建设始终沿着符合人民意愿、顺应时代潮流的方向前进。二者共同追求“国家发展、民族进步、人民幸福”的有机统一,既致力于通过民主建设保障现代化的正确方向,又通过现代化成果夯实民主发展的根基,在目标同向、行动同步中,共同书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篇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梦想提供坚实支撑。

二、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意蕴

全过程人民民主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度融合,不仅为中国自身的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更具有深远的战略价值。这种价值既体现在破解发展难题、凝聚发展合力上,也体现在提升治理效能、丰富人类文明形态上,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优势。

(一)破解西方现代化困境,彰显中国道路优势

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普遍面临的“民主形式化”“两极分化”“治理失效”等困境,本质上是其民主模式与现代化发展不相适应的结果。西式民主过度强调选举形式,忽视民主的实质效能,导致民主成为少数利益集团博弈的工具,难以反映广大民众的真实诉求。在这种民

主模式下,现代化进程往往受资本逻辑主导,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撕裂日益严重,治理能力持续弱化。全过程人民民主为中国式现代化规避西方陷阱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通过“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确保民主不流于形式,让人民群众在选举、协商、决策、管理、监督各环节都能充分参与,真正实现了民主的实质价值;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始终把共同富裕作为现代化的重要目标,通过民主协商协调利益分配,通过民主监督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有效遏制了两极分化的趋势;全过程监督机制贯穿现代化建设全过程,确保政策制定科学合理、政策执行不折不扣、政策评估客观公正,显著提升了治理效能。这种独特的发展模式,彰显了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优越性。中国式现代化既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又保持了社会长期稳定;既推动了物质文明进步,又促进了社会公平正义,打破了西方现代化“要么发展要么公平”“要么自由要么秩序”的二元对立,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更优的发展路径。

(二)凝聚现代化共识,汇聚全民参与合力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系统工程,涉及14亿多人口的利益调整与诉求整合,其复杂性、艰巨性前所未有。要推进这样一项宏大的事业,必须凝聚全社会的共识与力量,形成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没有广泛的社会共识,没有全民的积极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就难以顺利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为凝聚现代化共识、汇聚全民合力提供了有效路径。通过民主恳谈会、基层立法联系点、网络问政平台、政协提案等多元形式,全过程人民民主为不同群体提供了表达诉求的渠道,让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企业家等各个阶层的意见都能得到充分尊重与合理吸纳。在民主参与过程中,不同群体相互沟通、相互理解,个人诉求逐步转化为社会共识,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得到有机平衡。这种共识凝聚机制,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现代化进程中的阻力,增添发展动力。当人民群众的意愿得到充分体现、利益得到切实保障时,就会主动参与到现代化建设中来,将“个人力量”凝聚为“集体合力”。从乡村振兴中的村民自治到科技创新中的公众参与,从生态保护中的全民监督到公共服务中的民意反馈,全过程人民民主激发了全民参与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创

造性,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不竭的力量源泉。

(三)提升现代化治理效能,推动治理体系现代化

治理效能是衡量现代化水平的核心指标,现代化的推进离不开高效能的治理体系作为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性、系统性要求治理体系必须具备多元协同、科学决策、有效执行、动态优化的能力,而全过程人民民主正是提升治理效能、推动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动力。全过程人民民主将民主选举、协商、决策、管理、监督贯穿治理全过程,构建了闭环式的治理机制。在决策环节,通过“民意征集—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的全流程机制,广泛吸纳各方意见,提升政策的科学性与可行性,避免“拍脑袋决策”带来的资源浪费与社会矛盾;在执行环节,通过群众参与、舆论监督、人大监督等多种方式,对政策执行过程进行全程跟踪,及时发现并纠正执行偏差,确保政策不走样、不落空;在评估环节,以群众满意度为核心标准,引入第三方评估、社会评价等多元评估主体,客观评价政策效果,推动政策优化完善。这种民主治理模式,推动治理从“政府主导”向“多元协同”转变,实现了治理效能的显著提升^[4]。通过全过程人民民主,政府、市场、社会、公民等多元主体都能参与到治理过程中,形成治理合力;治理决策更加贴合实际需求,治理执行更加顺畅高效,治理评估更加客观公正,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断迈向现代化,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治理保障。

(四)丰富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中国智慧

长期以来,西方现代化模式被视为“唯一正确”的选择,“现代化=西方化”“民主=西式选举”的单一叙事主导着国际社会的认知。然而,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暴露的诸多问题表明,这种模式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模式往往难以成功,甚至陷入动荡与停滞。全过程人民民主与中国式现代化的融合发展,打破了这种单一叙事,创造了“民主与现代化协同发展”的新范式。这一范式既坚持了民主的本质要求,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实质效能,又兼顾了现代化的全面协调发展,推动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统筹推进;既立足中国具体国情,彰显了中国特色,又蕴含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为发展中国家探索适合自身的民主与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参考。这种新的文明形态,丰富了人类政治文

明与现代化的多样性。它证明了民主可以有多种实现形式,现代化可以有不同发展道路,各国不必拘泥于西方模式,完全可以根据自身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全过程人民民主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成果,为人类解决民主与现代化发展中的难题提供了中国智慧,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将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与价值意蕴转化为现实成效,需要明确具体的实践路径。要立足新时代的发展要求,从制度完善、形式创新、能力建设、保障机制等方面发力,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与中国式现代化深度融合、协同推进。

(一)完善民主制度体系,筑牢现代化制度根基

制度是管根本、管长远的保障,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与中国式现代化协同发展,首先要完善民主制度体系,构建结构完整、协同高效、运转顺畅的制度框架,为现代化建设筑牢制度根基。一是优化根本政治制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具有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显著优势”。^[5]扩大人大代表中基层群众、一线工人、农民及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让更多基层声音进入国家决策层面,同时强化人大对现代化政策的审议与监督职能,健全代表联系群众的闭环机制,确保现代化建设始终贴合人民意愿。二是健全协商民主体系。深化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等多元协商形式,聚焦乡村振兴、生态保护、共同富裕等现代化重点领域,开展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等多样化协商活动,建立协商成果转化责任制,明确办理责任与时限,让共识有效转化为现代化建设的政策举措。三是夯实基层民主基础。要完善村(居)民自治制度,健全村民会议、居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居民代表会议等议事决策机制,规范村(居)民自治的各项程序,推广民主恳谈会、院坝会等贴近群众的民主形式,加强乡镇(街道)议事协商平台、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等阵地建设,推动基层民主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让基层民主成为激活现代化基层实践的强大动力,为群众参与民主实践提供便利条件^[6]。

(二)创新民主实践形式,适配现代化发展需求

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推进,新情况、新问题

不断涌现,对民主实践形式提出了更高要求。要主动适应现代化发展需求,创新民主实践形式,拓展民主参与渠道,提升民主实践的针对性与实效性。一是推动数字民主赋能。充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搭建“数字人大”“线上议事厅”等线上民主平台,打破时空限制,让群众便捷参与民意表达、政策咨询等活动,同时利用大数据精准研判社会诉求,借助人工智能辅助政策模拟与风险评估,提升决策科学性,建立线上意见收集、处理、反馈的闭环机制,破解参与渠道不足、响应滞后等问题^[7]。二是拓展专项民主场景,围绕中国式现代化重点任务,在共同富裕领域建立利益协调平台平衡群体利益,在生态保护领域完善环境听证与公众监督机制,在科技创新领域搭建多方协商渠道汇聚智慧,让民主参与精准对接现代化发展需求。三是丰富基层实践载体,推广“村民说事”“乡贤参事会”等特色形式,将民主实践嵌入社区治理、公共服务供给、矛盾化解等基层事务,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便捷参与现代化建设相关事务,提升民主实践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三)强化民主能力建设,提升全民参与质效

民主实践的成效不仅取决于制度与形式的完善,更取决于参与者的能力素质。要强化提升公民的民主素养和干部的民主工作能力,确保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发挥更大作用。一是培育公民民主素养,将民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从基础教育阶段开设民主常识、公民权利义务等相关课程,同时通过社区宣传、媒体报道、专题讲座等形式普及民主知识与理念,搭建模拟政协、社区议事、民意调查等实践平台,让群众在实践中学习民主技能,实现“会参与、能参与”的目标。二是加强干部民主能力培训,针对领导干部开展民主决策、协商协调、矛盾化解等专题培训,通过案例教学、现场观摩等方式,推动干部转变工作理念,提升倾听民意、集中民智的能力,同时建立干部民主工作考核机制,将民主决策水平、群众参与度等纳入考核评价,激励干部主动运用民主方式开展工作^[8]。三是搭建能力提升桥梁,依托人大代表联络站、党群服务中心等阵地,建立“干部带群众”的参与机制,通过实践辅导、经验分享等方式,推动全民民主素养与现代化参与需求相适配,为民主实践注入持久动力。

(四)健全民主保障机制,确保实践落地见效

完善的保障机制是全过程人民民主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支撑,也是确保民主实践切实转化为现代化建设实效的关键。要从法治保障、科学评估和资源保障等方面健全保障机制,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一是完善法治保障,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要求纳入法律法规体系,细化民主选举、协商、决策等各环节程序,明确公民参与现代化相关事务的权利与保障措施,强化法律实施,加大对侵犯公民民主权利行为的惩处力度,确保民主实践有法可依、有序开展。二是建立科学评估机制,构建以群众满意度、政策转化率、治理效能提升为核心的评估体系,明确评估指标、标准与方法,定期对民主实践在现代化重点领域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客观研判实践成效与存在问题。三是强化资源保障,加大基层民主阵地建设投入,完善数字化民主平台的技术支撑,合理配置民主实践所需的人力、物力资源,为全过程人民民主赋能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物质与技术支撑,确保各项实践举措落地见效。

参考文献:

- [1]贾中华.全过程人民民主对西方民主范式的超越[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5,(3):75-83.
- [2]肖立辉.全过程人民民主:人类政治文明的民主新探索[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1(7):19-23.
- [3]陈怀平.全过程人民民主对西方民主的系统性超越[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5):23-34.
- [4]贾中海,曹向阳.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新形态[J].理论探讨,2022(5):39-45.
- [5]习近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文化自信 继续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4-09-15.
- [6]谢岳.全过程人民民主何以维护政治稳定?[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6).
- [7]郭静.人民至上: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参与逻辑[J].理论学刊,2023(6):107-116.
- [8]张彩云,张淑兰.统一战线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效能研究[J].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5,26(1):39-48.
- [9]郭亮.全过程人民民主如何赋能基层治理[J].国家治理,2025,(13):64-69.

责任编辑:张津凤

天津市名人故居活化利用与文旅融合发展路径研究

石晶辉¹, 陈泽²

(1. 天津市社会主义学院, 天津 300193 2. 天津体育学院, 天津 301617)

【摘要】 名人故居作为展现城市魅力的重要地标, 不仅具有极高的建筑艺术价值, 还是传承历史文脉、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随着文旅融合的发展和消费升级的推进, 天津市名人故居的保护与利用迎来新的机遇与挑战。天津市虽然在名人故居修缮与保护方面已经取得了初步成绩, 但在区域品牌塑造、游客体验升级、故居功能拓展等方面仍存在一定短板。本研究突出“活化利用”, 聚焦“文化价值转化”与“旅游体验升级”, 从名人故居空间规划、科技融合、业态创新等维度提出系统性发展路径, 为助力天津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提供借鉴。

【关键词】 名人故居; 活化利用; 文旅融合

中图分类号: G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089(2025)04-0055-05

习近平总书记在天津视察时指出:“天津要深入发掘历史文化资源, 加强历史文化遗产和红色文化资源保护, 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市场体系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打造具有鲜明特色和深刻内涵的文化品牌, 进一步彰显天津的现代化新风貌。”^[1]天津市名人故居是历史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传承历史文脉, 在保护的前提下有机融入现代生活气息, 让故居建筑焕发新的活力。

一、天津市名人故居利用现状评估与问题诊断

天津市名人故居建筑风格多样, 涵盖中西合璧的

洋楼、传统院落的四合院以及近代民国初期的公共建筑等类型, 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与文化价值。故居主要集中在和平区、河北区、河西区等市内六区, 其中以五大道地区、意式风情区、解放北路等地带最为丰富。很多著名的名人故居已经被纳入文物保护单位, 得到整体的修缮与保护, 形成一定的文化展示功能, 但是在开发经营利用方面, 仍存在一些问题。

(一) 空间布局缺乏系统规划, 品牌创新缺乏活力

当前天津市名人故居的空间利用主要处于片状开发状态, 用主题线路和观光巴士将区域串联起来,

基金项目: 2025 年度天津市社会主义学院课题“推进天津名人故居资源优势转化为文旅发展优势研究”(TJSYWT202501)

作者简介: 石晶辉, 天津市社会主义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为统一战线与中华文化; 陈泽, 天津体育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统战理论。

已经初步形成区域联动发展的整体格局,但是关于名人故居主题线路的设计规划和区域联动还存在不足。

1. 主题线路设计薄弱。虽已有若干文旅路线规划,还有主题观光路线,但是还没有专门的名人故居主题和线路。例如,津游一号仿古铛铛车以“小洋楼,天津味”为主题,通过串联海河沿岸历史文化建筑与商业综合体,构建移动式城市文化体验场景。今年8月20日开通的“津沽行韵”城市观光路线,将天津的城市文化、自然风光和现代都市风貌完美融合。这些路线只是把景点空间上连接起来,没有鲜明的名人故居线路主题,没有鲜明的主题叙事。例如,李叔同故居、少帅府等名人故居散落在不同的观光路线,没有发挥出名人故居集聚效应。

2. 区域串联不足。五大道、意式风情区、解放北路等区域已有整体规划布局和线路,但是其他区域的名人故居与市区的名人故居还缺乏有效的物理连接与文化叙事串联,游客体验碎片化。比如宝坻区袁黄(了凡)纪念馆、滨海新区范旭东纪念馆在各自领域以及游客当中都颇具影响力,但是由于地处新区,区域之间没有形成有效的联动路线,导致一些游客集中参观市内六区而放弃参观其他区域名人故居和纪念馆。

3. 品牌打造缺乏创新。虽有“近代中国看天津”相关主题,但是在创新品牌挖掘和塑造上存在不足,相比上海、重庆等地推出的“统战名人故居”“统战文化地图”等项目,天津在利用大统战工作格局优势和天津市中华文化学院金字招牌方面尚有差距,在品牌塑造上缺乏活力。

(二)数字化开发有待提升,体验方式相对传统

当前天津市在名人故居数字化建设方面虽已开展部分探索,如张园推出《津门往事》沉浸式演绎项目、梁启超纪念馆引入MR混合现实技术、李叔同故居试点剧本杀体验活动等,取得了一定社会反响。然而,从整体来看,天津市名人故居的数字化开发仍处于初步阶段,尚未形成系统化、规模化、深度化的智慧文旅体系。绝大多数故居仍以传统的实物陈列、展板图文、人工讲解为主,数字化技术应用覆盖范围有限,互动体验内容较为单一,对年轻群体个性化、互动性文化消费的需求满足有限。

1. 缺乏虚拟导览,智慧化水平有待提升

天津市部分名人故居和纪念馆建成开放时间较

短,内部陈列与展陈手段仍显传统,未能充分利用数字化技术提升观展体验。一些名人故居历史价值和教育意义极为突出,但目前仍以静态展览为主,缺乏VR/AR导览、历史场景数字复原、交互式体验项目等智慧文旅产品的支持。游客无法通过技术手段“回到”历史现场感知名人成长历程,削弱了故居的教育功能和情感共鸣效应。

2. 数字内容挖掘不足,文化传播力较弱

目前天津市名人故居的数字资源建设仍以基础性资料整理为主,很多故居尚未实现对历史故事、人物生平、时代背景等文化元素的数字挖掘与创新传播。虽具备丰富的文物资源和建筑文化底蕴,但其数字内容多以图文和视频简单展示为主,缺乏系统性、故事性的数字叙事架构。未能依托数字技术打造跨媒体内容矩阵,也未能结合人工智能、大数据进行个性化推荐和内容定制,导致对年轻受众吸引力不足,文化传播效能未能最大化。

3. 缺乏统一的数字平台与数据整合

天津市名人故居数字化建设存在“碎片化”问题,各景点之间数字资源未实现互联互通,缺乏全市层面的名人故居数字导览平台或文旅App集成服务。游客无法通过一站式平台获取故居预约、语音导览、线上展览、互动体验、文创购买等服务,降低了游览便利性和体验连贯性。同时,故居之间也缺乏数据共享与联动营销机制,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和品牌合力。

(三)功能单一,缺乏消费场景

目前天津市名人故居在功能设置和运营模式上还存在单一化、同质化问题,严重制约了其文化价值的深度挖掘和市场活力的有效释放。尽管部分故居如曹禺剧院、李叔同故居等已尝试引入戏剧演出、沉浸式体验等新形式,但整体来看,大多数故居仍以传统的静态展览为主,未能形成多层次、差异化、可持续的文旅消费体系。

1. 展示方式雷同,互动体验不足

多数名人故居仍采用“博物馆式”的陈列方式,以展板、实物、图片为主要展示手段,缺乏现代科技互动装置、情境还原、参与式项目等创新形式。导致游客参观时间短,重游率低,消费意愿不强。尤其对年轻游客及家庭客群吸引力不足,难以形成深度的文化认知与情感连接。

2. 业态融合较弱,消费场景缺失

大多数故居运营多局限于门票收入,未能与特色文创、艺术表演、教育研学、特色餐饮、夜间经济等业态形成有效联动。例如,五大道地区虽有大量名人故居聚集,但大多数故居周边配套仍以传统观光为主,缺乏兼具文化内涵与商业活力的复合消费空间,“文化—体验—消费”闭环尚未形成,整体产业附加值较低。

3. 产权结构与资金机制制约突出

天津市部分名人故居属于国有文物建筑,但也有相当数量属于私人产权或单位代管,产权分散复杂,导致整体开发协调难度大、社会资本引入受阻。同时,故居运营多依赖政府拨款,自有造血能力不足,缺乏持续的内容更新、设施维护和市场推广投入,造成部分建筑处于闲置、半闲置或低效使用状态,存在文化资源浪费现象。

二、名人故居活化利用模式典型案例

名人故居的保护与活化利用是城市更新和文化传承的重要课题。当前,天津市名人故居资源丰富但开发利用不充分,亟需通过创新模式盘活存量资源,实现文化价值与市场价值的统一。本研究在借鉴国内先进地区经验的基础上,重点分析天津市典型案例,为推进名人故居资源优势转化为文旅发展优势提供参考。

(一)国内先进地区经验借鉴

1. 北京史家胡同“有机更新+精品院落”模式

史家胡同位于北京市东城区,是北京最古老的胡同之一,距今已有700多年历史。胡同内保存着完整的传统四合院群落,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从引入平房物业、公共区域改造到打造精品院落,史家胡同已经成为北京老城保护的典范。2018年史家胡同荣获“北京十大最美街巷”称号,2022年3月又入选《首都功能核心区传统地名保护名录(街巷胡同类第一批)》。

史家胡同改造有以下特点:一是采用“微更新”方式,尊重胡同肌理和院落格局,按照“一院一策”原则进行个性化改造;二是功能置换与文化传承相结合,将传统四合院改造为博物馆、文化沙龙、精品酒店等新型文化空间;三是注重品质提升,通过精细化的设计和施工,保留历史风貌的同时提升舒适度。史家胡同模式核心理念是“轻干预、重传承”,通过最小化

的物理改变实现最大化文化价值的输出,为天津小洋楼的微改造提供了重要参考。

2. 南京秦淮区“IP开发+场景消费”模式

南京秦淮区在名人故居活化中注重IP挖掘与消费场景融合,开创了历史文化消费新范式。该模式以历史名人作为核心IP,通过现代消费场景重构,实现文化价值的当代转化。

以李香君故居为例,运营方深入挖掘这位明末清初传奇女子的文化内涵,创建独立女性品牌“Scentura壹半香”。品牌名取自英文scent(香气)与venture(冒险)的组合,呼应李香君不畏艰难的人生选择,鼓励当代女性突破自我、探索未知。品牌开发了系列文创产品,包括香水、丝巾、茶具等,其中以李香君故事为灵感的“桃花扇”系列香水最为畅销。

科举博物馆则推出“能喝的墨水”创意产品,将传统文化符号转化为现代消费元素。这款饮品以黑芝麻、核桃等健康食材为原料,外观似墨水,寓意“喝墨水、长学问”,当月销售近4000瓶,成为网红产品。博物馆还开发了“状元及第”系列文创,包括文具、服饰、食品等,年销售额超千万元。该模式通过“文化IP+情感消费”激活年轻市场,将历史符号转化为消费符号,实现了文化传播与经济效益的统一。

(二)天津市典型案例

1. 张园《津门往事》沉浸式演绎项目

张园作为天津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曾经是清末民初时期的重要政治活动场所。2023年推出的《津门往事》沉浸式演绎项目,通过创新性的展陈方式,使这座历史建筑重新焕发活力。

项目运营以来,取得了显著成效。因其创新的形式,张园纪念馆于2023年成功入选文化和旅游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沉浸城市故事会”国家级试点名单,成为首批20个国家级试点之一。张园项目的成功表明,历史建筑活化要注重体验创新,通过技术手段提升参与感和沉浸感;同时要注重运营模式创新,实现可持续发展。

2. 梁启超纪念馆MR技术应用

梁启超纪念馆位于天津市河北区,是展示梁启超生平事迹和学术成就的重要场所。为提升参观体验,纪念馆于2023年进行数字化升级改造,通过沉浸式投影技术、AR增强现实技术、MR混合现实技术等元

宇宙新型技术手段,将天津梁启超纪念馆相关历史事件进行数字化呈现。

梁启超纪念馆创新实践具有以下几方面:第一,引入混合现实(MR)技术。为了让游客能够逐渐进入虚实交互环境,内容设计上首先通过数字宠物引导讲解“赤子家风”作为MR认知体验场景,再通过多人协同交互游戏“一封家书”,打造共空间低时延强交互的虚实融合新视野,引发游客对梁启超先生日常如何对子女谆谆教诲场景的无限遐想。第二,利用AR增强现实技术。打破传统静态图文展览模式,实现通过手机扫描即可进行听、视、触全方位多模态的交互,真正让文物“活”起来,让游客在动静结合的交互展览中获得更深层次的文化体验。第三,开发“少年强”课本游沉浸式体验项目。结合中小学课程要求,运用话剧的表现手法,将课堂上学到的历史人物和事件生动地展现在学生面前,采纳小学语文课本的《少年中国说》选段为引线,制作出沉浸式话剧《少年强》,包含“公车上书”“戊戌变法”“反袁护国”等中考必考内容,在“2024年度博物馆优秀社教案例推介”评选中被评为十佳优秀案例。

三、以天津市名人故居活化利用推动文旅融合发展路径

天津名人故居是城市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也是文旅融合发展的宝贵资源。通过系统规划、科技赋能、业态创新与机制改革,可实现从“静态保护”到“动态活化”的转变。

(一)强化主题线路设计,打破联动不足瓶颈

为系统整合天津市名人故居资源,打破当前联动不足的发展瓶颈,可以构建“一核一带两园”的整体空间格局,并通过主题化、线路化的方式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和品牌影响力。

1. 构建“一核一带两园”空间布局,实现资源整合与联动发展

“一核”主要指以五大道为核心,打造“近代风云人物走廊”。五大道地区是天津名人故居最为集中的区域,拥有大量保存完好的小洋楼建筑群,具备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应以该区域为核心,对散布其间的名人故居进行系统性整合与功能提升,通过统一标识系统,优化游憩设施,贯通步行空间等措施,强化整体街区氛围。重点突出“近代政治、经济、文化名人”主题,打造集

建筑观赏、历史教育、文化体验于一体的高辨识度文化走廊,形成天津市名人故居文旅发展的核心引擎。

“一带”主要指串联意式风情区与海河沿线故居,构建“海河文化名人体验带”。依托海河良好的景观基础和文化资源,将意式风情区、解放桥、望海楼等重要节点及沿线名人故居进行串联。通过水上航线、滨河步道、文化驿站等载体,增强各区段之间的物理联系与主题关联,形成一条融合建筑美学、历史叙事、休闲旅游功能的线性文化空间。可重点打造“名人故事漫步”等特色产品,提升游客体验的连续性与沉浸感。

“两园”主要指依托张园、静园,建设“红色研学园”与“人文艺术园”。“红色研学园”以张园为核心,结合周边红色文化资源,突出近代历史事件与人物事迹,开发面向青少年及党政群体的研学课程、情境党课、专题展览等内容,打造京津冀地区重要的红色教育基地。“人文艺术园”则以静园为重点,依托其园林景观和文化底蕴,引入艺术展览、文化沙龙、音乐会等高品质文艺活动,形成集人文体验、艺术创作、学术交流于一体的文化会客厅。

2. 系统开发主题线路,推动全域资源联动

在明确空间结构的基础上,应跨区域整合资源,设计多条主题鲜明、受众明确的观光与体验线路。城市核心线路设置“津门风云录”,涵盖五大道、意风区近代政治人物故居;设置“艺术大师之旅”,聚焦李叔同、曹禺等文化名人故居等。跨区域线路要将宝坻区袁黄(了凡)纪念馆、滨海新区范旭东纪念馆等新区名人故居纳入整体规划,设计“天津工业先驱之路”“京津冀文化名人巡礼”等主题,打通城乡文旅资源,形成全市“一盘棋”发展格局。设置特色主题线路,如“小洋楼艺术之旅”“统战名人足迹”“女性名人故居寻访”等,通过细分主题增强故事性和针对性,满足不同游客群体的兴趣需求。

3. 凝聚品牌合力,提升整体影响力

整合多方力量,共同挖掘和阐释名人文化当代价值,打造“天津名人故居”统一战线品牌。推动“统战名人地图”“津派家国故事”等专项内容建设,提升线路的政治与文化内涵。整合宣传资源,通过跨平台融媒体推广、节事活动策划如“天津统战名人文化周”、区域联动营销等方式,扩大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吸引力。^[2]

(二)推动“文化+科技”融合,构建智慧化故居体验新体系

在当前数字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推动名人故居的数字化转型,是提升其文化传播力、体验吸引力和运营效能的关键路径。天津市应系统推进“文化+科技”深度融合,以智慧化、场景化、互动化为方向,构建线上线下联动、消费体验一体的数字文旅新格局。

1. 建设“智慧故居”示范项目,打造数字体验标杆
选取北洋法政学堂旧址等一批基础较好、文化代表性强的故居,作为智慧化提升的试点项目。系统引入VR/AR导览技术,复原历史场景,实现“穿越式”沉浸参观;开发AI数字人讲解系统,以名人虚拟形象为游客提供个性化讲解服务;打造沉浸式数字剧场,通过全景投影、环绕声场等技术重现重大历史事件;建设线上虚拟展馆,实现全球游客远程实景访问。通过上述措施,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智慧故居”建设模式。

2. 深化数字内容叙事,推动IP数字化开发与转化
组织历史、文学、影视、数字艺术专家成立“天津名人故居内容智库”,对名人生平、历史事件、文化精神进行深度挖掘和剧本化再创作。推出系列数字故事产品,如《梁启超与饮冰室》《弘一大师在天津》等互动影视短片、有声剧集、数字绘本,增强文化传播感染力。依托“天津小洋楼”建筑IP、近代历史名人IP,开发数字藏品(NFT)、虚拟文创产品,探索数字权益、会员服务新型文化消费模式,拓展产业价值链条。

3. 构建全市一体化数字平台,实现资源整合与服务升级

依托“天津文旅云”平台基础,建设“天津名人故居”数字专题门户,整合全市故居资源,提供一站式智慧服务,包括:线上预约与智能导览;多语种数字解说与互动问答;线上虚拟展览与专题数字馆;名人主题文创电商平台;游客评价与行为数据分析系统等。通过平台打通数据孤岛,实现故居之间联动营销与服务协同,提升整体管理效率和游客满意度。

(三)打造“文化体验+消费场景”闭环,推动业态融合与运营机制创新

要以“文化体验化、体验场景化、场景消费化”为理念,系统构建集参观、体验、消费、学习于一体的融合发展模式。通过业态创新、场景赋能与机制改革,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

1. 推动体验式场景营造,实现展览模式现代化转型

改变传统以静态陈列为主的展陈方式,结合故居空间特点与人物主题,引入沉浸式剧场、剧本游戏、情境演绎、互动工坊等新型文化体验形式。例如在静园设计“从未代皇帝到政协委员”解密闯关项目,结合建筑空间与历史故事增强参与感和娱乐性;在李叔同故居设置“弘一书房”手工作坊,提供雕版印刷、经卷抄写、艺术禅修等文化体验。通过这些项目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提升满意度和重游率,实现从“被动观看”到“主动参与”的转变。^[3]

2. 深化“故居+”业态融合,构建文化消费生态圈
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结合天津小洋楼建筑特色和文化底蕴,提出“故居+”融合发展战略。故居+文创:开发具有人物IP特色的文创产品系列,如梁启超“饮冰室”茶具、曹禺戏剧主题文具、李叔同艺术衍生品等,设立线下体验店与线上电商平台;故居+商业:在故居周边或内部空间引入文化书店、非遗市集等消费业态,形成“观展+体验+消费”一体化流程。

3. 创新运营机制,激发社会力量参与活力
突破当前主要依赖政府管理的运营模式,探索多元化合作机制。推广“政府监管+专业运营+社会参与”模式,通过公开招标、委托管理、特许经营等方式,引入专业文旅企业、文化机构、非营利组织参与故居运营管理,提升专业化水平与服务品质;借鉴珠海陈芳故居、北京77文创园等“轻资产运营”经验,通过品牌授权、内容合作、活动联办等方式盘活故居资源,降低运营成本,提高经营效率;设立“天津名人故居活化利用基金”,支持社会资本参与故居修缮、内容开发与业态提升,探索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在文化领域的应用。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向全国各族人民致以美好的新春祝福 祝各族人民幸福安康 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N].人民日报,2024-02-03(01).
- [2]黄毓婵.新时代统战名人故居的价值意蕴与实践路径探究——以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为例[J].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4,(02):91-96.
- [3]名人故居的开发与保护[J].人民论坛,2019,(05):124.

责任编辑:张津凤

津派文化资源的统战价值 挖掘与路径转化

李子吟

(天津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天津 300222)

【摘要】 增强文化认同是提升统战工作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和辐射力的重要方向和关键招法。立足津沽大地,推动文化统战工作守正创新,需要充分厘清津派文化助推文化统战的逻辑理路,深入挖掘津派文化资源的多维统战价值,进而在顶层设计、内容活化、传播创新、实践落地和协同联动等多个层面提出转化路径,以期打造天津统战工作新名片,推动天津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文化统战;津派文化;价值挖掘;路径转化

中图分类号:G127;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089(2025)04-0060-05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统一战线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1]。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2]。文化认同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内核和底蕴,以文化认同增进政治共识是构建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的时代命题。津派文化作为天津地域文明的集中体现,蕴含着丰富的统战基因与资源。面向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深入挖掘津派文化的统战价值,积极探索其转向文化统战的有效路径,为天津统战工作注入文化动能。

一、津派文化助推文化统战的逻辑理路

(一)新时代文化统战的内涵

文化统战并不是一个新话题,早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新民主

主义论》中就提出了关于文化统战的重要思想。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说明,没有文化统一战线的统一战线是不完整的,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3],为文化统战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学者黄大明指出,文化统战是以中华文化为载体,以追求大团结、大联合、大统一为目标,求同存异,实现中华民族大团结、大联合的实践活动和重大战略。^[4]陈喜庆认为,文化统战,是与经济统战、政治统战、社会统战相对应的统战工作领域,是统一战线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服务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着力重点。^[5]总的来说,文化统战是中国共产党统一

基金项目:2025年天津市社会主义学院招标课题“津派文化资源的统战价值挖掘与路径转化研究”(TJSY202503);天津科技大学2025年度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课题“人文科大·典籍里的科技文化”(KDW202503-08)

作者简介:李子吟,天津科技大学文法学院汉语国际教育系副主任、讲师,研究方向为国际中文教育与津派文化传播。

战线理论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与实践深化,其核心在于通过文化的凝聚力、感染力和认同力,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共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津派文化的意蕴与特征

1. 兼容并蓄:河海通津与多元融合的文化基因

津派文化的生成意蕴根植于天津“河海要冲、畿辅门户”的地理区位与历史积淀,呈现出鲜明的多元融合性特征。从历史维度看,天津自明、清起便是南北漕运枢纽,运河文化带来了商业智慧与市井习俗,渤海湾的港口优势则吸纳了农耕文明与渔盐文化,而近代开埠后,九国租界的设立更引入了西方建筑、艺术与生活方式。这种“三河五岸”的地理格局与“华洋杂处”的历史语境,使津派文化突破了单一地域文化的局限,形成独有的融合特质。津派文化的融合并非简单的文化叠加,而是通过商业往来、族群互动与社会调适,形成了“和而不同”的文化生态。例如,古文化街的民俗符号与五大道的欧式建筑共存,相声艺术中的方言杂糅与戏曲元素借鉴,均印证了其兼容并蓄的生成逻辑,这种意蕴使其天然具备凝聚多元群体的文化基础。

2. 务实开放:商埠特质与市民精神的双重彰显

津派文化的精神意蕴核心在于务实性与开放性的辩证统一,这一特质由天津近代商埠的发展轨迹与市民社会的形成历程共同塑造。作为明清至近代的商业重镇,天津商人形成了“重利而不奸猾、务实而不保守”的行事风格,这种商业伦理渗透到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使得津派文化摒弃了虚浮的形式主义,更注重现实价值与实用理性。从民俗文化中的“码头规矩”到饮食文化里“解馋不贵”的津味小吃,均体现了对生活本质需求的关注。同时,开埠后的国际化进程赋予津派文化强烈的开放性精神。相较于内陆文化的封闭性,天津在近代便形成了“睁眼看世界”的文化自觉,这种开放性并非被动接受,而是主动调适与选择性吸纳。例如,近代天津的教育革新(如北洋大学堂的创办)、实业发展(如启新洋灰公司的建立)均体现了对西方先进技术与理念的借鉴,而这种借鉴始终以服务本土发展为导向。

3. 市井叙事:平民视角与地域符号的鲜活呈现

津派文化的表达意蕴以市井性与地域性为核心,通过鲜活的平民叙事与独特的地域符号,构建起辨识

度极高的文化表征体系。不同于精英文化的宏大叙事,津派文化始终面向大众群体,以市民生活为言说对象,相声、快板、评剧等艺术形式均扎根于市井生活,以“接地气”的语言风格与叙事方式反映市民的喜怒哀乐。例如,侯宝林、马三立等相声大师的作品,多以天津街头巷尾的生活片段为素材,通过幽默调侃的方式传递市民的价值观念,这种叙事方式拉近了文化与大众的距离,形成了强烈的文化认同感。在地域符号的塑造上,津派文化形成了一批兼具标志性与文化内涵的载体。物质层面,五大道的“小洋楼”不仅是建筑景观,更承载了近代天津的历史记忆与中西文化交融的痕迹;非物质层面,泥人张的民俗雕塑、杨柳青年画的吉祥如意、狗不理包子的饮食文化,均成为津派文化的鲜明标识。

(三)津派文化与文化统战的内在契合

1. 文化认同是政治认同的基础

文化统战的本质是通过文化层面的价值共鸣,夯实“大团结大联合”的政治基础^[6],而津派文化与生俱来的“多元共生、兼容并蓄”基因,为构建文化认同提供了天然载体,进而成为政治认同生成的重要前提。这种契合性首先体现在历史积淀的融合上:天津自漕运时代起便形成“五方杂处”的文化生态,晋商会馆的契约精神、徽商的经营智慧与本土码头文化的协作理念相互渗透,开埠后西方工业文明与传统农耕文明的碰撞又催生“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文化形态,这使得津派文化天然具备“容纳差异、凝聚共性”的文化特质,与文化统战“尊重多样性、寻求一致性”的原则高度契合。

2. 地域文化是情感联结的纽带

文化统战的关键在于打破群体隔阂、构建情感共同体,而津派文化以“经世致用、贴近民生”为核心的市井特质,恰好能以“生活化、具象化”的方式搭建情感联结的桥梁,实现不同统战对象的“情感共振”。这种契合性源于津派文化的“大众化”“平民性”基因,天津文化始终扎根市井,煎饼果子的烟火气、相声茶馆的笑声、非遗传承人的坚守,构成了全民可参与、可感知的文化符号,这种“无门槛”的文化形态与文化统战“覆盖广泛、精准触达”的需求高度适配。

3. 文化传播是共识凝聚的载体

文化统战的落地依赖于共识的精准传递,而津派

文化“具象化、通俗化、时代化”的传播特性,为统战话语的“软着陆”提供了优质载体。这种契合性体现在传播内容、传播场景与传播形式的三重适配:从内容上看,津派文化以“具象符号”替代“抽象概念”,如用平津战役纪念馆的历史文物诠释“爱国主义”,用泥人张彩塑的市井百态传递“社会和谐”,使统战核心话语转化为可感知的文化内容;从场景上看,津派文化的传播阵地兼具“公共性与专业性”,非遗工坊、历史街区、相声茶馆等场所既是文化传播空间,也是统战工作的“隐形阵地”,可实现“文化体验与共识传递”的同频共振;从形式上看,津派文化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传播活力,从近代《新民丛报》的“新文体”革新,到当代“津味短视频”“非遗数字文创”的流行,其传播形式的迭代与统战对象的媒介使用习惯高度匹配。

二、津派文化资源统战价值的多维挖掘

(一)凝聚价值:增强文化认同与民族归属感

津派文化资源的凝聚价值,核心在于通过具象化的文化载体,构建不同群体共享的文化记忆,进而强化文化认同与民族归属感,为统战工作筑牢情感根基。从文化认同的构建来看,津派文化兼具普遍性与地域性,能跨越群体差异引发共鸣。物质层面,古文化街的民俗景观、天后宫的妈祖信仰,既是天津地域文化的标志,也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祈福纳祥”“家国同构”的共同理念,使本地居民与外来群体都能找到文化契合点。非物质层面,相声里的“津味幽默”、杨柳青年画中的民俗场景,以通俗易懂的形式传递着“和乐共处”的生活智慧,这种贴近大众的文化表达,能有效消解群体间的文化隔阂。从民族归属感的强化来看,津派文化的多元融合特质正体现了民族文化的包容性。历史上,天津作为多民族聚居地,回族的饮食文化、满族的传统习俗与本土文化相互交融,形成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生态。通过对这些融合性文化资源的挖掘,能够让各民族群体直观感受到中华民族文化的包容性,进而增强“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归属感,为民族团结进步统战工作提供坚实支撑。

(二)纽带价值:联结海内外天津儿女的情感共识

津派文化资源的纽带价值,主要体现在以文化记忆为桥梁,拉近海外侨胞、港澳台同胞与故土的心理距离,构建跨越时空的情感联结,强化其对祖国的认同。对海外侨胞而言,津派文化中的“根性”元素是唤

醒乡愁的关键。许多侨胞离乡时带走的,可能是一张杨柳青年画、一段相声录音,或是对津味小吃的味觉记忆,这些文化符号成为他们与故土联结的“情感密码”。近年来,天津通过海外文化交流活动,将泥人张雕塑、风筝魏技艺等非遗项目带到侨胞聚居地,让侨胞在异国他乡感受到熟悉的文化气息;同时,依托五大道等承载家族记忆的历史建筑,组织“侨胞寻根”活动,帮助侨胞追溯家族历史,这些举措都以文化为纽带,强化了侨胞对故土的情感认同。对港澳台同胞而言,津派文化中的“同源性”与“独特性”兼具的特质,能有效搭建沟通桥梁。港澳台地区与内地文化同根同源,津派文化中的传统民俗、伦理观念与港澳台文化存在天然共鸣,能够让港澳台同胞深入了解天津的历史与发展,在文化互动中强化“两岸一家亲”的共识,为港澳台统战工作注入情感动力。

(三)经济价值:促进政企沟通与新阶层人士统战工作

津派文化资源的经济价值,并不单纯体现为文化产业的经济效益,更在于以文化为媒介,搭建政企沟通平台、凝聚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实现经济发展与统战工作的协同推进。在促进政企沟通方面,津派文化资源为政府与企业间的良性互动提供了载体。近年来,天津依托古文化街、民园广场等文化地标,举办文化产业招商会、企业家沙龙等活动,让政府部门与企业在文化交流中增进了解。这种“文化搭台、政企唱戏”的模式,既推动了津派文化产业发展,也拉近了政府与民营企业等统战对象的距离,为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统战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凝聚新阶层人士方面,津派文化资源的产业化开发为新阶层人士提供了发展平台,也成为统战工作的切入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不少从事文化创意、新媒体传播等行业,津派文化丰富的素材为他们提供了创作灵感——如以五大道为主题的文创设计、以津派相声为内容的短视频创作等。基于津派文化文创产业园、文化创新工作室等,能够将从事津派文化相关产业的新阶层人士凝聚起来,引导其将个人发展与城市发展相结合,增强其对社会的责任感与认同感。

(四)教化价值:增进政治共识与社会和谐

津派文化资源的教化价值,体现在通过文化浸润的方式,传递主流价值观念,引导社会共识,为统战工

作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从增进政治共识来看,津派文化中的红色资源与时代精神是重要载体。天津作为近代革命历史名城,拥有平津战役纪念馆、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等红色文化资源,通过组织党外知识分子、新阶层人士等统战对象参观红色场馆、参与红色文化宣讲等活动,让他们在文化体验中感悟革命历史,深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同时,津派文化中“务实开放、开拓创新”的精神,与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等理念相契合,通过对这些精神内涵的挖掘与宣传,能引导统战对象将个人价值与国家发展目标相结合。从促进社会和谐来看,津派文化中的“市井智慧”与“包容精神”能化解社会矛盾、凝聚社会共识。天津市民文化中“不较真、善体谅”的处事态度,相声艺术中“以笑化怨”的表达形式,都传递着和谐共处的理念。针对不同群体的文化需求,提供个性化的津派文化体验服务,能够有效促进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群体的和谐相处,为统战工作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五)品牌价值:提升城市形象,扩大统战工作吸引力

津派文化资源的品牌价值,在于通过打造特色文化品牌,提升天津的城市知名度与美誉度,进而增强统战工作的吸引力与影响力,为汇聚各方力量创造有利条件。在提升城市形象方面,津派文化的标志性资源已成为天津的“文化名片”。五大道的“万国建筑博览”、煎饼果子等“津门小吃”、泥人张等“非遗瑰宝”,这些具有高辨识度的文化品牌,通过媒体宣传、文化交流等途径,让天津“中西合璧、古今交融”的城市形象深入人心。这种良好的城市形象,能增强城市的凝聚力与向心力,让本地统战对象产生自豪感,也能吸引外地人才、企业家等潜在统战对象关注天津、扎根天津。在扩大统战工作吸引力方面,文化品牌的影响力为统战工作提供了“流量入口”。依托津派文化品牌举办的各类活动——如杨柳青民俗文化旅游节、天津相声节等,每年都能吸引大量市民、游客及各界人士参与。借助这些活动平台,开展统战政策宣传、组织统战对象交流,可以让统战工作从“被动动员”变为“主动吸引”,既展示了城市文化魅力,也提升了统战工作的知晓度与认同度,为凝聚各方力量拓宽了渠道。

三、津派文化资源统战价值转化的路径设计

(一)顶层设计路径:完善文化统战的配套保障制度

顶层设计是津派文化资源统战价值转化的“压舱石”,核心在于通过系统性的机制建设,为转化工作提供稳定、规范的支撑环境,避免碎片化、短期化等问题。一是出台专项规划。立足天津实际出台专项文件,明确文化统战的发展目标、重点任务与责任分工。可参照“非遗保护”“文化产业发展”等现有政策框架,制定《津派文化资源统战价值开发利用专项规划》,明确转化工作的总体目标、重点任务和阶段步骤,形成“分工明确、协同高效”的工作机制。二是健全政策支持。针对转化过程中的实际需求,出台配套政策:财政上设立专项基金,对非遗统战项目、侨胞寻根活动等给予补贴;人才上实施文化统战人才培养计划,联合高校开展曲艺创作、非遗传承与统战理论结合的培训,培育既懂文化又懂统战的复合型人才;场地保障上明确历史街区、非遗工坊等场所的统战功能配套要求。三是建立政策评估调整机制,结合统战对象需求变化与文化资源开发实际,定期对政策内容进行优化,实时更新文化资源清单、统战对象动态和转化项目进展。

(二)内容活化路径:构建统战导向的文化内容体系

内容活化是津派文化资源统战价值转化的“文化内核”,主要是围绕统战需求对文化内容进行“再加工”,让津派文化资源既有“天津味”又有“统战魂”。一是主题化提炼。从津派文化资源中挖掘统战相关的核心主题,形成系列内容。比如围绕“团结奋斗”主题,整理平津战役中各民族、各阶层协作支前的故事,改编成相声、快板等曲艺作品;围绕“共同富裕”主题,挖掘天津老字号企业带动中小商户发展的案例,融入非遗技艺传承课程。二是分众化适配。针对不同统战对象的需求定制内容,围绕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侧重“创新创业”内容,依托洋务运动实业遗产,举办“近代实业家创新精神与当代创业”研讨会;围绕青年群体,侧重“潮流表达”内容,比如将杨柳青年画中的家国元素与现代插画结合,设计“青春向党”文创产品。三是时代化更新。让传统津派文化内容对接当下语境,比如相声创作中,将“民族团结”“网络清朗”等时代议题融入传统段子结构,用幽默语言传递统战理念;非遗技艺

传承中,开发“数字非遗”线上直播活动,既保留传播技艺核心,又适应现代传播习惯。

(三)传播创新路径:搭建多元立体的文化传播矩阵

创新传播是津派文化资源统战价值转化的“关键渠道”,通过多维度、广覆盖的传播方式,让文化统战内容触达更多统战对象,扩大共识凝聚的范围。一是在传统传播渠道优化上,发挥线下阵地与传统媒体的基础作用。线下依托文化场馆建设津派文化统战传播点位,在古文化街设置“统战文化长廊”,展示文化与统战融合成果;传统媒体开设专题专栏,比如天津日报开设“文化统战·津门故事”栏目,每周刊发相关报道,借助主流媒体的公信力,增强传播内容的权威性。二是在新媒体传播创新上,适应年轻群体与海外群体的接收习惯。借助直播平台开展“云游津门”直播,带领海外侨胞“线上探访”五大道、古文化街,实时互动解答疑问;在海外社交平台推送英文、繁体中文版本的津派文化内容,重点传播侨胞关注的家乡动态与文化遗产情况,打破时空限制。三是在分众化传播精准上,针对不同统战对象定制传播策略。对海外侨胞,通过侨团组织、海外天津同乡会推送文化内容;对民族群体,通过民族社区宣传栏、民族学校校刊等渠道,传播适配的文化内容,确保传播精准触达。

(四)实践落地路径:推动文化赋能的统战工作提质

实践落地是津派文化资源统战价值转化的“落脚点”,将文化元素深度融入统战工作各环节,让价值转化落到实处。一是在主题活动策划上,打造特色文化统战品牌活动。常态化举办非遗体验、文化展演、主题论坛等活动,邀请各族群众、侨胞代表、党外人士等共同参与。同时,注重活动的互动性,设置“文化体验区”“交流座谈角”,让统战对象在参与中增进感情、凝聚共识。二是在统战阵地建设上,实现文化元素与阵地功能的深度融合。将津派文化融入党外人士之家、侨胞服务中心等阵地,在场所装饰上采用杨柳青年画图案、相声元素,在服务内容中增加文化体验项目。打造“文化+统战”特色阵地,让阵地既“有颜值”更“有内涵”。三是在日常服务融入上,让文化赋能贯穿统战工作全过程。在统战对象走访中,赠送具有津派文化特色的纪念品,比如泥人张摆件、杨柳青年画,拉近距

离;在政策宣讲中,结合文化案例解读政策,比如用“津派商帮的抱团发展”讲解团结协作的重要性。

(五)协同联动路径:形成多方参与的共治共管格局

协同联动是津派文化资源统战价值转化的“动力源泉”,需要整合政府、社会、市场等多方力量。一是政府主导抓统筹。政府部门主要负责“定方向、搭平台、强监管”;统战部牵头明确统战需求和工作标准,文旅局负责文化资源的保护与梳理,市场监管局规范文化统战项目的运营秩序。二是学界支撑做研究。发挥高校、社科院、社会主义学院的智力优势,开展专题研究;科研院所可牵头研究“津派文化与侨胞认同的关系”,为侨胞统战提供理论支撑;各高校可组建合作团队,研究“非遗技艺的分众化传播策略”,为不同群体的文化服务提供方案。同时建立“专家智库”,定期为转化工作提供咨询。三是社会协同抓落地。引导文化企业、社会组织、传承人等主体参与转化实践:文化企业可开发统战主题文创产品,比如杨柳青年画社推出“民族团结”主题年画;社会组织可承接具体活动,比如侨联下属的侨文化研究会负责组织侨胞寻根活动;非遗传承人可主动融入统战元素,比如泥人张传承人创作“各民族共庆丰收”系列作品。对积极参与的社会力量,给予荣誉表彰或政策扶持。通过“大家的事大家办”,增强统战对象的归属感和参与感。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39.
- [2]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4:66.
- [3]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13.
- [4]黄大明.以实践和创新推进文化统战工作[N].人民政协报,2012-07-25(C04).
- [5]陈喜庆.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推进文化统战和统战文化工作[J].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4,(01):1-12.
- [6]李婷婷,曹胜.新时代文化统战的生成逻辑、时代价值和路径探析[J].甘肃政协,2025,(01):68-73.

责任编辑:石晶辉